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简史

赵春晨

43

陕西人民出版社

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简史

赵 春 晨

陕西人民出版社

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简史

赵 春 晨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625 字数95,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

统一书号：11094·41　　定价：0.55元

目　录

一　沙俄入侵前我国的西北疆域……3
汉朝统一“西域”……3
唐朝对西域管辖的加强……9
清代我国的西北疆界在巴尔喀什湖……13
二　沙俄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割占我国西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21
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早期侵略活动……21
1840—1860年间沙俄对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武力侵占……27
打开我国西北大门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34
《中俄北京条约》中关于中俄西疆“划分”的原则规定和沙俄的侵略部署……39
1862—1864年的中俄塔城谈判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45
三　沙俄入侵伊犁和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56
沙俄武装侵占我国伊犁地区……56
沙俄勾结阿古柏和俄、英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64
清朝政府收复新疆和俄、英的阻挠……67
沙俄利用交还伊犁肆意勒索侵略权益和《里瓦几亚条约》的破产……73
《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77

四　沙俄强占帕米尔 …… 86
帕米尔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86
沙俄通过《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割占
我国帕米尔的西北部…… 91
沙俄武装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我国帕米尔
领土…… 96
中俄关于帕米尔问题的谈判……102
五　沙俄阴谋吞并我国西北地区……110
野心勃勃的“巴德马耶夫计划”……110
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独占我国西北地区的
各种经济权益……116
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企图武力吞并我国新疆……122
霸占我国唐努乌梁海……127
六　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政治和经济侵略
……132
领事馆——“合法的”侵略堡垒……132
贸易圈——“国中之国”……137
非法移民和发展俄侨……140
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144
垄断财政和金融……147
七　我国西北边疆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英勇斗争
……153
保卫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祖国神圣领土……153
抗击沙俄对我国伊犁等地的武装入侵……160
遍及全疆的反沙俄吞并的斗争……167

我国的西北边疆，在今天，主要是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辖境；在古代，还包括这一辖境以西和以北的广大地域。这里土地辽阔，山川壮丽，物产富饶。那一望无垠的草原，皑皑白雪的群山和穿流于戈壁滩中的条条河渠，曾引起古往今来不知多少诗人的吟咏赞叹！那一块块肥沃的绿洲，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蕴藏着取之不尽的自然宝藏。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我国的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满、回、锡伯、塔吉克、乌兹别克、达斡尔、塔塔尔等十多个兄弟民族，世世代代居住、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建设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他们也曾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为保卫祖国这块神圣领土而英勇奋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从十七世纪以后，特别是在近代，我国西北边疆遭到了沙皇俄国的野蛮侵略。沙俄通过非法的武力侵占和强加给清朝政府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野蛮地割走了我国西北边疆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并把我国帕米尔和唐努乌梁海等地强行据为已有。除了领土掠夺之外，沙俄还利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各

种手段，对我国西北边疆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沙俄的领土掠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给我国西北边疆造成了深重的社会灾难。直到1917年老沙皇被推翻以前，我国西北边疆无日不受到沙俄侵略者的践踏和蹂躏，我国西北边疆各族人民没有一天停止过反抗沙俄帝国主义的斗争。

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所犯下的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但是，今天社会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扩张的需要，竟不惜歪曲历史，为老沙皇百般辩解。他们拚命美化老沙皇对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声称："在对中国的关系上，俄国政府与西方列强不同，它奉行另一种政策，致力于建立友好睦邻关系。"矢口否认老沙皇掠夺我国西北领土的罪行，否认老沙皇强加给中国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及一系列勘界议定书的不平等性质。他们歪曲事实，胡说清朝以前中国的西部疆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从未隶属"中国，胡说："俄国在远东和中亚的领土，是靠合并既无中国人又无满洲人居住的土地来扩大的，而且这些地方在经济上与清朝中国没有联系"，等等。既然苏联新沙皇制造了这么多奇谈怪论，欺骗世界舆论，妄图步老沙皇的后尘，进行新的侵略扩张，那么，就让我们在这里重温一下历史，看一看当年老沙皇在我国西北边疆的所作所为和今天新沙皇的卑鄙无耻吧！

一　沙俄入侵前我国的西北疆域

汉朝统一“西域”

我国的西北边疆地区，古代称为“西域”①。它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很早就已开始。

在我国先秦古籍中，保存着许多有关西域的记载。著名的《山海经》一书，曾多次提到我国西北边疆的昆仑山，说它位于“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周围约“八百里”，高达“万仞”。《山海经》还提到“泑泽”，经学者们考证，它就是今天新疆境内的罗布泊。除了《山海经》之外，《禹贡》等书也有“昆山之玉”的记述；《穆天子传》曾经提到“舂山”（即葱岭）；《逸周书》曾提到莎车等地所盛产的“白玉”、“橐驼”、“野马”等等。这说明，当时中原人对于西域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彼此间的交往已经开始。对于这一点，今天的地下考古发掘资料也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例如，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始社会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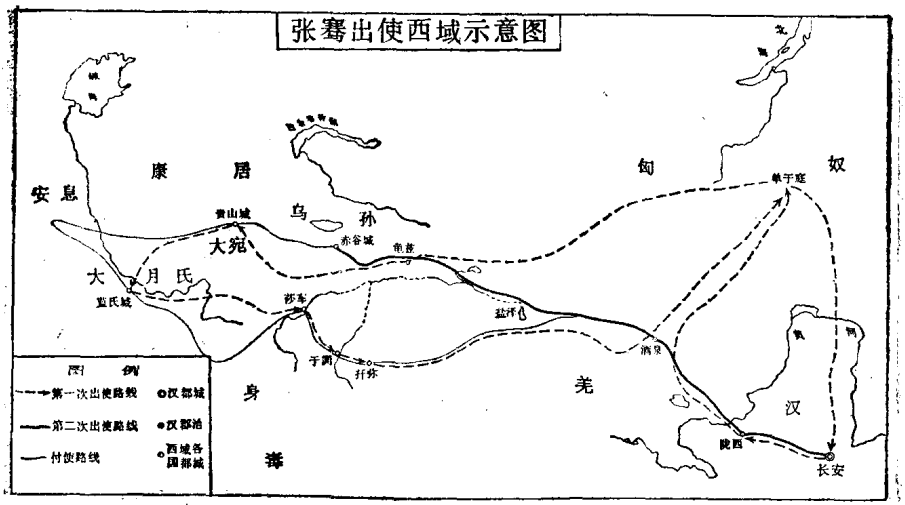
① “西域”一词在我国古籍中所表达的地理概念不完全一致。从狭义讲，指包括天山南北的我国广大西部疆域；从广义讲，泛指西方，即不仅包括我国西部，还包括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这里指的是前一种概念。

中，发现有产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海菊贝；在今苏联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地区发掘的一个公元前五世纪的墓葬中，出土不少产于我国内地的丝织品，有的丝织品上还绣有内地所特有的凤凰图案；在新疆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公社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过战国时代由内地制作的素面小铜镜等。

西汉初年，西域处于我国北部的匈奴奴隶主的控制之下，他们在这里设置了“僮仆都尉”一职，对当地人民进行统治。匈奴奴隶主还经常发动掠夺战争，骚扰中原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刘彻提出了“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这个战略决策不仅符合西汉王朝巩固统治的需要，而且反映了西域和中原实现政治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为了实现这个决策，汉武帝决定首先派遣使者前往西域进行联络。当时到西域去的道路十分艰险，河西走廊又被匈奴所占据，中途随时都有丧失生命的危险。要完成任务，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人充当使者才行。为了找到合适人选，汉武帝决定公开招募。这时，有一个担任郎官的年轻下级官员勇敢地出来应募，并被汉武帝所选中。他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张骞。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带着一百多名随行人员，由长安出发，前往西域。这是他第一次出使西域，前后十三年时间，历尽了千辛万苦。张骞在途中曾被匈奴扣留，达十年以上。尽管如此，张骞还是

到达了西域，而且越过葱岭，远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地，进行了很多联络工作。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张骞回到长安，带回了有关西域的丰富知识。汉武帝为了嘉奖张骞，授予他太中大夫的官职。



张骞出使西域示意图

七年以后，即公元前119年，张骞又以中郎将的身份，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一同前去的有好几个副使和三百名随从人员。他们带着上万只牛羊和大批物资，每人骑马二匹，沿着河西走廊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张骞向乌孙王送交了汉朝的礼物，传达了汉朝约乌孙夹击匈奴的建议。虽然当时由于乌孙内部发生王位继承的纷争，未能立刻接受汉朝的建议，但是双方的关系大大加强了。张骞返回长安时，乌孙王派专使随同到汉朝，贡献著名

的“西极马”作为答谢。此后不久，汉与乌孙又进一步通过和亲结成了联盟。张骞在乌孙时，还向天山以南的城邦诸国以及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派去了副使，进行联络。他们也都先后完成了任务，偕同西域各族和中亚邻邦的使者，回到长安。

通过张骞的两次出使，增进了中原人民和西域部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削弱了匈奴在西域的控制。这些都为汉朝政府击败匈奴、统一西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这以后，又经过数十年的激烈斗争和几次战争，西汉王朝终于在西域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统治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在汉与西域各部族的联合打击下，向汉朝政府投降。汉朝政府宣布撤销匈奴所设的“僮仆都尉”，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标志着西域与中原在政治上获得了统一。从这时起，直到东汉末期，西域都护府作为汉朝中央政府派出的行政机构，基本上有效地行使了对西域地区的管辖。

西域都护府的最高长官是都护。它由汉朝政府直接委派，职责是代表中央政府处理西域地区的军政事务，维护地方秩序，保卫国防。都护的办事机关西汉时设在西域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东汉时先后迁至龟兹、焉耆、疏勒等地。西汉时期，一共向西域派过十八任都护。东汉时期，继续派遣都护(后期改为西域长史)

到西域。班超、班勇父子就是东汉时有名的西域都护和长史。

西域都护下设副校尉、丞、司马、侯、千人等官员，也都由汉朝政府委任，负责具体事务。除此之外，汉朝政府还册封西域地区各部族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作为西域都护属下的地方官吏，在当地进行统治。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当时西域各地“自驿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① 另外，西汉政府从公元前48年（汉元帝初元元年）开始，还在西域设立“戊己校尉”，掌管屯田事业。

“汉归义羌长”铜印
（新疆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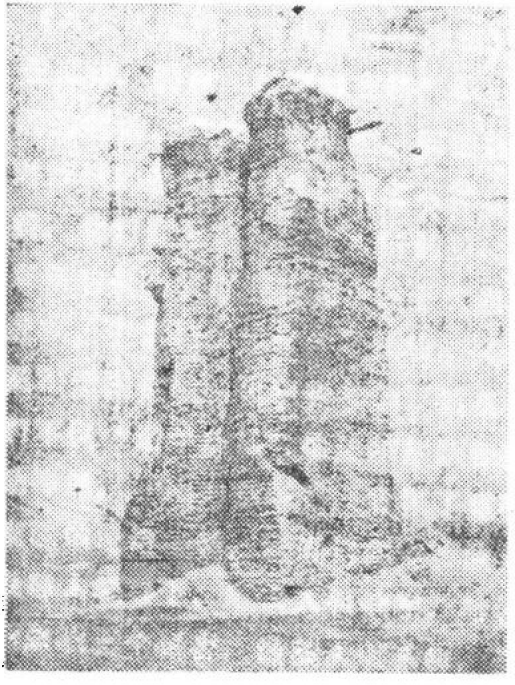
汉西域都护府的管辖地域，包括西域的五十个部族和地区。在这些部族和地区中，有二十二个分布于天山以南，十六个分布于天山以北，十二个分布于葱岭及其以西。当时汉朝的西部疆域中包括有乌孙、大宛和葱岭各部。

乌孙所在地，包括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伊塞克湖周围和楚河流域。乌孙的首领是大、小“昆

①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册，第3928页。

弥”（昆弥即头领的意思）。大昆弥住在伊塞克湖东南的赤谷城。乌孙受汉朝政府和西域都护府的管辖，大、小昆弥的承袭都要由西域都护报请汉朝政府选定，并且颁给印绶。汉皇室还多次与乌孙昆弥通婚，并且曾经派遣长罗侯常惠带领士兵一千多人在赤谷城附近驻守和屯田，足见汉朝政府对乌孙地区的重视。

大宛所在地，是今天苏联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大宛王住在贵山城（今苏联卡散赛），也归西域都护管辖。大宛王每年向朝廷贡献当地名马两匹，还要派自己的儿子到朝廷去做侍卫。汉朝政府也经常派人到大宛颁发赏赐，进行镇抚。



西汉烽燧台遗址
（在今新疆库车县克孜尔尕哈）

汉朝统一西域对于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西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把西域和中原的经济、文

化交流和各民族间的团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大量传入西域，西域的许多特产也被移植于中原。例如，今天遍及中原各地的葡萄、苜蓿，原都是大宛的特产；核桃、黄瓜、大蒜等等，也是从西域传来的。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也对中原汉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汉朝统一西域，还开通了以“丝绸之路”而著称的我国和西方国家的交往途径，对古代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唐朝对西域管辖的加强

东汉政权灭亡之后，我国国内进入动荡和分裂的时期。西域和内地一样，出现了若干个地方政权割据的状况。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西域和中原仍然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一些中原地区的王朝，仍对西域行使着一定的管辖。如三国时期的曹魏和后来的西晋，都曾在西域设置过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分别驻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和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十六国时期的前凉，于公元 327 年（东晋咸和二年）在西域设高昌郡和田地县（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首次把内地的郡县制推行到了西域；前秦和后凉政权曾在西域置都尉或大都尉；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曾在西域设西戎校尉（驻鄯善），并在焉耆等地设镇，进行管辖。

隋唐时期，我国再次出现大一统的局面。这时，中央王朝对于整个西域地区的管辖关系不仅完全得到恢复，而且进一步加强了。

唐朝政府在西域所实行的管辖制度，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西域地区东部，实行的是和内地一样的州、县、乡、里制度。唐朝政府在这类地区所设立的州县有：伊州，治所在伊吾城（今新疆哈密县境），下辖三个县；西州，治所在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下辖五个县；庭州，治所在金满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境），下辖四个县。这些州县，都由唐朝政府任命的刺史、县令进行管辖。另一类是在西域其他地区，实行都护府、都督府、州制度。在这些地区，唐朝政府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两个大都护府，下辖若干个都护府、都督府和州。大都护府和都护府的长官是大都护和都护，他们由中央直接派遣，下设副大都护、副都护、长史、司马等官员和一整套分管各项事务的机构。同时，唐朝政府在这类地区里保留了当地部族首领的政治地位，委任他们分别担任都督、州刺史等官职，通过这些首领对各部族人民进行统治。因此，这些人既是本部族的首领，又是唐朝政府的地方官吏，要受大都护府、都护府的管辖和征调。

唐朝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管辖的地域十分辽阔，远远超过了汉代。安西大都护府下辖二十多个都督府和上百个州。这些都督府和州，分布的地区不仅包括天山

南路和葱岭地区，而且还包括中亚的广大地区。其中在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就有康居都督府（今苏联境内撒马尔汗地区）、大宛都督府（今苏联境内塔什干地区）、休循州（今苏联境内费尔干纳地区）、安息州（今苏联境内布哈拉地区）等。北庭大都护府下辖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所属都督府和州的数量也很多。它的辖境不仅包括天山北路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而且向西远至今天的咸海。

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管辖和保卫边防，唐朝政府还在西域一些地区派军驻守；在北庭大都护府辖境内，曾设有瀚海军、天山军、金牙军、玉河军、清海镇、神山镇①等。在安西大都护府辖境内，有碎叶、于阗、龟兹、疏勒四镇驻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西四镇”（四镇中碎叶镇后来划归了北庭大都护府，又增补了一个焉耆镇）。此外，在葱岭地区还驻有“葱岭守捉”。

唐朝政府对西域地区管辖的加强，进一步巩固了我国中原和西域之间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中原人民和西域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交往。这时，内地所施行的“均田制”、“租庸调法”、屯田、驿馆等制度和货币在西域都得到了广泛推行和使用。西域大批少数民族人士进入内地，其中有的还成为唐朝政府中的名将大吏。内地汉族移居西域或到西域屯戍、做官的也不少。例如唐代

①“军”、“镇”和下面提到的“守捉”，都是唐朝的驻军单位。

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安西大都护府属下的碎叶城（在今苏联境内楚河南岸的托克马克城附近）。李白五岁时才随父亲从西域迁回到四川。唐代另一个著名诗人岑参曾两度到西域做官，写下了许多热情歌颂祖国西域风光的作品。他所写的《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诗句如下：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
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
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
蒸沙砾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阴火潜烧天地铲，何事偏烘西一隅。
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
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
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①

这里所歌咏的“热海”，就是今天的伊塞克湖。它是天山中一个由许多条山地小河汇聚成的非排水湖。由于湖水很深、含盐量高，加上湖面常刮着强烈的风，所以尽管当地冬季严寒、海拔高，湖水却是从来也不封冻的。“热海”即由此而得名。应当指出，岑参的诗虽然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色彩，但却准确地抓住了热海不冻、鱼

① 《全唐诗》，卷199。

丰、风大等自然特点，并非都完全出自虚构①。

随着政治上统一的加强，唐代中原和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更为扩大。如养蚕术、造纸术，都传入西域；水利灌溉事业在西域得到大规模兴办。而西域许多特产的牲畜、毛织品、玉、干果、药材、香料等，也大量输往中原，给中原人民的经济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在文化方面，中原和西域的相互交流更是广泛多样。例如，西域的乐曲、舞蹈在中原普遍流行。著名的唐代“十部乐”中，就有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五部来自西域。而传布中原文化的汉字，则在西域被各民族所广泛掌握和使用。汉文典籍，如《诗经》、《论语》等，在西域和内地一样，是学生必读的教本。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很快就能在西域地区流传。

清代我国的西北疆界在巴尔喀什湖

唐朝灭亡以后，我国又出现了暂时的分裂局面，西

①早在岑参之前，唐代僧人玄奘（公元602—664年）就曾根据自己的旅行调查，正确地记述过伊塞克湖的自然特点。他在《大唐西域记》一书中写道：“……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咸海），周千余里，东西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页）。与岑参同时代的文人杜环，曾随唐朝名将高仙芝的军队西行经过伊塞克湖，也作过热海“地寒而不冻”的记述（《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页）。可见，唐代人对于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是有很多了解和研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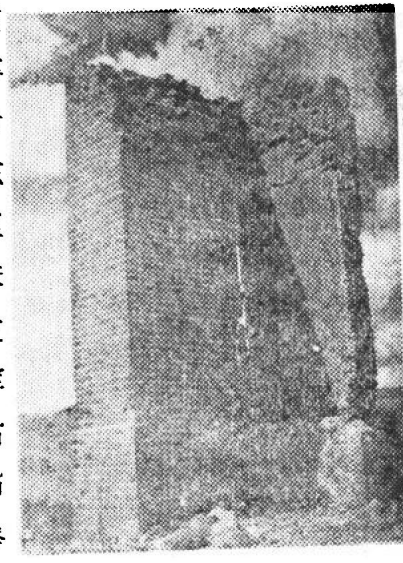
域地区也被几个当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所割据①。但是，西域这些地方割据政权仍与中原地区的王朝（如辽和北宋）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它们或者接受这些中原王朝的册封，或者履行朝贡制度。公元十二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西域建立了西辽政权。这个政权完全承袭中原王朝的职官制度和统治方式，其疆土从阿尔泰山直到中亚的咸海和阿姆河。十三世纪，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兴起，逐步统一全国，建立了元朝(公元 1271—1368 年)。元朝政府恢复和加强了对西域各地的直接管辖，先后设立了阿力麻里元帅府（驻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境）、别失巴里元帅府（驻别失巴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境）和北庭都元帅府、提刑按察司、宣慰司、织造局、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等军政机构。元朝之后的明朝政府，也曾在西域东部设置哈密卫，并通过册封等形式，对西域其它地区保持着一定的统辖关系。

代替明朝而兴起的清朝政权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同西域地区的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几朝的努力，清朝政府终于平定了西域准噶尔（厄鲁特蒙古中的一部）贵族的叛乱，重新统一了西域。由于这一地区对于清王朝来说，属于较晚臣服的疆土，因此清朝政府把它称为“新疆”。

---

①公元十至十一世纪，我国西域地区的割据政权主要有：以八拉沙衮和喀什噶尔为中心的黑汗政权；以于阗为中心的李氏政权；以高昌为中心的西州回鹘政权。

公元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朝政府正式在新疆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①），驻扎伊犁惠远城（今新疆霍城县南），统辖全疆军政事务。当时新疆的辖境，包括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广大地区。至于新疆北面的阿尔泰、萨彦岭地区，则属清朝政府设立的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乌里雅苏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又称扎布哈朗特）。伊犁将军下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分驻新疆各地进行统治。在地方行政方面，清朝政府根据新疆各个地域和民族情况的不同，实行了三种类型的制度：北疆东部，接近内地，汉族移居较多，主要实行州县制；蒙古、哈萨克部落和哈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聚居区，由清朝政府所册封的本族王、公、贝勒、贝子、台吉进行世袭统治；其它维吾尔族居住地区，基



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昭苏县境内的“格登山纪功碑”，系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过程中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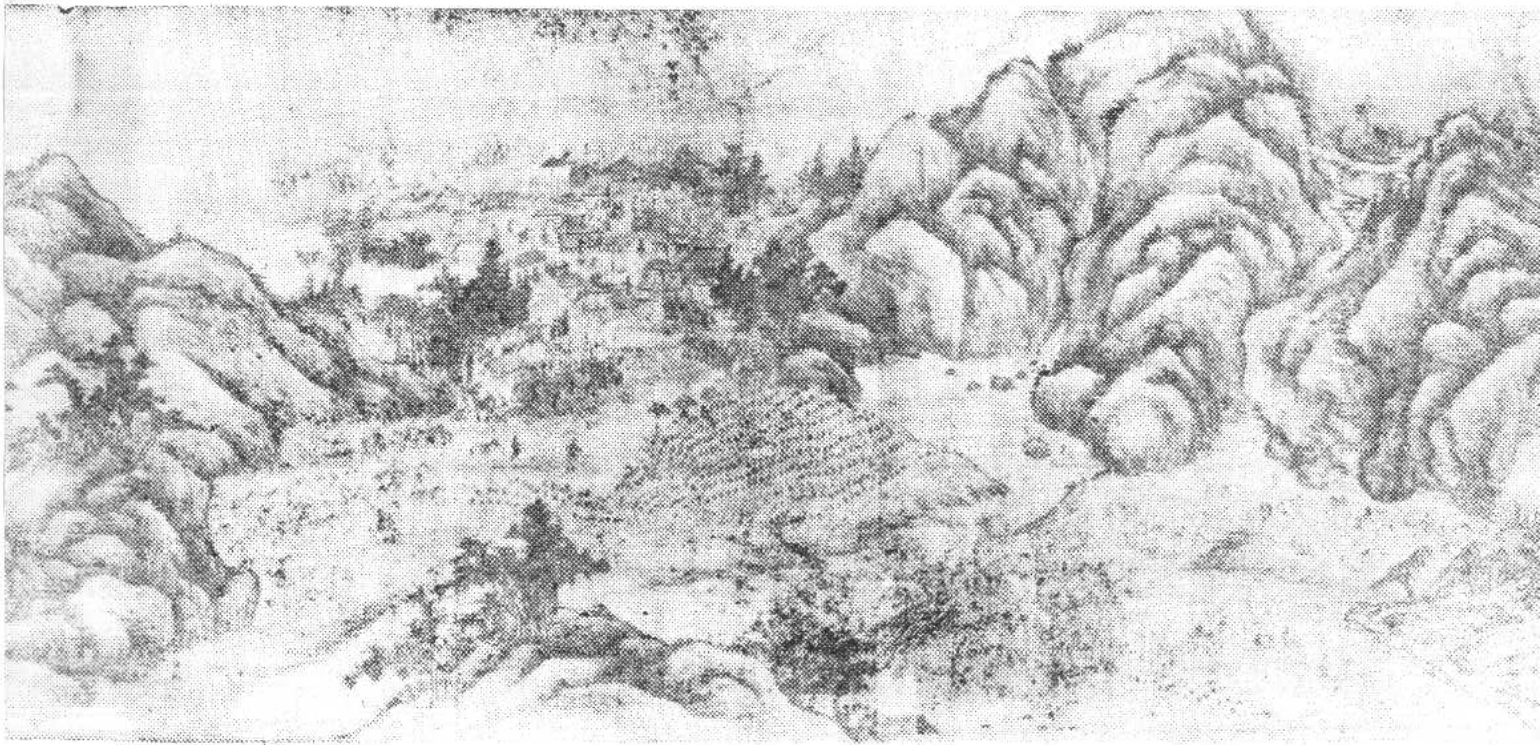
①将军是清代驻防地方的八旗军最高长官，在边疆地区，是全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

清乾隆年间建立的“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碑文

本沿用原有的伯克① 制度，仅作了一些限制伯克权力、加强政府管辖的变更。在军事方面，清朝政府在新疆各重要城镇都派有驻军，山川隘口、交通要道则设置台站、卡伦等把守控制。对于边境地带，由于当时地旷人稀，不可能派兵在国境线上长期驻守，所以清朝政府采取了一套严格的巡边制度，每年由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现在蒙古境内，当时属清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等地定期派出官兵（一般由参赞大臣或领队大臣率领），沿规定的路线，到边境地区进行巡查和会哨。

清朝政府的这些政治、军事、边防设施，大大加强

①伯克：当时维吾尔族中特有的官名，分为阿奇木伯克、伊沙噶伯克、哈孜伯克等不同的等级。阿奇木伯克为一城之首领，其余的伯克，分管各部门的事务。



反映清朝政府平叛战争经过的清代画卷——《平定准噶尔图》中的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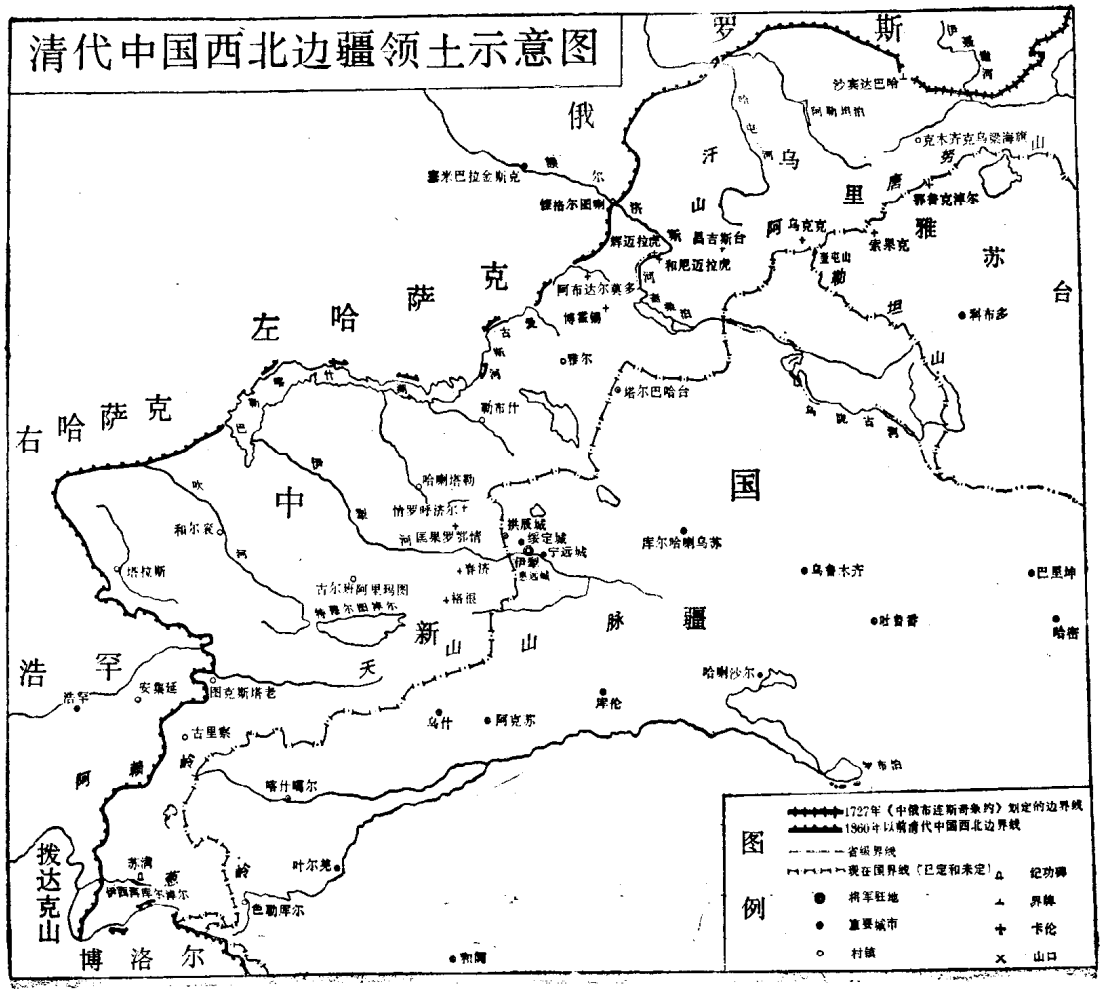
了中央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统治，增强了边防力量，使西北边疆和祖国内地空前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了。

这时，我国的西北疆界是明确的。这个疆界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巴尔喀什湖。清代大量的官方文件和书籍对此都作了记载。如乾隆年间官方编纂出版的《皇舆西域图志》中就写道："伊犁西路：自伊犁西北行，北至巴勒喀什淖尔（即巴尔喀什湖——作者），西至吹、塔拉斯，俱连沙碛，通藩属右哈萨克，东北接藩属左哈萨克界。""巴勒喀什淖尔，周回八百余里，伊犁全河，经流千里，屈折至此。百川万派，于焉归宿。盖准噶尔西北境最大泽也。"①这部书里所绘制的"西域全图"和"天山北路图"，也都清楚地将巴尔喀什湖划入我国界内。《嘉庆重修一统志》、《清朝通志》、《乾隆府州厅县图志》等书对于巴尔喀什湖属于我国疆界都有类似的记载。除了我国的大量文献记载之外，一些沙皇俄国和苏联的历史文献和地图也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如1958年苏联政府审定的《苏联历史地图集》，就明明白白地画着中国边界直到十九世纪还在巴尔喀什湖。

除巴尔喀什湖以外，清代我国西北疆界还有许多显著标志。例如，巴尔喀什湖东北方的铿格尔图拉（今苏联境内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距离我国内湖斋桑泊约二百公里，它是当时我国新疆和沙俄西伯利亚总督区

① 《皇舆西域图志》，卷13第1页；卷26第5页。

清代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示意图



的交界点，中俄双方的官方文件对此都有证明；我国西北疆界的最东端——沙宾达巴哈，是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所规定的中俄边界西端的最末一个界牌，这也是中俄双方签字划押、公诸于世的；在巴尔喀什湖南面，伊塞克湖（清代称为特穆尔图淖尔）当时是我国的内湖。根据《皇舆西域图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书的记载，伊塞克湖西面的楚河（清代称为吹河）、塔拉斯河流域也都属于我国伊犁地区辖境；我国西北疆界的南端，是在帕米尔高原的西部边沿。当时，我国在这一地区同中亚巴达克山（也称拔达克山）等部落的界线在许多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清朝政府始终在我国西北的这个疆界之内行使着有效的管辖，我国西北边疆的各族人民辛勤劳动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上，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掉的历史事实。

二　沙俄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割占我国西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

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早期侵略活动

沙皇俄国是在莫斯科公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欧洲国家。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当莫斯科大公伊万三世及其儿子瓦西里三世兼并其它俄罗斯诸侯的领地，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时，其疆域面积总共只有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东部边界还在北乌拉尔山的支脉，尚未到达亚洲。

公元1547年，瓦西里三世的儿子伊万四世开始亲政。他不满足于“莫斯科大公”的头衔，决定采用古代罗马皇帝“恺撒”的称号，自封为“沙皇”。从此，“沙皇”就成为俄罗斯君主的专称。沙皇俄国也就以此而得名。

沙俄是以封建农奴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封建农奴主的阶级本质决定了沙俄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残暴性、贪婪性和掠夺性。从第一代老沙皇开始，俄国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十六世纪下半叶，沙俄越过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向

西伯利亚扩张。到十七世纪初，它已经占领了鄂毕河中下游和叶尼塞河中下游的地区。此后，沙俄一面继续东侵，向勒拿河流域、进而越过贝加尔湖和外兴安岭向我国东北边疆扩张；一面把侵略魔爪伸进了我国的西北边疆。

早在1607年，沙俄西伯利亚殖民当局就曾派遣二百名哥萨克，武装入侵我国西北边疆的蒙古族厄鲁特部落。厄鲁特人民英勇抗击沙俄的侵略，和鞑靼蒙古人组成五千人的队伍，包围了沙俄哥萨克部队。侵略者遭到痛击，突围逃回了西伯利亚。经过这次接触，沙俄感到单凭武力难于征服我国厄鲁特人民，便多次采取派遣“使节”的所谓“怀柔”手段，企图收买厄鲁特各部首领，引诱他们背叛祖国，加入俄国国籍，以达到吞并这些部落辖地的目的。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厄鲁特蒙古中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沙俄向准噶尔的“派使”活动更是十分频繁。据俄国人统计，仅在准噶尔的巴图尔洪台吉统治时期（1635—1653年），沙俄派遣的所谓“使节”就多达数十次。但是，沙俄的阴谋活动，受到我国厄鲁特人民和爱国首领们的坚决抵制，始终未能得逞。

十七世纪末叶，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民族分裂主义的叛乱活动。沙俄乘机插手我国内政，加紧了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从1674年以后，沙俄几乎每年都和噶尔丹的代表进行接触，密谋建立“军事同盟”。沙俄还利用噶尔丹作为自己侵华的工具。1688年，即《中

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夕，沙俄就曾授意噶尔丹由西面向蒙古喀尔喀部发动进攻，牵制清军和喀尔喀部人民在东北和北部边疆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后来，沙俄特使柯罗文和伊尔库次克总督吉斯良斯基又把一个名叫基比列夫的间谍派到噶尔丹身边，继续鼓励和支持噶尔丹的武装叛乱，并且答应向噶尔丹提供军事援助。正因为有沙俄在背后支持，噶尔丹才敢于进一步扩大叛乱的战火，于1690年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率兵攻入内蒙。因此，清朝皇帝康熙当时曾召见在北京的俄国使者吉里古里·伊法尼齐，指出："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今乃扬言会汝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①给沙俄支持噶尔丹叛乱、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行径以严重警告。

1697年，噶尔丹叛乱失败、服毒自杀以后，沙俄收买和利用准噶尔上层分裂分子的活动并没有停止。1721年和1732年，沙俄曾分别派遣温科夫斯基和乌格留莫夫到准噶尔部，与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进行勾结。沙皇彼得一世在给温科夫斯基的训令里，要温科夫斯基向策妄阿拉布坦表示："如果策妄阿拉布坦与俄国签订臣服条约，俄国就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可以举行一次军事示威。"彼得一世还要求温

① 《清圣祖实录》，卷146，第8页。

科夫斯基“设法使策妄阿拉布坦让与领土，以便在这些领土上建筑堡垒要塞”①，企图从军事上控制准噶尔。沙俄的这些侵略活动，再次引起清朝政府的强烈抗议。1722年，康熙曾召见沙俄在北京的使臣郎克，向他提出质问，并把他驱逐出境。

在对准噶尔上层进行政治收买、策动叛乱的同时，沙俄还多次派遣侵略军，蚕食准噶尔部的北部辖地，甚至企图建立一条纵贯准噶尔直抵叶尔羌的俄国堡垒线，以侵占我国西北边疆的广大地区。1715年，彼得一世曾经野心勃勃地派遣一支四千五百人的“远征军”，由中校布赫戈列茨率领，侵入准噶尔地区，准备上溯额尔齐斯河，向叶尔羌进发。这年10月，布赫戈列茨侵略军到达准噶尔部的亚梅什湖（清朝文献称为达布逊淖尔）畔，强行修建堡垒，企图以此作为继续前进的立脚点。可是，沙俄侵略军受到我国准噶尔人民的英勇阻击。1716年2月，准噶尔部军民近万人在策凌敦多卜率领下，包围了亚梅什湖畔的俄军堡垒，勒令俄军从准噶尔土地上撤走。由于布赫戈列茨拒不服从，凭借堡垒进行顽抗，准噶尔部军民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战斗从2月一直进行到4月，沙俄侵略军大部被歼灭。同时，从托博尔斯克赶来增援的俄国军队和辎重，也被准噶尔部军民阻击在离亚梅什湖五十多公里的地方，全数俘获。在这

①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中译本，第80—81页。

种情况下，布赫戈列茨不得不带着七百名残兵离开亚梅什湖，逃回西伯利亚。沙俄对我国准噶尔的这次入侵，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布赫戈列茨也被召回俄京彼得堡受审。彼得一世对我国准噶尔的野心仍然不死，于1720年又派利哈列夫率领一支侵略军窜入准噶尔地区。这支侵略军乘船溯额尔齐斯河而上，一直深入到斋桑泊一带，在该泊以东八十多公里的地方登陆，准备修筑堡垒，建立侵略据点。准噶尔部军民又一次给沙俄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使利哈列夫这伙强盗无法在岸上立足，不得不从原路退回托博尔斯克。

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派兵进驻西北边疆，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沙俄千方百计地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清朝政府的平叛行动。它居心叵测地屯兵额尔齐斯河和奥伦堡一带，秘密勾结准噶尔叛匪，准备伺机而动。准噶尔叛匪头目阿睦尔萨纳被清军击败之后，沙俄还主动“邀请”这个中华民族的败类到俄国“避难”，企图把他豢养起来，作为日后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的工具。只是由于清朝政府在西北边疆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迅速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加上沙俄当时正在欧洲与普鲁士进行争夺霸权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抽不出很多兵力到东方来，它利用准噶尔叛匪分裂我国西北边疆的阴谋才未能得逞。清朝政府一再向沙俄交涉引渡逃犯，阿睦尔萨纳也因患天花病而死，在这种情况下，沙俄才无可奈何地把这个叛匪头目的尸体交出来，送给清

朝政府验视。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胜利，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消除了西北边疆的分裂割据势力，恢复了祖国的统一，而且沉重打击了沙俄侵略者，对于加强边防、保卫西北领土起了重要的作用。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沙俄迫于形势，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对我国西北边疆改用“渐进”和“审慎”的侵略方针，即主要采取派遣间谍窃取情报、偷偷越界蚕食我国土地、在我国西北边界外围建立侵略基地、集蓄侵略力量等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侵略活动。即使是这种较“隐蔽”的侵略行径，清朝政府也多次提出抗议，予以反击。例如，1763年沙俄西伯利亚殖民当局派人窜入我国西北的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地区，偷偷地在色毕河（今苏联境内恰雷什河上游）等地建造房屋、树立木栅。清朝政府发觉后，立即下令边防部队“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赶走了入侵者。1825年，沙俄派遣上校舒宾率领三百多名哥萨克士兵侵入我国巴尔喀什湖东南地区，在库克乌苏河（今苏联境内卡拉塔尔河）沿岸的哈喇塔拉一带私盖房屋，扬言要“筑城种地，为屯兵之所”。清朝政府为此向沙俄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在给沙俄枢密院① 的照会中明确指出：“我朝自平定准噶尔后，釐定

①枢密院是1711年沙俄设立的最高行政机构，以后权力逐渐削弱，成为咨询机关。

疆界，凡爱古斯、勒布什、哈喇塔拉，均立有鄂博①。是哈喇塔拉系我朝戡定疆土，舆图所载甚明。今俄罗斯越境远来，盖房侵占。经我查边领队大臣查出，不可不询问明确，……应即饬令尔国守边头目速行拆毁。”②在清朝政府的抗议下，沙俄政府虽然多方狡辩，最后也不得不拆除了非法越界建盖的房屋，一时不敢再到这一地区进行侵略活动。

总之，1840年以前，沙俄尽管已经开始了对我国西北边疆的早期侵略，但是由于当时清朝的国力还比较强大，对沙俄侵略者进行了有效的反击，才使得沙俄的侵略阴谋基本上未能得逞。

1840—1860年间沙俄对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武力侵占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下，开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这时，清朝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对外态度也越来越趋向于妥协投降。沙俄利用这一形势，对我国西北边疆展开了大规模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处于边境地区的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沙俄侵略者铁蹄

①鄂博：蒙古语，原译“堆”，是我国北方游牧部落中用石块堆叠而成的境界标志，后来成为中俄两国间分界的标志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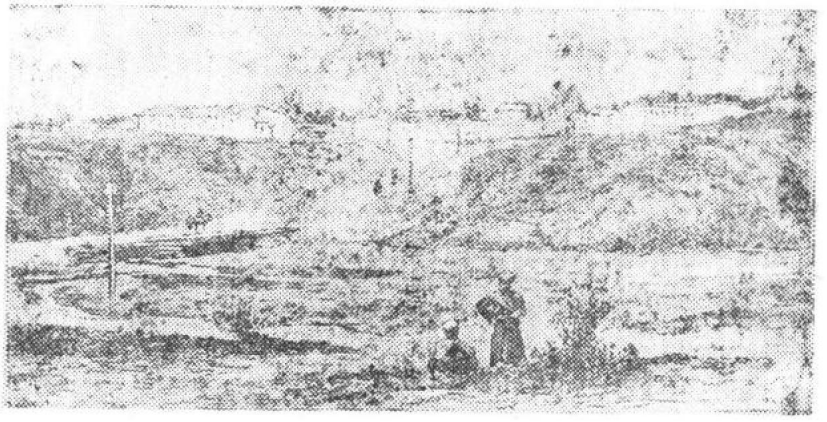
②《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15—16页。

的践踏，成为沙俄最早所要猎取的侵略目标之一。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沙俄西西伯利亚殖民当局①就不断派遣军队，越过我国边界上的爱古斯河（今苏联境内阿亚古斯河），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进行武装渗透。1846年，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认为公开侵占我国领土的时机业已成熟，便悍然派遣军队沿着1825年舒宾上校入侵的老路，向我国领土纵深推进，强占了巴尔喀什湖东南库克乌苏河上游一带。次年，沙俄侵略军根据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旨意，在这里建造了一个侵略堡垒，取名为“科帕尔”。从此，这里就成了沙俄在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从事侵略的据点。1848年，沙俄政府又下令在科帕尔设置“警察官”，派遣西西伯利亚侵略部队中的校级军官充当这个职务，凭借武力大肆扩张侵略。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俄进一步从科帕尔向南入侵。1854年，尼古拉一世批准了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关于侵占我国伊犁河以南土地和修筑堡垒的报告。同年，由科帕尔的沙俄“警察官”彼列梅斯里斯基带领军队，侵入我国伊犁河以南阿拉木图河岸的古尔班阿里玛图一带，在这里修筑了又一个侵略堡垒——“维尔内”堡垒（今苏联阿拉木图）。

①沙俄于十七世纪吞并西伯利亚以后，设立西伯利亚总督，进行殖民统治。1822年以后，又将西伯利亚划分为东、西两个辖区，分别由东西伯利亚总督和西西伯利亚总督进行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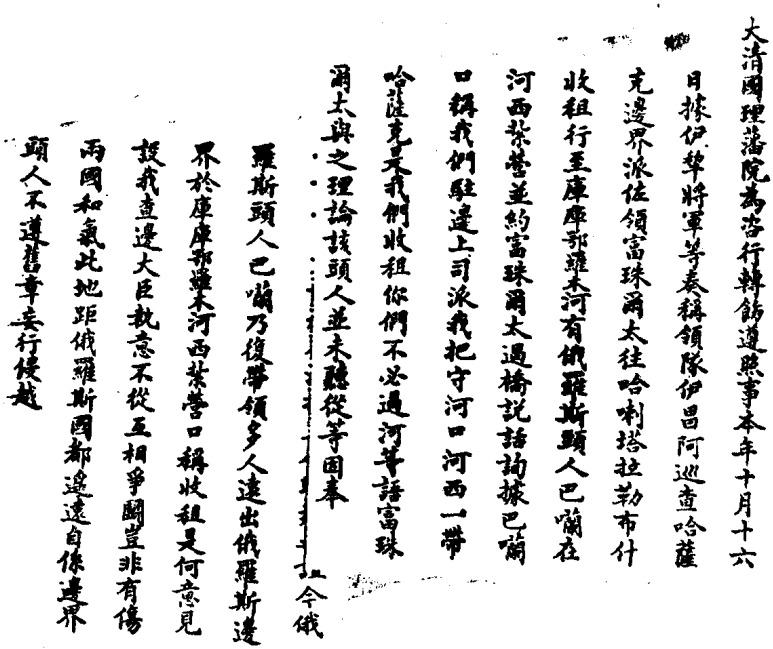
沙俄在我国巴尔喀什湖东南地区建立的侵略据点——维尔内

除了科帕尔、维尔内以外，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沙俄在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非法建立的侵略据点还有：科克佩克特堡垒（位于我国斋桑泊西北面的楚克里克河边）、乌尔扎尔堡垒（位于我国阿拉湖北面的雅尔河边，即原清朝肇丰城所在地①）、列普辛斯克堡垒（位于我国勒布什河上游）等。沙俄以这些堡垒作为侵略基地，把从西西伯利亚调来的大批哥萨克部队移驻于我国境内，大肆营造殖民村，修筑军用公路，霸占当地哈萨克等族人民的田地、牧场，进行野蛮的军事征服，从而非法占领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我国的大片领土。1856年，沙俄政府竟悍然宣布，在我国西北领土上成立由西西伯利亚总督管辖的“阿拉塔夫区”（以维尔

①肇丰城，原来是清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驻地，后来因为这里冬季雪大，参赞大臣认为不宜久驻，才将治所向东迁移到楚呼楚城（今塔城），肇丰城也因此废弃。

内为中心），企图把我国这一地区并入沙俄的版图。

沙俄对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的野蛮侵略，遭到了我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清朝巡边部队多次同入侵俄军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清朝政府也曾于1849年11月通过理藩院①行文沙俄政府，抗议沙俄的所作所为，并举出1825年俄军入侵哈喇塔拉、经中国提出抗议后不得不拆毁所盖房屋的事实，说明中国一向对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拥有主权，要求俄国军队立即从中国领土


大清國理藩院為咨行轉飭遵照事本年十月十六
日據伊犂將軍等奏稱領隊伊昌阿巡查哈薩
克邊界派往領富珠爾太往哈喇塔拉勒布什
收租行至庫庫郭羅木河有俄羅斯頭人巴蘭在
河西紮營並約富珠爾太過橋說話詢據巴蘭
口稱我們駐邊上司派我把守河口河西一帶
哈薩克是我們收租你們不必過河等語富珠
爾太與之理論該頭人並未聽從等因奉
令俄
羅斯頭人巴蘭乃復帶領多人遠出俄羅斯邊
界於庫庫郭羅木河西紮營口稱收租是何意見
設我查邊大臣執意不從互相爭鬬豈非有傷
兩國和氣此地距俄羅斯國都遠遠自係邊界
頭人不遵舊章妄行侵越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清理藩院给俄罗斯的咨文

①理藩院是清朝政府中负责管理新疆、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在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前，清朝同俄国的外交事务也由理藩院负责处理。

上“全数撤回”，“毋得占越”。但是，沙俄政府倚仗自己的武力，蛮不讲理，它一面在给清朝政府的复文中为自己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的行径辩护，硬说这一地区属于俄国所有，建立堡垒是根据该地哈萨克人“再三恳请”才进行的；一面继续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增调侵略部队和粮食储备，作好用武力对付清朝政府的准备。由于当时清朝政府对内正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对外采取苟且因循的妥协方针，加上西北边疆的防御力量早已十分薄弱，所以对于沙俄的侵略行为除口头上的抗议外，没有能够采取实际的反击行动。沙俄就是利用这种情况，逐步镇压了当地我国人民的反抗，建立起了沙俄的军事殖民统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沙俄又向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我国伊塞克湖地区伸出了魔爪。1856 年时，一个叫哈明托夫斯基的沙俄上校带领着哥萨克骑兵队，从维尔内出发，侵入伊塞克湖地区，在我国柯尔克孜族（清代称为布鲁特）部落中间烧杀抢掠，肆行骚扰。哈明托夫斯基还企图通过欺骗手段，在伊塞克湖地区建立沙俄的侵略据点。由于柯尔克孜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这个阴谋才未能得逞。哈明托夫斯基侵略军从伊塞克湖地区撤走之后，接着又来了一个打着“科学考察”招牌的沙俄侵略分子。这个家伙名叫谢苗诺夫。他带着一大群武装“护送队”于 1856—1857 年间两次窜到我国伊塞克湖地区，一面进行地理观测，搜集情报；一面在我国柯尔

克孜部落中大搞收买活动，企图诱迫当地部落首领加入俄国国籍。不仅如此，谢苗诺夫还从伊塞克湖东行，窜入我国天山中部的特克斯谷地，窥探伊犁和喀什噶尔间的重要通道——穆扎尔特达坂。谢苗诺夫“考察”回国以后，立即向沙俄政府献策，鼓吹俄国应当占领我国的伊塞克湖地区，把俄国国界“一直延伸到天山雪峰”。他还把占领伊塞克地区的殖民意义与占领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相比，叫嚷：“在这里的不断垦殖对俄罗斯所建立的功勋，不比占领黑龙江沿岸为小！”①

继伊塞克湖地区之后，我国楚河流域也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遭到沙俄的侵略。当时清朝政府在这里的边防力量十分薄弱，中亚浩罕②的势力已经侵入这一地区，并在楚河上游修筑了皮什别克、托克马克等堡垒。沙俄在向楚河流域入侵过程中，打出“防御浩罕”的骗人旗号。可是，这根本掩盖不住它侵略我国领土的罪行。1860年，沙俄竟出动两千多人组成的侵略军，在上校齐麦尔曼率领下向我国这一地区大举进攻，先后攻占了托克马克、皮什别克等地。后来，这支侵略军虽然在当地我国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反抗下不得不撤回了维尔内，但是沙俄对我国楚河流域的入侵却越来越频繁，最后终于在1864年完全占领了这一地区。

---

①谢苗诺夫：《天山游记》，莫斯科1947年版，第195页。

②浩罕是当时中亚的一个封建王国，紧邻中国新疆，1876年被沙俄吞并。

在向伊塞克湖地区和楚河流域入侵同时，沙俄还多方窥探和觊觎我国南疆的喀什噶尔地区。当1857年中亚浩罕汗国利用原喀什噶尔和卓后裔倭里汗入侵喀什噶尔时，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就曾草拟过一份秘密报告，题为“关于喀什噶尔事件和我们对它的态度”。报告中建议沙皇政府抓住有利时机，更积极地插手于喀什噶尔的事变，以达到侵吞我国这一地区的目的。沙俄政府根据这个报告，给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下达了向中国边境集结侵略部队的命令，并要加斯弗尔德派人到喀什噶尔刺探情报，设法与入侵中国的倭里汗进行勾结。加斯弗尔德当时甚至草拟了派俄国兵支持倭里汗的行动计划。他得意扬扬地宣布说：“在目前中国政府所处的困境中，可以极有把握地等待喀什噶尔的分裂。”①沙俄的这个侵略计划后来虽然由于倭里汗被我国军民迅速击溃而未能实现，但它染指我国喀什噶尔的野心却丝毫没有减退。1858年10月，沙俄派了一个名叫瓦里汉诺夫的骑兵中尉，化装成乌兹别克商人，混进我国喀什噶尔，进行特务活动达半年之久，盗窃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后来成为沙俄政府制订和推行侵略我国西北边疆政策的重要资料。

①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莫斯科1960年版，第108页。

打开我国西北大门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在武装侵占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的同时，沙俄还以“通商”为手段，对我国西北边疆疯狂地进行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俄两国陆路贸易的地点仅限于我国北部边境上的恰克图一处。在西北边疆方面，清朝政府规定有不准与俄国通商的禁令。可是，沙俄政府出于殖民掠夺的需要，长期来竟无视我国方面的禁令，鼓励俄国商人潜入我国西北进行非法贸易，并且不断派遣特务到伊犁、塔城等地搜集商务情报，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侵略活动作准备。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俄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沙俄寻找国外市场的欲望更加强烈。同时，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后竞相争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也大大刺激了沙俄的胃口。沙俄这时竭力要在“英国人不易达到，而距俄国则较近”的我国西北开辟新的对华贸易市场。为了这个目的，1845年沙俄专门派外交部的官员柳比莫夫化装成商人到伊犁地区刺探情报。接着，1847年沙俄政府通过在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首领佟正笏，向清朝政府提出了在我国西北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进行通商的要求。沙俄政府还指示佟正笏在交

涉过程中“不要吝惜金钱”，采取贿赂手段，收买清朝的官员，以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但是，清朝政府坚决拒绝了沙俄提出的要求。此后，沙俄继续就这一问题纠缠不休。1850年1月，沙俄又借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换班之机，派遣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携带俄国政府的咨文来到北京，重申在我国西北三处通商的要求。由于这时正是沙俄大举入侵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清朝政府向沙俄提出抗议交涉的时刻，加上又有俄国商船闯入我国上海要求通商的事件发生，清朝政府虽然明知沙俄提出的在西北三处通商的要求是心怀叵测，不愿意答应，但是害怕会“激起事端”，不得不同意了沙俄提出的部分要求，允许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与沙俄建立通商关系，而对喀什噶尔通商仍然表示拒绝。

为了谈判伊、塔两处中俄通商的具体事宜，清朝政府指派伊犁将军奕山、参赞大臣布彦泰在伊犁与俄方代表科瓦列夫斯基进行会商。在这次谈判中，科瓦列夫斯基利用奕山、布彦泰的软弱和昏聩，施展诱骗和威逼的软硬两手，攫取了在我国西北的许多侵略特权。根据1851年8月6日双方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商人可以到我国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进行免税贸易，并可在指定区域内盖房居住、存放货物，即建立所谓“贸易圈”。同时，沙俄还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设置领事的政治特权。并且规定，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犯罪，中国政府不能加以究办，需交俄国领事

自行裁决。这是沙俄在我国西北地区取得领事裁判权的开始。

沙俄在谈判中，还不顾清朝政府的明确拒绝，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喀什噶尔通商问题，进行纠缠。奕山、布彦泰根据清朝政府的指示，坚决表示不能满足俄方这一苛求。科瓦列夫斯基见无法达到目的，宣布关于这个问题"俟数年后或数十年再看机会"①。这是给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中开放喀什噶尔通商的规定埋下了伏笔。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是鸦片战争以后沙俄逼迫清朝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中俄间的不平等条约。它的性质和同时期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还应当指出的是，沙俄这时之所以能够不费一兵一卒、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我国身上，固然是由于沙俄采取了威逼和诱骗的侵略手段，同时也是借助于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西方列强纷纷迫使清朝政府出让权利的形势而取得的。因此，《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既是沙俄侵略我国西北的直接产物，又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中国共同侵略的结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1859年在评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侵华政策时，就曾经指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第6页。

出："当俄国要跟中国缔结通商条约时，他（指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作者）曾用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逼得它不得不对俄国作某些本非情愿的让步。"① 马克思的评论既说明了这一时期俄国迫使我国缔结的"通商条约"（包括《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在内）的不平等性质，也说明了这些条约的产生同世界帝国主义侵华总形势的关系。

1851 年以后，沙俄利用《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所规定的种种特权，肆意扩大在我国西北边疆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势力。伊犁、塔城两地的沙俄领事馆建立后，被沙俄政府派来充当侵华先锋的沙俄领事们，以"外交官"的合法身份驻在我国西北，干着各种非法的侵略勾当。他们不仅亲自出马，盗窃情报，干预我国内政，从事颠覆、分裂我国西北边疆的罪恶活动，而且利用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怂恿和支持俄国商人以及各式各样的"旅行家"、"探险家"们在我国西北土地上胡作非为，横行无忌。如首任驻伊犁领事扎哈罗夫（清朝文书译为"杂哈劳"），就是一个道地的特务分子。他精通满语和汉语，在领事任内积极为沙俄侵吞我国西北领土窃取情报，出谋划策，并且偷偷绘制了我国西北边防和卡伦地图，因此受到沙皇政府的赏识，后来被任命为与清朝政府谈判和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俄

① 《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 卷，第 47 页。

方首席代表；首任驻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曾一手策划、制造了霸占我国雅尔噶图金矿、屠杀我国矿工的血腥事件①，后来被派充为俄国侵华特使普提雅廷和伊格纳提耶夫的随员。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中的免税贸易等规定，使我国西北地区在沙俄的经济侵略面前丧失了利用关税保护自己的能力，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1851年以后，沙俄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贸易额获得迅速增长，沙俄工业品和半工业品大量涌进我国西北市场，使我国西北边疆的社会经济状况日趋恶化。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还为沙俄进一步侵占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开了方便之门。1851年以后，沙俄不仅利用驻在我国境内的俄国领事和商人们为其领土扩张服务，从事各种阴谋活动，而且公然借保护俄国来华商队的安全为名，肆意派兵占领我国西北卡伦之外的领土和交通要道，为以后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割地条约作了准备。所以，沙俄侵略分子巴布科夫后来在谈到《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时，曾得意地说，这个条约“不仅在商业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俄国向中国西北和中亚细亚“继续推进的强大动力”②。巴布科夫的话，从反面

①详见本书第七部分。

②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彼得堡1912年版，第134页。

说明了这一不平等条约给我国西北所造成的危害。

《中俄北京条约》中关于中俄西疆“划分”的原则规定和沙俄的侵略部署

1840—1860年间，沙俄通过一系列侵略活动，武力强占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向我国西北边疆的许多地区伸出了魔爪。为了把这些已经造成的领土掠夺的事实用所谓“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进一步扩大占领范围，攫取尚未到手的东西，沙俄极力想要压迫清朝政府签订割地条约。

早在1857年，当沙俄派遣普廷雅廷来华，利用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侵华活动时，对我国西北领土的要求就是普提雅廷向清朝政府进行外交勒索的重要项目之一。1857年8月，普提雅廷在天津向清朝政府递交的“咨文”中公然声称：“东北至海，西至伊犁等地，两国接壤极多，遗有未定界址。现在阻止在该处居住，恐起争端，即应复行商定界址，敝国以此事为要。”①清朝政府接到这个“咨文”以后，曾当即答复普提雅廷：“西至伊犁，东北至海，虽地方辽阔，向来属于何国，人所共知，无何可议。”但是，普提雅廷并不死心，他继续利用英法联军的侵略武力，与英、法、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6，第13页。

美三国公使相勾结，进行活动。1858年6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普提雅廷乘机压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沙俄不仅取得了在我国沿海口岸通商、设领、传教等特权，而且在该约第九条内特别写道："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以"清理边界"名义割占我国东北和西北领土制造了借口。

《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沙俄更加露骨地提出了对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的要求。1859年4月，沙俄政府指令在北京办理换约手续的沙俄代表彼罗夫斯基（清朝文书译为丕业罗幅斯基），向清朝政府提出对《中俄天津条约》的八个"补充条款"，其中第三条就是要求在西部以我国境内的斋桑伯、阿拉套山作为中俄分界的标志。同年6月，伊格纳提耶夫从俄国来到北京，代替彼罗夫斯基与清朝政府谈判，他所提出的所谓"补续和约"草案，对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的要求更为明确和具体。伊格纳提耶夫还威胁说："倘中国仍不商办，本国即不论中国愿意否，仍然自己定界立牌"，中国莫怪俄国"私自办理，侵占地方"①。清朝政府对沙俄的这种无理要求，表示坚决拒绝，一再申明中国在西北部"本有分疆地界"，不容他人侵占。后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9，第31页。

来，伊格那提耶夫因袭普提雅廷的故伎，利用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的时机，以“调停人”的身份进行活动，逼迫清朝政府屈膝投降，终于在1860年11月14日同清朝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俄不仅继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又割走我国东北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攫取了在我国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张家口、喀什噶尔贸易免税、自由居住、传教和领事裁判等特权，而且在条约第二款中硬塞进了中俄西疆“划分”的原则规定，即：“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的这个规定，用心十分狠毒。因为，斋桑淖尔湖（即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即伊塞克湖）都是我国的内湖。在这两湖之外，还有我国广阔的领土。至于常驻卡伦①，只是清朝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所设立的军队哨所的一种，也根本不能代表

①“卡伦”是清朝政府所设立的军队哨所。当时我国西北边疆上的卡伦大致分为三类：移设卡伦，是设置地点按季节不同而移动的哨所；添撤卡伦，是根据季节变化或添或撤的哨所；常驻卡伦，是常年驻守、不移不撤的哨所。这三类卡伦都设于我国境内，距离边界还相当遥远。

我国国界，清朝政府每年派官兵到卡外巡边就是有力的证明。沙俄把我国内湖和常驻卡伦硬规定为中俄分界的标志，就是企图借此为依据，割走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把俄国边界一直推进到我国西北的城镇附近。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的文字在中文约本和俄文约本中是有差异的。例如，中文约本列为两国分界标志的“现在中国常驻卡伦”，在俄文约本中写做“中国现有卡伦路线”，没有“常驻”字样；中文约本对从沙宾达巴哈开始的两国分界走向，规定为“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俄文约本却写做“向西南到斋桑湖”。这些差异之所以产生，完全是沙俄自己制造的。因为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沙俄一手包办了起草条约俄文原本和把俄文本译成中文的全部工作，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实际上只充当了一个签字画押的角色。可是，后来沙俄在中俄塔城谈判过程中，对两种约本的差异采取了极其卑劣的态度，即尽量从两种约本中分别抽取那些它认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文字，交替用两种约本对清朝政府进行讹诈，以达到多侵占我国领土的目的。

《中俄北京条约》对中俄西疆“划分”仅仅作了原则规定，至于具体确定两国边界走向、经过地点以及建立界牌、鄂博等，还需要两国派代表专门会商和实地查勘。为了借具体会商勘界的时机最终实现侵占我国巴尔

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的罪恶目的，沙俄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又加紧进行了策划和部署。

1861年8月，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派遣鄂木斯克军团司令部的军官巴布科夫（清朝文书译为博补考）前来塔城，以商订划界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为名（其实这个问题当时已由清朝政府和俄国驻华公使在北京商定：谈判时间是1862年5月11日，地点在塔城），刺探我国西北边疆的政治、边防情报，并同沙俄驻塔城领事斯卡奇科夫进行密谋。巴布科夫从塔城回到鄂木斯克之后，立即整理他所搜集到的有关情报，赶到彼得堡去向沙皇和其它头目汇报。1862年1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召集陆军部、财政部、外交部的大臣们举行特别会议，研究中俄“划界”问题，进行侵略部署，并且决定委任巴布科夫、扎哈罗夫等为全权代表，前往塔城谈判。会后，沙皇又亲自召见巴布科夫，向他面授侵略旨意，并且赏给他一枚刻着沙皇名字的宝石戒指，以示鼓励。关于这次谈判中所要达到的侵略目标，则由一份俄国外交国务大臣哥尔查科夫签署的外交部训令向巴布科夫等人作了详细的指示。

在这份训令中，俄国外交部要求俄方代表在谈判中应当紧紧抓住《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作为向清朝政府勒索领土的借口；同时，又要尽量对该款作有利于沙俄的曲解，即“应该在这种意义上解释《北京条约》第二款，即新的国界要沿着迄今没有肯定下来的，但似乎

已经成为两国之间假定国界的现有中国常设卡伦线来进行”，设法“说服中国各委员，使他们在划定国界时接受以常设卡伦线为基础”①。这就是说，要把《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中关于以我国常驻卡伦为分界标志之一的规定，进一步歪曲成以常驻卡伦线为唯一的分界标志，而将该款中所规定的山岭、大河等分界因素统统置之不顾。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能够使沙俄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

在训令中，沙俄外交部还指示巴布科夫等人在《中俄北京条约》已经取得的侵略成果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把该约规定为界湖的斋桑泊和伊塞克湖设法据为俄国所有，理由是：斋桑泊对俄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占领伊塞克湖及其以东地域能够使俄国获得“在贸易上、尤其在军事上重要的桑塔斯山口”，掌握“通往东土耳其斯坦（指我国南疆地区——作者）的所有通路”②。显然，这是为进一步扩大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作准备的。

巴布科夫等人根据沙俄外交部的训令，制造了一个准备在谈判桌上压迫中方代表接受的中俄西段“国界草案”，也预定了一套进行讹诈的“行动方法”。这个“行动方法”就是：首先逼迫中方谈判代表接受俄方提出的对《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的歪曲解释，然后抛出

①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1页。
②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4页。

他们事先拟好的“国界草案”，要中方代表“作出绝对的答复”。假如中方代表不同意，俄国就以停止谈判作为要挟，同时加紧派部队强占俄方所要求的一切土地，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就范。巴布科夫自己曾说，这个“行动方法”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侵华分子、吞并我国东北大片领土的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完全同类事件中所掌握的那种方法”，即都是“以实际占领地方的办法来支持我们外交上的要求”①。

巴布科夫从彼得堡受命回到西西伯利亚，立即着手实施沙俄政府的侵略计划。1862年春，巴布科夫、扎哈罗夫和俄军驻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侵略头目——所谓的“阿拉塔夫区”长官科尔帕科夫斯基在科帕尔附近会晤。他们一面对即将到来的中俄塔城谈判作具体策划，一面调动侵略部队，从维尔内、科帕尔、科克佩克特、乌尔扎尔等据点全面出动，向我国常驻卡伦推进，占领他们自行确定的“中俄国界线”上的各个战略要地。中俄塔城谈判尚未开始，我国西北边疆已经完全处于沙俄军事威胁之下了。

1862——1864年的中俄塔城谈判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1862年7月，巴布科夫在进行了大量部署之后，

①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4页。

从科帕尔前来塔城，与清朝政府所派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举行会谈①。

8月3日，谈判正式开始。巴布科夫按照预定计划，抓住《中俄北京条约》中文约本第二款的字句进行歪曲，提出了“以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为界”的无理要求，并且拿出一张事先画好的地图，上面用红线标明中俄国界，把常驻卡伦之外的我国领土全部划入沙俄境内，要求清朝政府代表接受。明谊等人当即驳斥了俄方对《北京条约》的歪曲，指出该约对于中俄西疆划分只作了原则的规定，并没有详细指定逐段立界的处所，也没有“以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为界”的字句。所以，双方应当仔细研究条约，遵照过去的地图，“于从前已定旧界之外，专论从前未定之界”②。明谊等人还指出，常驻卡伦并不是中国国界，卡外大片土地，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塔尔巴哈台所属的爱古斯、勒布什，伊犁所属的特穆尔图淖尔、哈拉塔拉等地，向来是我国人民“游牧养生之地”，不能“分隶”俄国，并且当场拿出中国过去所绘制的舆图指给俄方阅看。在这些人证物证面前，巴布科夫一会儿假装没有听见，一会儿又强词夺理地进行争辩，致使会谈无法继续进行，只好改在8月6日再议。届日，俄使仍然坚持以常驻卡伦为界的蛮横要求，清朝代表据理辩驳，俄使竟然

①塔城谈判原定1862年5月举行，后因故改为7月。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第36页。

大肆恫吓，声称："若要如此，即可不议"，"我们只好带来兵队占踞卡外之地，不由你们不给"①。

这时，作为俄方谈判代表之一的扎哈罗夫也在接到沙俄政府委任后来到塔城。他来之后，俄方使出另一套花招，突然提出验核中方代表全权证书的问题，说要"先看凭据后，再行会议"。实际上，中俄谈判代表的证书早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已经双方验核过了。俄方这样做，不过是借故纠缠，向清朝政府的代表施加压力而已。果然，经过往返十余日的证书问题交涉之后，扎哈罗夫和巴布科夫虽然同意了与明谊等人重新举行会谈，态度却更加蛮横。扎哈罗夫在谈判桌上气势汹汹地说，如果不接受俄方提出的以常驻卡伦为界的要求，即是中国"废了条约"。他还辱骂清朝伊犁将军派兵前往常驻卡伦外进行正常巡边是"小人之行"，诬蔑中国在常驻卡伦以西原来所建的石碣等物是"私行偷立"、"不能为凭"。清朝谈判代表对这些谬论一一作了驳斥。扎哈罗夫和巴布科夫认为继续谈判下去不能达到讹诈目的，便于9月下旬抛出事先拟好的"国界草案"，声称中方代表必须在十天之内对这个"国界草案"作出肯定的答复，"照此办理"，否则俄方将终止谈判。明谊等人对于沙俄提出的"国界草案"表示要向清朝政府请示后才能答复，因此请俄方代表在十天期满后稍作等候。扎哈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第33页。

罗夫和巴布科夫不顾中方挽留，竟于当年10月单方面中止了谈判，启程回国。

1862年的塔城谈判破裂之后，沙俄加紧对我国西北边疆进行军事入侵和挑衅。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和亚洲司司长伊格纳提耶夫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谕旨，通知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要他进一步发动军事进攻，“尽可能实际上占据符合我国意图的全部国界线”，以“支持我国的要求”。同时，指示他“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人不表示我国方面同意恢复划界谈判的决心，并为此避免对中国地方当局作出边界问题的任何说明”①。根据这个指令，从1863年春季开始，沙俄军队在北起科布多地区、南到伊塞克湖和纳林河一带的我国西北边疆广大土地上发动全面入侵。他们在我国境内持械逞凶，伐木盖房，偷立界石，骚扰破坏。沙俄侵略军队在所到之处，武力胁迫当地我国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出具脱离中国的手印字据，谁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俄国君主的奴仆”，就要被赶出家园，牲畜、物品也要被抢掠一空。沙俄侵略军队还无理阻拦清朝官兵在边境地区的正常巡逻活动，甚至捣毁中国卡伦，驱逐和殴打中国守卡官兵。俄使巴布科夫也亲自出马，带领一支由骑兵和炮兵组成的部队，侵入我国斋桑泊地区，一直进逼到斋桑泊东面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附近。巴布科夫

①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52—253页。

自己曾说，这种抢占土地和“陈兵于中国卡伦线视野内”的作法，目的在于向中国人“清楚地表明斋桑湖和该湖以东到中国常设卡伦线的全部地方，作为我国实际上已经占领的地方，今后应该完全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①。

对于这些侵略和挑衅行动，清朝政府曾多次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沙俄撤回入侵部队，并迅速派代表到塔城重开谈判。清朝政府还就《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的解释问题反复申明自己的看法，驳斥俄方在塔城谈判中“故意偏解”条约的谬论。可是，沙俄政府在给清朝政府的复照中，却颠倒是非，反咬一口，说什么：“两国西北边界至今尚未议定，此系中国分界大臣之咎。因此不得谓本国官兵不能前往按约分界后应归本国界内之地。”②这种在尚未确定两国分界之前，先声称对方的土地已经属于自己所有，对方派兵守卫，就被说成是入侵了俄国领土，纯粹是沙俄的强盗逻辑。对于恢复谈判的问题，沙俄政府也蛮横地声称，除非中国全盘接受俄方要求，否则俄国代表不能前来谈判。

沙俄政府一面对清朝政府的抗议交涉进行诡辩，一面变本加厉地在中国西北边疆制造事端。从1863年6月份以后，沙俄入侵部队不断向清朝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西北、西南的博罗呼吉尔、鄂尔果珠勒等卡伦发

①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50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7，第37页。

动袭击，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官兵多人。俄军甚至扬言，要进占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

在沙俄日益加剧的武装挑衅面前，清朝政府越来越感到恐慌。因为经过西方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朝政府的对外态度已经十分软弱，加上这时正忙于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西北回民起义，西北边疆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酝酿着一场大的反清斗争的风暴。在这种形势下，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清朝政府深恐沙俄在西北边疆进一步扩大事态，造成“兵连祸结”的局面，危及它在国内的反动统治。因此，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①在向皇帝奏报中俄西疆交涉情形时，竭力夸大沙俄的力量和西北防务上的困难，说什么“西北一带边疆，道路绵远，防不胜防”，“议战议守，两无可恃”，“倘再不准其照约议分，迁延日久，势必愈形决裂。现值兵饷两绌，若堵御不力，致被深入，恐所失愈多，转圜愈难”②，主张赶快向沙俄妥协，答应它所提出的领土要求。清朝同治皇帝（当时年仅八岁，实际掌权的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也急忙表示同意总理衙门的主张，颁布谕旨：“该国似此强横，自应早为完结，以免酿成事端”③。

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成立于1861年，是清朝政府中主管外交和各种“洋务”的重要机构，拥有很大权力。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8，第51—52页。

③同上书，卷18，第57页。

在这种投降主义方针的指导下，清朝政府于1863年9月向沙俄发去妥协照会，表示同意按照俄方在塔城谈判中所提出的国界草案“妥商照办”。

沙俄接到清朝政府的妥协照会后，立即派遣扎哈罗夫、巴布科夫再次来到塔城。他们态度骄横地向明谊等人拿出自己单方标画好的边界地图，要求立即“照图定议”。可是，由于从京城发给明谊等人的关于同意俄方要求的朝廷谕旨在途中延搁，当时尚未递到塔城，明谊等人表示必须等候谕旨到后才能定议。扎哈罗夫、巴布科夫竟然不肯等候，扬长而去。不久，明谊等人接到了清朝政府的指示，向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发函，说明同意按照俄方草案划界，请俄方代表前来“商办换约”。不料，杜加麦利却挑剔明谊等人函件中写有“商办”字样，拒绝恢复谈判。在此后双方多次来往信函中，杜加麦利坚持要明谊等人作出保证：在谈判中“没有争论的企图，而只是从事于编制议定书和地图”，而只充当一个签字画押的角色；并说否则“边界事务委员会将被结束，而国界谈判此后就不能恢复”①。面对沙俄的一再威逼，明谊等人不敢再作争辩，加之当时新疆各地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库车、喀喇沙尔和乌鲁木齐汉城已被起义部队所占领，乌鲁木齐满城也被围困，清朝政府在西北边疆的统治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

①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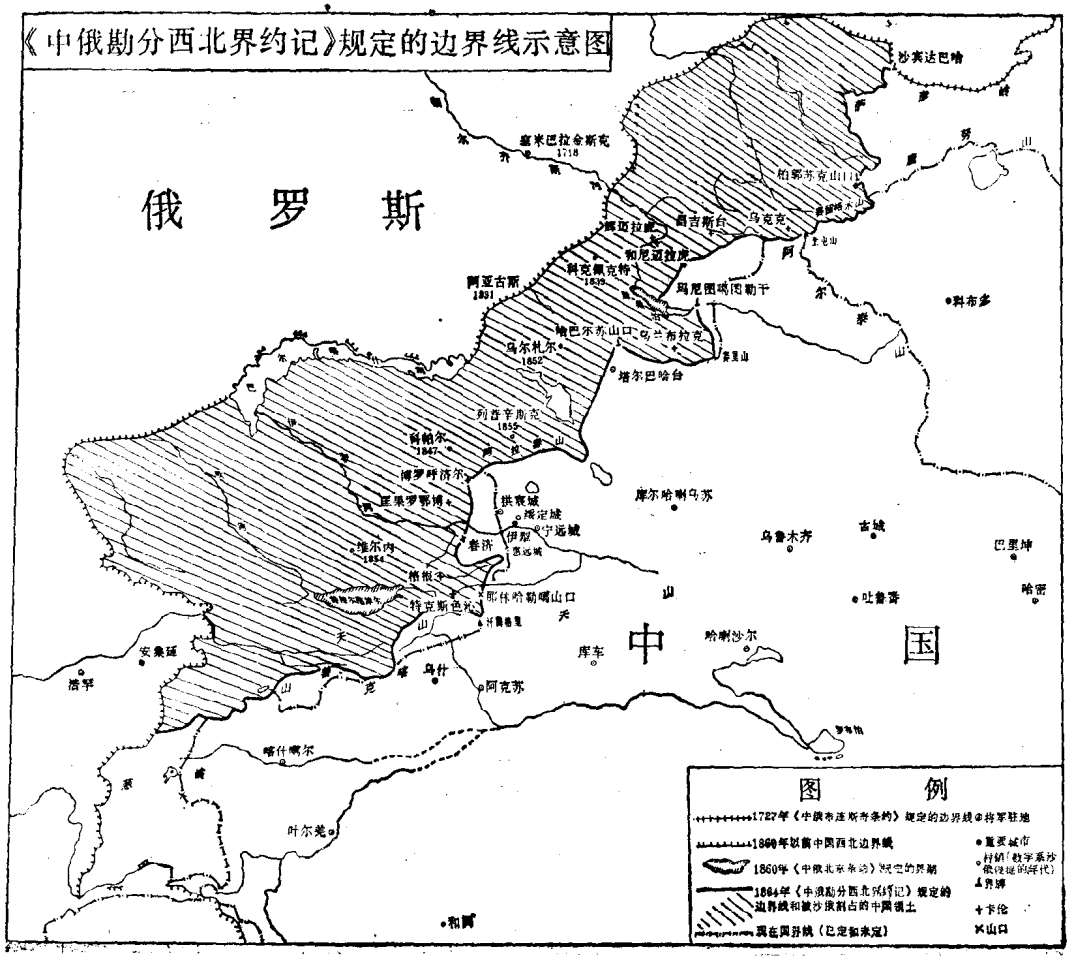
下，明谊等人急忙按照俄方苛求给杜加麦利去函，表示“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①。1864年9月，扎哈罗夫、巴布科夫第三次来到塔城。这次谈判，由于完全是在沙俄“逞兵挟制”之下进行的，扎哈罗夫、巴布科夫“动辄以用兵为词，肆意强横”②，明谊等人只求赶快了事，已经谈不到与沙俄进行什么“会商”，只是派人在俄方绘好的边界图纸上“添写清字地名”，最后加以互换而已。

1864年10月7日（清同治三年九月七日），清朝

被沙俄割占的我国美丽湖泊——伊塞克湖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第3页。
②同上书，卷29，第22—23页。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的边界线示意图



谈判代表明谊、锡霖、博勒果素与俄使扎哈罗夫、巴布科夫在塔城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称《塔城议定书》）。根据这个“界约记”，重新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起到葱岭为止的中俄边界线，将这条新边界线以西原属我国的四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强行割归俄国，同时还规定在边界附近的我国居民“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即随地归为何国管辖”，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我国哈萨克、柯尔克孜、唐努乌梁海、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等族的许多部落都被沙俄野蛮吞并。对于沙俄通过这个不平等的“界约记”割占我国西北大片领土的事实，俄使扎哈罗夫、巴布科夫等人后来都直认不讳。扎哈罗夫曾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是对俄国“有利的议定书。据此，大片领土从中国转归了俄国”①。巴布科夫也曾供认：“由于按照中国常设卡伦线划界，在吉尔吉斯草原②东部有属于中国的幅员广大的土地划入我国领域之内。”“这样划定的国界，得到了外交部的赞许，……它在帝国的这个边区是最能满足俄国政治和贸易的意图的。”③

根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规定，中俄双方应在换约后二百四十天，派代表前往边界实地勘察，建立

①瓦西里耶夫：《回忆扎哈罗夫》，载《关于中国、东西伯利亚和朝鲜文集》。

②吉尔吉斯草原，即哈萨克草原。当时俄国人把哈萨克民族称为吉尔吉斯人。

③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471、5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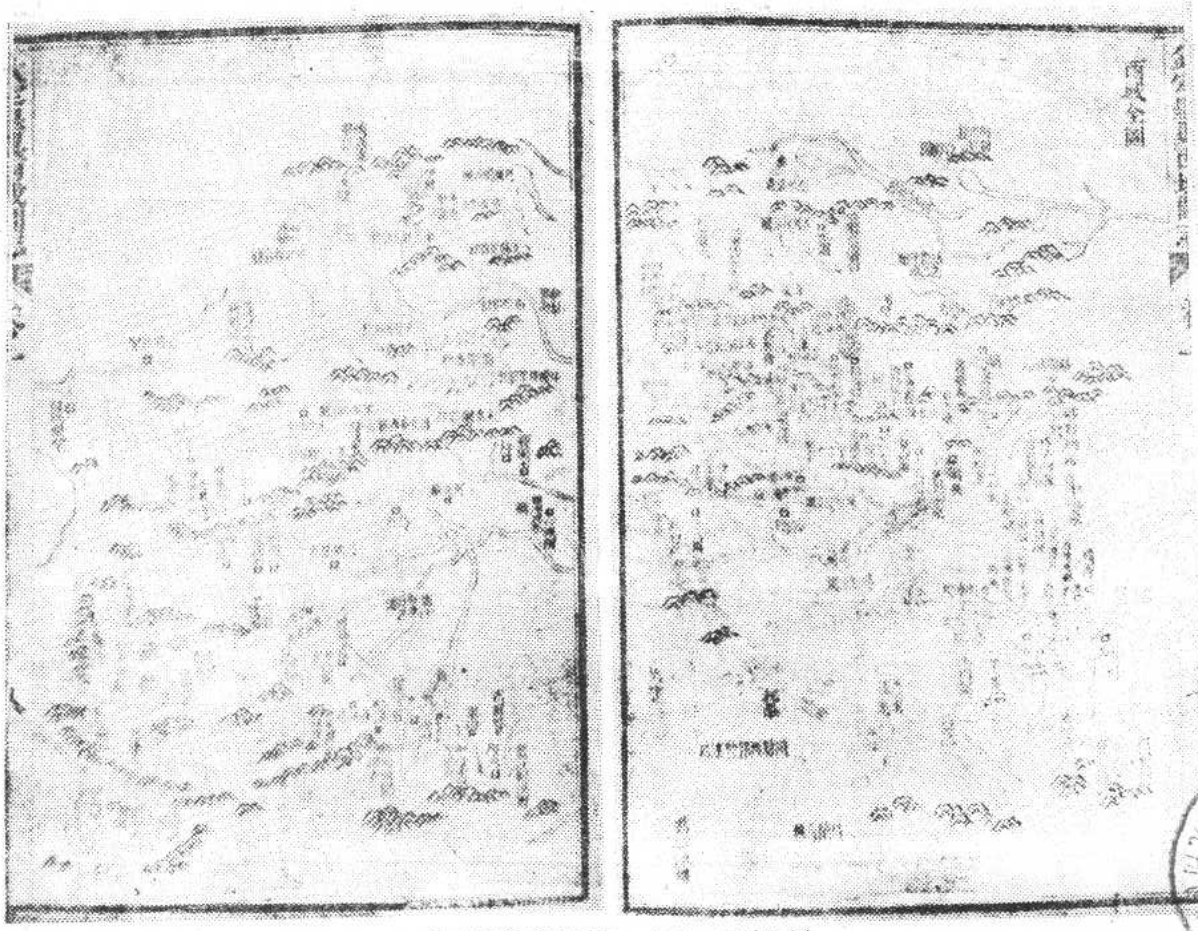
界牌鄂博。但是，由于从1864年开始的我国新疆少数民族反清斗争日益猛烈和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的入侵，清朝政府相继失去了对南疆、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地区的控制，这项工作未能按时举行。直到1869年，双方才会同在中俄西段边界的北部（从沙宾达巴哈到玛呢图噶图勒干之间）建立了界牌鄂博，并签订了《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1869年9月4日）和《中俄科布多界约》（1869年8月13日）。这年秋天，沙俄又单方面在玛呢图噶图勒干以南到哈巴尔苏之间建立了边界牌博。清朝政府在既成事实面前觉得无可奈何，只好于第二年派代表前往该地“会勘”，表示承认，并与沙俄签订了《塔尔巴哈台界约》（1870年8月12日）。至于从哈巴尔苏向南直到葱岭之间中俄边界的建牌立博工作，仍继续拖延，没有能够及时进行。这种情况，后来成了沙俄对我国西北领土进行新的掠夺的一种借口。

三　沙俄入侵伊犁和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

沙俄武装侵占我国伊犁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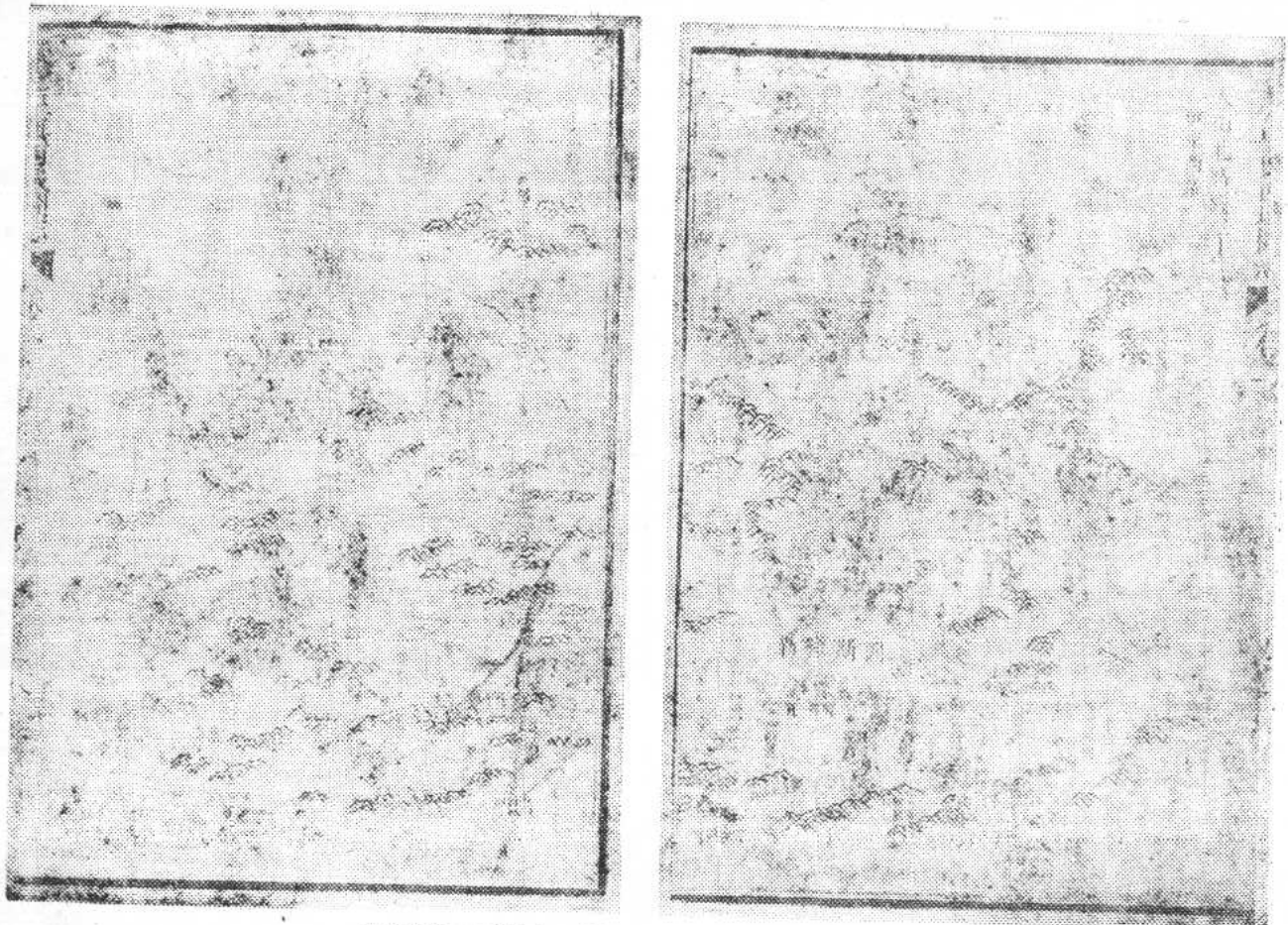
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我国西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后，侵略胃口并没有得到满足。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起，沙俄就积极准备对我国西北边疆发动更大的侵略行动了。

这时，清朝政府在西北方面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从1864年开始，新疆各地相继爆发了少数民族起义。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新疆的腐朽统治，占领了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这些少数民族起义队伍很快就被本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篡夺了领导权，逐渐改变了起义的性质，成了相互火拼的封建割据势力。在这些割据势力中，力量较强的有：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政权；以和田为中心的哈比布拉汗政权；以喀什为中心的金相印、思的克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奇苏丹政权。他们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混战不已。有的甚至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外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书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的《西域全图》



《欽定皇與西域图志》中的《天山北路图三——伊犁西路》

侵略势力，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事头目阿古柏借喀什封建主金相印、思的克写信乞师“援助”的机会，带兵侵入我国南疆。阿古柏先后攻占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乌什等地，于1867年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意即七城）政权，并自封为汗。

沙俄把我国西北边疆出现的动荡局势看作是自己扩张领土的绝好时机。还在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刚刚签字后不久，沙俄政府中就有人声称这个条约给俄国带来的利益不十分大，主张不予执行，使它成为废纸，以免束缚自己进一步从事扩张的手脚。1866年，沙俄“草原事务委员会”①的官员根斯、古特科夫斯基等又向沙皇政府建议，利用中国西北边疆动乱的局势，迅速出动军队，占领伊犁、塔城等地区，从而“把《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国界，由中国常设卡伦线更向东推进几百俄里，并将中国全部准噶尔划入俄国领域之内”②。这个主张得到沙皇政府中一些要员的支持。但是，由于当时沙俄正集中兵力对中亚的浩罕、布哈拉汗国进行武力征服，加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原属我国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反对沙俄占领的斗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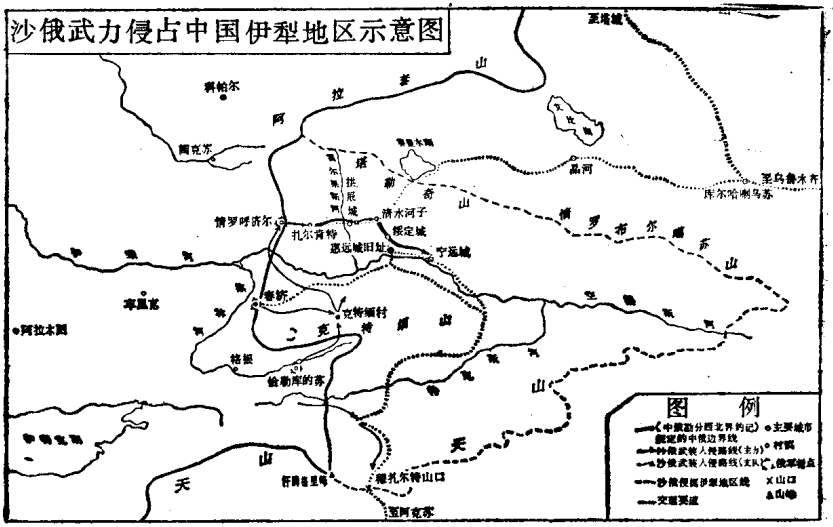
①“草原事务委员会”是沙俄吞并中亚哈萨克草原（包括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部分地区）之后设立的一个机构，主要任务是为沙皇政府拟订在哈萨克草原地区的殖民统治方针、措施和管理体制等，对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制订一度曾有颇大影响。

②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520页。

伏彼起，连续不断，沙俄需要首先稳定它在那些新吞并地区的殖民统治秩序，不得不推迟实施根斯等人的侵略建议。

1867年以后，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沙俄通过血腥的侵略战争，已经迫使浩罕和布哈拉屈服称臣，并在新占领的中亚土地上建立了以塔什干为中心的土耳其斯坦总督府（下辖七河省和锡尔河省），加强了在这些地区的殖民统治。这就使它得以抽出兵力，进行侵略我国伊犁等地的准备。同时，由于盘据我国南疆的阿古柏侵略势力继续向北扩张地盘，先后进占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吞并了当地的妥明政权，于是沙俄担心伊犁这块“肥肉”会被阿古柏抢走，侵占伊犁的心情更加迫切。因此，从1870年开始，沙俄加紧向我国伊犁边境调遣军队，进行侵略部署。当年8月，根据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的命令，沙俄军队占领了我国伊犁和南疆之间的咽喉要道——穆扎尔特山口。1871年初，沙俄政府又专门召开会议，通过了武装入侵我国伊犁的决议。会后，沙俄政府下令组成“伊犁远征军”，由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担任司令官，在伊犁西部边境上集结待命，准备随时对我国伊犁发动入侵。

1871年5月初，有一个叫塔扎别克的俄籍哈萨克首领带着一群哈萨克牧民从七河省的维尔内县逃入我国境内。这在当时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是科尔帕科夫斯基决定利用这件事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便向



当时我国伊犁地区割据政权的首领塔兰奇苏丹发出措词强硬的通谍，要求在七天之内交出所谓“逃犯”，过期将以武力加以解决。塔兰奇苏丹在限期之内没有答复俄方通谍。科尔帕科夫斯基即以“追捕逃犯”、“安定边疆秩序”为借口，于5月15日命令俄军分两路向我国伊犁进犯。其中，一路由博罗呼吉尔沿伊犁河以北进攻马扎尔，另一路由穆扎尔特山口和春济卡伦进攻伊犁河南的克特缅山口。沙俄投入这次入侵的兵力计八个半步兵连，五个半哥萨克骑兵连，十三门大炮，官兵两千余人。面对沙俄的入侵，我国伊犁各族人民和塔兰奇苏丹部队的广大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马扎尔、克特缅、霍尔果斯、清水河子和绥定城外，都相继展开了激烈的保卫战。伊犁军民手持各种武器，奋不顾身地打

击侵略者，使沙俄强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由于当时伊犁和祖国内地还处于阻隔的状态，伊犁人民反抗沙俄入侵的斗争无法得到全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的支持，而割据伊犁的塔兰奇苏丹艾拉汗等人又是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败类，他们非但不能领导当地军民把反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反而卑躬屈膝地向沙俄求降，结果伊犁九城（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勒奇）于当年7月先后失陷，塔兰奇苏丹政权被消灭，沙俄武装占领了我国的伊犁地区。

沙俄在入侵过程中，对我国伊犁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据参加这次入侵的沙俄将军捷连季耶夫的记述，俄军在克特缅山口的一次战斗中，就打死我国维、汉、蒙、回、哈萨克族人民五百多人；侵占清水河子时，“城外的各个战场上（守卫者）横尸遍野”，“俘虏中间还有许多年迈的老人和少年儿童”①。除了战场上的屠戮之外，沙俄侵略军还洗劫许多和平的村镇，到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原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被沙俄军队全部击毁，拱宸、广仁、瞻德三城被“隳为平地”，其他城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沙俄强盗对我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当沙俄军队侵占伊犁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朝政府立即向沙俄提出了交涉，要求俄方从中国境内撤走入

①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彼得堡1906年版，第2卷，第47页。

侵部队，把伊犁交还中国。沙俄为了搪塞清朝政府，欺骗国际舆论，虚伪地表示：俄国占领伊犁只是“代为收复”，并无久占的意思，只要中国政府平息了西北边疆的叛乱，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它“当即交还”伊犁给中国。实际上，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因为沙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力量收拾新疆的动乱局面，它所许下的诺言也无需兑现。所以，沙俄占领伊犁后，即对当地居民公开宣布：“俄国所占地区，永不归还中国”①，并把伊犁地区划入俄国七河省范围之内，按照俄国土耳其斯坦地区的管理条例，设官置署，屯扎军队，进行军事殖民统治。为了永远霸占伊犁，沙俄撤销了当地原有的各种行政机构，强迫我国各族人民向俄国表示“归附”，对不肯屈从的我国官兵、百姓，严刑拷打、监禁，以至于杀害。在经济上，沙俄在伊犁横征暴敛，通过抽取赋税、强征劳役、摊派银两等方式，对我国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无情掠夺。当时从伊犁地区逃出的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牧民曾经愤怒地控诉说：“自从受制俄人，横加赋敛，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须数两，兵役、通事人等供应需索在外，日朘月削，劳扰不堪。”② 据清朝总理衙门估计，沙俄在伊犁地区所榨取的各项税租，“每年不下数十万两”③。

①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彼得堡1913年版，第86页。
②《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5，第29页。
③同上书，卷15，第17页。

除了繁重的租税和劳役之外，沙俄还利用各种名目劫掠当地人民的牲畜、财产，甚至强迫种植鸦片，摧残当地农业生产，危害我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由于沙俄的掠夺，许多中国居民倾家荡产，被逼得走投无路。我国伊犁各族人民在沙俄军事殖民统治下，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沙俄勾结阿古柏和俄、英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

沙俄在侵占我国伊犁的同时，还加紧勾结阿古柏①入侵匪帮，企图利用阿古柏作为自己的侵略工具，把沙俄的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大到整个新疆，以便最后实现吞并我国这一地区的狂妄野心。

阿古柏这个侵略强盗在浩罕担任军官时期，同沙俄的关系并不好。他曾带兵与沙俄入侵浩罕的部队作战，并因此而负过伤。可是，当入侵我国新疆之后，他与沙俄有了一些共同的侵略利益。沙俄想把阿古柏变成自己侵略中国领土的工具，加以利用；阿古柏也想取得沙俄

①阿古柏，生于塔什干南面的皮斯坎提特，年轻时曾作过舞师，后来凭借手腕爬上浩罕汗侍从的高位，并在浩罕军队中担任要职。一八六五年，他和布素鲁克和卓（和卓是中亚、西亚和我国新疆一些地区对伊斯兰教封建上层的称呼）一起带兵侵入我国南疆。

的支持，以维持他在中国领土上所建立的“哲德沙尔”政权。因此，早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初，俄、阿就开始了勾结活动。1866年，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地区刚刚站住脚跟，沙俄就迫不及待地与阿古柏取得联系，双方秘密约定：互不干涉对方之行动，任何一方有权到对方境内追捕逃犯。通过这个协定，沙俄一方面对阿古柏入侵我国南疆的行动表示默许，另一方面给自己以后从事侵略预留了地步。1868年，沙俄政府派遣一个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间谍赫鲁道夫，从塔什干到喀什，向阿古柏转达“俄国的友谊”，劝说阿古柏投靠沙俄。赫鲁道夫回俄国时，阿古柏派自己的侄子萨迪·米尔扎跟随同行。米尔扎在塔什干与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进行了秘密会谈，接着，又到彼得堡进行活动，乞求俄国承认“哲德沙尔”政权，交换条件是答应给俄方以领土和商业方面的利益。但是，俄、阿之间的这次勾结并没有能够完全获得成功。原因是俄、阿双方还存在着狗咬狗的矛盾，特别是在英帝国主义与沙俄进行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阿古柏还不想完全充当沙俄的附庸。

当时，俄、英两个帝国主义都正在中亚进行掠夺殖民地的活动。沙俄由北向南推进，英国由南向北扩张。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俄英双方的侵略势力在这一地区相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它们各自都想为自己夺得更多的殖民地盘，排斥对方的势力。因此，在阿古柏入侵我国新疆以后，英国也多方活动，同阿古柏进行勾结，企

图把阿古柏变成自己的侵略走狗。为了这个目的，1868年时，英国曾派间谍罗伯特·邵武到喀什，送给阿古柏一批枪支和其它礼品，进行收买。次年，邵武离开喀什时，阿古柏派代表随他前往英国进行谈判，以拍卖我国南疆的各项权益来换取英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此后，英国的军火、商品和间谍不断从土耳其、印度、克什米尔等地进入阿古柏所占领的我国南疆地区。1870年和1873年，英国又两次派遣以福锡斯为首的代表团到喀什，转交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给阿古柏的亲笔信，公然不顾中国主权，宣布承认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英国还送给阿古柏大批枪炮，支持他在新疆进一步扩大侵略势力，抗拒中国军队收复国土的正义战争。1874年，英、阿之间公然缔结“通商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英国承认阿古柏为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地区的“艾米尔”（即首领），阿古柏则允许英国在其占领区内通商、驻使和设立领事等。

英、阿之间的勾结引起沙俄的极大不安。沙俄认为阿古柏靠拢英国是对自己在中国新疆扩张的打击。为了排挤英国的侵略势力，达到独自吞并新疆的目的，它也加紧同阿古柏勾结，千方百计要把这条侵略走狗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1872年时，沙俄利用自己已经占领伊犁的有利形势，曾经派遣以男爵考利巴尔斯为首的代表团到喀什进行活动。考利巴尔斯代表沙俄政府承认了“哲德沙尔”政权，称阿古柏为“独立国君主”，并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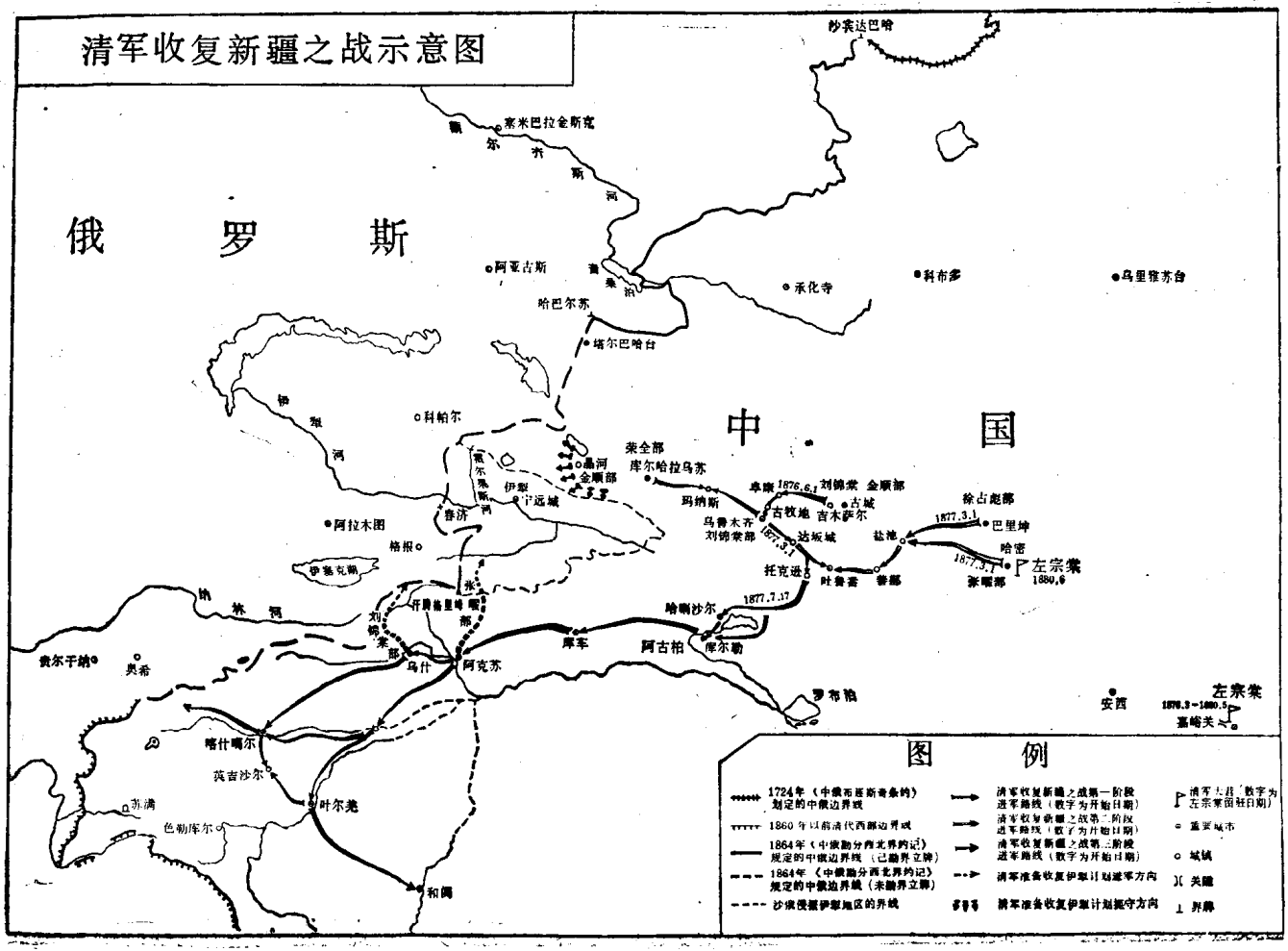
此从阿古柏手里换取了在我国南疆的大量侵略权益，包括俄人在这一地区自由经商、建立商馆、设置商务专员、俄国商队可自由过境到邻国贸易等等。通过这次勾结，沙俄加强了对阿古柏的控制。第二年夏天，阿古柏就派了自己的亲信赛义德阿古布赴俄回访。赛义德阿古布先后窜到塔什干和彼得堡。沙皇政府对他待若上宾。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予以接见，还邀他参加了阅兵典礼，以表示对阿古柏政权的重视和支持。

此后，俄、阿之间不断互派“使节”，俄、英双方争夺阿古柏的斗争也愈演愈烈。直到1877年，即阿古柏入侵匪帮复灭前夕，沙俄还派遣了以库罗巴特金为首的代表团到喀什和库尔勒活动，一面与阿古柏谈判边界问题，企图借阿古柏之手，窃取我国新疆西南部的领土和军事要地；一面向阿古柏提出“服从土耳其斯坦总督命令的必要性”，想把这条垂死的侵略走狗完全抓到自己手里。由于中国军民讨伐阿古柏战争的迅速胜利，粉碎了沙俄勾结阿古柏以吞并我国新疆的阴谋。

清朝政府收复新疆和俄、英的阻挠

由于阿古柏的入侵和沙俄占领伊犁，我国西北边疆的危机日益加深。这时，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入外国侵略者之手，清朝政府仅仅保有哈密、巴里坤、济木萨、乌苏、精河、塔城等地。面对这种情况，全国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示意图



人民、尤其是新疆人民迫切要求清朝政府出兵驱逐侵略者，收复新疆失地。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这个问题，也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即所谓“海防”和“塞防”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投降势力借口东南海防的重要，反对出兵收复新疆。他们胡说“海防、西征，力难兼顾”，“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①，主张放弃新疆、专务海防。这种意见对内是为了扩充本集团的势力，对外不惜抛弃祖国西北领土，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论调。和李鸿章等人的意见相反，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派人，对沙俄等外国侵略势力在我国西北边疆的日益猖獗深感忧虑。他们认为，新疆是我国的西北屏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如果新疆失地不复，沙俄侵略者将“得步进尺”，由西北长驱直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他们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②，而当务之急则是迅速派兵西征，消灭阿古柏入侵匪帮，并收回伊犁，以杜绝“俄人狡谋”③。左宗棠等人的主张，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爱国思想，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因此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清朝政府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最后决定接受左宗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9页。
② 《左文襄公奏稿》卷46，第32页。
③ 《左文襄公书牍》，卷13，第2页。

棠等人的主张，并于1875年4月任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赋予他领导西征的军事大权，积极从事入疆作战的准备。

1876年3月，左宗棠进驻肃州（今甘肃酒泉），派遣部将刘锦棠率领主力部队入疆作战，收复新疆失地的战争正式开始。这场反击入侵者、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战争是完全正义的，因而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清军所到之处，各族人民纷纷献粮献马，运送粮草，充当向导，传递情报；有的还自动组织起来，协同清军作战。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清军进展十分顺利。1876年秋天，清军击败阿古柏和叛匪白彦虎、马人得的军队，收复了乌鲁木齐和附近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地。1877年春，清军又乘胜向南疆挺进。阿古柏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一带聚集数万兵力进行抵抗，企图利用这道防线保住他在南疆的地盘。清军从东、北两个方向对敌人发起进攻：北面刘锦棠军由乌鲁木齐越过天山直趋达坂城；东面张曜、徐占彪两军分别从哈密和巴里坤出发会攻吐鲁番。经过将近半月的激战，清军攻克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摧毁阿古柏的防线，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在这一仗中，阿古柏匪军遭到重创，大通哈（阿古柏所设官名）爱义德尔呼里被清军活捉，叛匪头目马人得缴械投降。阿古柏在清军的凌厉攻势下，感到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杀。

清军讨伐阿古柏战争的节节胜利，给沙俄和英帝国

主义以沉重打击。俄、英眼看“哲德沙尔”政权即将被摧毁，急忙跳出来进行阻挠和破坏。阿古柏死后，沙俄立即扶植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汗，支持他负隅顽抗。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还曾向沙俄政府提出进行武装干涉的建议，叫嚣“不应让中国军队占领”喀什噶尔①。英国政府这时则公开出面干预，声称要“调解”中国和阿古柏匪帮之间的冲突，请清政府停止向南疆用兵，保存伯克胡里的政权，立为“保护国”。这个荒谬要求，被清朝政府，特别是指挥前线作战的左宗棠断然拒绝。

此后，清军于1877年8月至12月继续向南疆挺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收复了喀什等八城。伯克胡里和白彦虎溃不成军，最后狼狈逃入俄国境内，被沙俄所收容。依附于阿古柏的民族败类金相印等则在和田被俘虏后处决。至此，入侵我国新疆十二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被歼灭，除沙俄所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其它地区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新疆失地的收复，是我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地区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祖国西北领土的重大胜利。这个胜利之所以取得，首先是新疆各族人民和清军广大士兵英勇战斗的结果。同时，也和直接领导这次战争的左宗棠等人的作战决心和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在收复新疆

①转引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大学1947年版，第186页。

的整个过程中，内有李鸿章等卖国投降势力的阻挠，外有俄、英帝国主义的破坏，但作为西征统帅的左宗棠却能够始终坚持定见，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领导战争直到最后的胜利。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同时，他在战争过程中所制订的“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等军事方针以及对于部下的调度和任用，也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于战争的迅速胜利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尽管左宗棠在一生中曾经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西北回民起义，犯下了历史罪行，我们仍然应当充分肯定他为中华民族所立下的不朽功勋。

左宗棠（1875年绘）

阿古柏的“哲德沙尔”伪政权被我国军民摧毁之后，沙俄对我国南疆并不死心。它接纳、包庇伯克胡里、白彦虎等阿古柏残匪，继续利用这批亡命之徒作为

侵略中国的工具。清朝政府多次要求引渡有关人犯，沙俄不但拒不交还，而且唆使这些阿古柏残匪不断对我国边境进行侵扰。但是，阿古柏的历史已经不可能重演了。越境来犯的阿古柏残匪一再受到我国军民的痛击，沙俄利用阿古柏匪帮之手吞并我国南疆的阴谋如一场泡影，就此破灭了。由于阿古柏的复亡，沙俄失去了占领我国伊犁的全部借口。交还和收复伊犁的问题，更突出地摆在了沙俄和中国人民的面前。

沙俄利用交还伊犁肆意勒索侵略权益和《里瓦几亚条约》的破产

1877年，清朝政府在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并进而向南疆进军的过程中，就再一次向沙俄提出了交还伊犁的问题，要求俄方履行它在侵占伊犁之初所许下的“一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即行交还”的诺言。但是，沙俄的这个诺言本来就是虚伪的，这时仍然不想去履行它。沙俄政府中一些军事头目和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等人，出于侵略我国西北领土的需要，更是坚决主张把伊犁霸占到底。因此，沙俄对于清朝政府索还伊犁的要求，一再进行拖延和推诿。后来，又借口中俄间的陆路通商问题和边境交涉的一些积案没有达成令它“满意”的协议，拒绝与清朝政府谈判伊犁问题。

清朝政府在多次交涉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不得已于1878年6月派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头等全权大臣，出使俄国，就交收伊犁等问题与沙俄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崇厚于当年年底到达彼得堡，第二年年初开始与沙俄展开交涉。这时，沙俄迫于形势，既感到继续霸占整个伊犁地区已经是不可能了，但又不肯轻易地将伊犁交还中国。为了研究侵略对策，沙俄政府几次召开特别会议，煞费苦心地进行策划，最后决定以交还伊犁一部分地区作为诱饵，乘机向中国勒索大量赔款和侵略权益，割占伊犁地区的一些战略要地和中国西北边疆的其它领土，作为给自己的补偿。这实际是一个“名还实占”的圈套，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外交部高级顾问热梅尼、驻华公使布策等人则是这个圈套的具体执行者，由他们设法将它套在清朝政府使者的脖子上。因此，当崇厚到达俄国后，沙俄首先使出“优礼相待”的骗局，又是派出“六马公车”迎接，又是陈列仪仗队，使得崇厚受宠若惊，一再向朝廷报告俄方的“诚意”。可是，当正式谈判开始以后，格尔斯等人马上换了面孔，提出分界、通商、赔款三方面极为苛刻的侵略要求，向崇厚百般恫吓，强迫接受。

崇厚是被清朝政府当作“能办外交”的人材派到俄国充当出使大臣的，可是他实际上只是一个能办投降外交的昏庸官吏。他到俄国之后，既被沙俄的虚假“诚意”所迷惑，又被侵略者的“船炮之精、兵力之厚”所吓

倒，因此在谈判过程中步步退让，最后竟擅自决定答应了俄方所提出的全部要求。本来，当崇厚在俄京谈判的情况陆续报告北京清政府后，清朝总理衙门曾一再给崇厚发函、发电，指出俄方所提各条“有碍大局”、“断不可行”，阻止崇厚与沙俄草率定议。不料崇厚这个卖国贼居然不顾本国政府的指令，回电总理衙门：“约章定明，势难再议”①，于1879年10月亲赴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里瓦几亚，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个条约，就是所谓的《里瓦几亚条约》（也称《中俄交收伊犁条约》）。全约共十八款，并附有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和两个专件，其中规定：俄方归还伊犁给中国；中国偿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五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中国割让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土地给俄国；中国将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台两地所属边界，按照俄方要求重新加以调整；俄商在新疆、蒙古地区贸易免税；中国允许俄国增辟两条由陆路到天津、汉口的通商线路，其进口税较由海路运入中国口岸货物减低三分之一；俄国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七处增设领事等等。这就是说，伊犁一地虽然名义上归还了中国，但其西境和南境险要之地全被沙俄割走，伊犁九城陷于北、西、南三面受沙俄包围的危险境地，成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6，第27页。

了无法防守的几座孤城。而且，由于伊犁和天山南路之间的交通孔道被截断，使南疆也将进一步受到沙俄的直接威胁。至于这个条约实施后将带给我国的其它政治和经济上的损失，更是不胜列举。事实正象一些西方历史学者所指出的："在里瓦几亚条约中，俄国所取得的东西已经超过它甘愿冒战争危险来保持的东西"①。

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的内容传到国内，引起举国上下极大的震惊。人们被沙俄利用交还伊犁割我土地、夺我权利的卑鄙行径激怒了，也被崇厚的卖国行径激怒了。朝野人士纷纷上书言事，痛陈《里瓦几亚条约》的危害，要求严惩崇厚，重新改订条约。仍在肃州大营指挥西北军事的左宗棠得知崇约条款，悲愤交集，当即上奏朝廷，大声疾呼道："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② 他坚决主张拒绝批准崇厚所订的这个条约，对沙俄侵略者"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即一面进行谈判交涉，一面作好武力收复伊犁的准备。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广大群众和爱国官吏、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当时"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在

①查尔斯·耶拉维奇、巴巴拉·耶拉维奇合编：《俄国在东方（1876—1880）》，来丁1959年版，第100页。

②《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8，第4页。

这种情况下，虽然清朝政府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仍在竭力鼓吹《里瓦几亚条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兵衅一开，其所要求恐有仅照现议而不可得者”①等谬论，主张“稍示含容”，批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投降派十分孤立，清朝政府不得不把卖国贼崇厚革职监禁，定为死罪，并于1880年2月正式照会沙俄政府：崇厚在俄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因此决定拒绝接受和批准。同时，宣布另派大理寺少卿、驻英公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赴俄商谈改订条约。至此，《里瓦几亚条约》宣告破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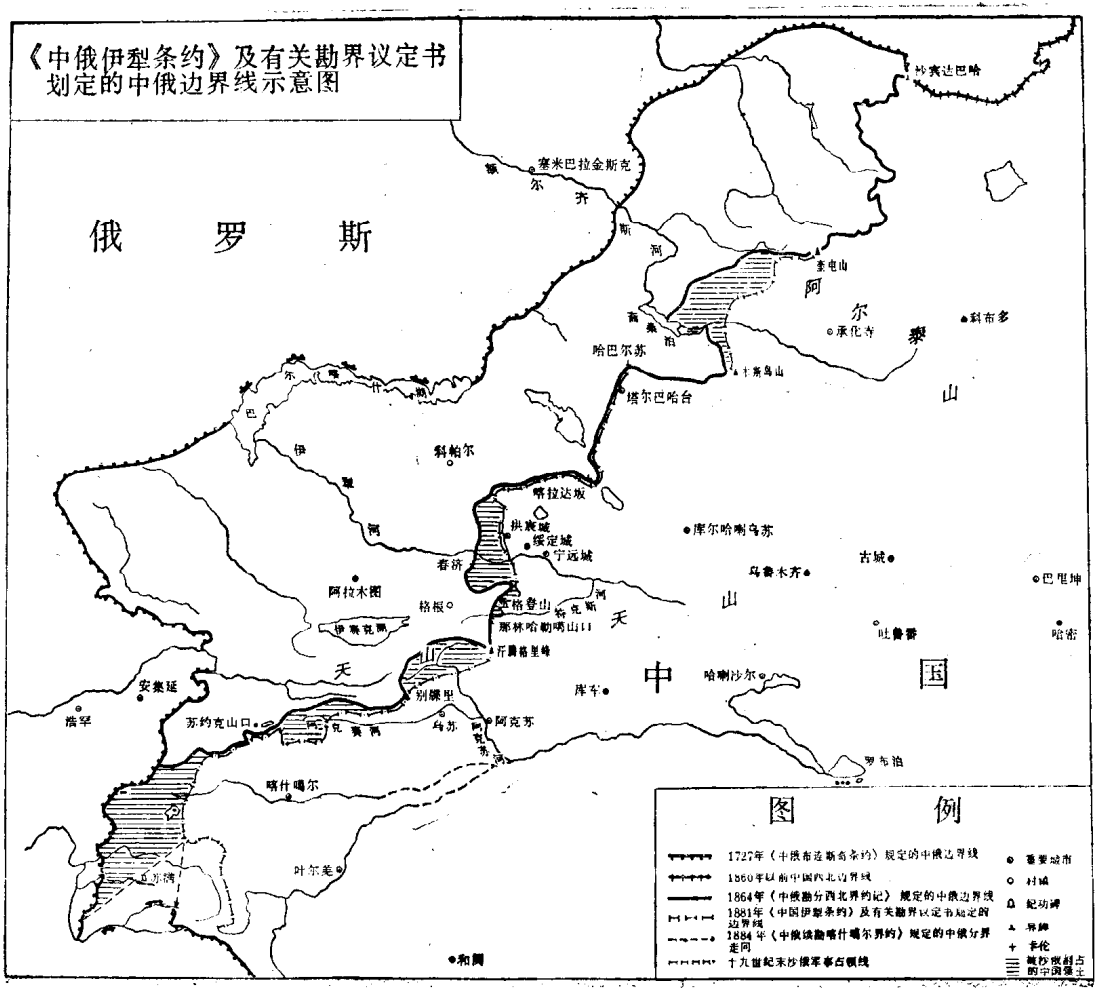
《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

《里瓦几亚条约》的破产，使沙俄失掉了即将到手的侵略权益。沙俄对此恼怒异常，悍然使出它惯用的卑劣手段，对清朝政府进行武力威胁和外交恐吓，企图迫使清政府收回拒绝批准条约的成命。

1880年初，沙俄驻华代理公使凯阳德公然到清朝总理衙门逞凶闹事，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抗议中国惩处卖国贼崇厚。凯阳德还为《里瓦几亚条约》辩护，声称这是俄国“特排众论，将不应让与中国之处全行相让”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7，第18页。

《中俄伊犁条约》及有关勘界议定书划定的中俄边界线示意图



的“和好”之约，指责中国是“愈让愈不见好”，并且威胁清朝政府说：“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①。与此同时，在彼得堡，沙俄政府也向中国驻俄代理公使邵友濂进行恫吓，叫嚷中国“若竟将崇官保（即崇厚——作者）治以死罪，则关系邦交大局”②。

在进行外交讹诈的同时，沙俄向中国边疆和沿海调集了大批军队和战舰，摆出发动战争的架势，威胁清朝政府。当时，仅在伊犁附近，沙俄就集中了十四个步兵营、二十个哥萨克骑兵中队、四个炮兵营。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也把他的大本营从塔什干迁到了维尔内，以便就近进行指挥。在海上，沙俄派遣了一支由二十三艘军舰组成的大型舰队，在海军上将列索夫斯基率领下，从黑海东驶来华，扬言将封锁我国的黄海和渤海。沙俄还放出空气，说要派兵从黑龙江和辽东半岛分别进攻我国东北和华北，然后取钳形攻势占领北京。

沙俄的武力威胁和外交恫吓，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爱国军民积极要求整军备战，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同沙俄强盗作不妥协的斗争。但是，清朝政府作为一个软弱的半殖民地政权，是经不起风浪的。它虽然也作了一些防御性的军事部署，实际上并没有对俄作战的决心，加上其它列强纷纷施加压力和李鸿章等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8，第11页。

② 《邵友濂使俄文稿和家书》。

人乘机起来活动，清朝政府开始趋向妥协。为了谋求对俄交涉的“转圜地步”，1880年6月，清朝政府竟不顾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以“海疆防务毫不足恃”为借口，宣布宽免卖国贼崇厚的死罪，“仍行监禁”，并且通知曾纪泽，要他将这件事知照俄国，作为“中国与俄国和好之据”①。

清朝政府的软弱态度非但没有能够使沙俄有所收敛，反而更加助长了它的气焰。1880年7月底，清朝政府的使俄大臣曾纪泽到达彼得堡后，受到沙俄方面“面冷词横”的对待。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一口咬定崇厚所签之约“只候照行，无可商议”，并且反诬中国面对沙俄的军事威胁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是“举动不善”，拒绝与曾纪泽进行谈判。清朝政府赶忙对沙俄作进一步妥协的表示。8月份，根据曾纪泽的电请，清政府宣布将崇厚免罪释放，并且根据俄方所提要求，将边界积案迅速办结。9月，清政府听到俄国将派兵船和使臣来华的消息，更加恐慌，竟急忙电示曾纪泽：“俄事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②。就是说，要他不惜丧权辱国的代价，力求了事为上。

沙俄看到自己的讹诈已经奏效，这才同意与中国重开谈判。实际上，这时沙俄政府也正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窘境。它在欧洲处于孤立地位，在亚洲同英国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21，第15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25，第10页。

争夺中亚的矛盾正在加剧。由于1877—1878年俄、土（土耳其）战争的结果，沙俄国内财政枯竭，民怨沸腾，人民群众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日益发展，震撼着沙皇的统治。处在这种情况下，沙俄政府感到为维持已经破产的《里瓦几亚条约》而发动一场侵华战争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会影响它争夺世界霸权的总布局。因此，它决定不再坚持《里瓦几亚条约》中某些最明显的苛刻条款(如割让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中国领土等)，而从增加赔款数字和其它侵略权益中设法取得补偿。可见，沙俄之所以同意与清朝政府谈判改订条约，并非说明它的侵华野心有所收敛，而是为势所迫而采取的新的侵华手段。

沙俄本着继续进行侵略的方针，在彼得堡重开谈判之后，采用虚张声势、进行恫吓的手段，压迫清朝政府屈服。它口口声声以“补偿”自己因放弃《里瓦几亚条约》所规定的一些权利受到的损失为名，向清朝政府提出一系列新的侵略要求，敲诈勒索。沙俄谈判代表热梅尼厚颜无耻地向曾纪泽提出增加对俄赔款数字，说什么：由于中国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使得俄国“设防添兵，并派水师前往中国，所费卢布已一千二百万元”，中国必须赔补俄国这项“备兵设防之款”。曾纪泽当即驳斥了这种十分荒谬的说法，指出：“向来打仗之后，始可索要兵费；今中国既不知贵国派有兵船，又愿同贵国和平商议，岂有向中国索要兵费之理！”曾纪泽还反过来质问俄方：俄国“既有派兵船之事，岂算

和好之意！相好之国，有藉兵船之势，以定约者乎？设使中国未曾调兵，则贵国派兵船到中国，是无理之事；若果因中国备兵设防，鄂（俄）国乃亦备兵设防，鄂国向中国索赔兵费，请问中国所费兵饷，又向何国索偿？”①热梅尼被驳得体无完肤，只好乞灵于恫吓，叫嚣说：“在现时代，……逼使一个邻国增加军费被看作是一种敌对的、往往引起战争的行动”，“假如中国愿意继续同我国保持和好，让中国政府赔偿它给我们造成的军费开支，以弥补它的过错，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将是中国政府具有和平意愿的表示”②。对于交还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领土问题，沙俄也存心讹诈，要求中国另外割让土地，作为补偿。沙俄谈判代表布策公然询问曾纪泽：“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当曾纪泽表示对这种索取新的侵略权益的要求坚决不能答应时，沙俄竟然声称，崇约是俄方“已得之利益”，中国如要修改崇约，“须另有补偿方可，不然，难以商议”③。

在中俄这次彼得堡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沙俄始终挥舞“战争”的大棒，威胁懦弱的清朝政府。热梅尼曾凶相毕露地向曾纪泽叫嚣：“若再迟延，不如打仗合算。”④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在给热梅尼的信里，指示热梅

---

①《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神州国光社1936年版，第148—149页。

②查尔斯·杰拉维奇、巴巴拉·杰拉维奇合编：《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33页。

③《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20页。

④同上书，第124页。

尼对中国人“应该露一露牙齿”。热梅尼在回信中更是疯狂叫嚣：“不仅是露一露牙齿的问题，而应该去张口猛咬”，“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用大炮来提出明确的要求”①。在沙俄这种极其蛮横的威逼态度下，清朝谈判代表曾纪泽尽管作了一定的抗辩，最后仍屈服于沙俄的压力，于1881年2月24日（清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也称《改订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

《中俄伊犁条约》同未被批准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中国在领土、通商等方面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沙俄通过这个条约，从中国攫取的侵略特权和利益是大量的，主要是：

（一）根据条约的规定，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九城和在《里瓦几亚条约》中被割走的特克斯河流域，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仍被沙俄强行割占。条约还规定，要对斋桑湖以东的中俄边界进行“勘改”，即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定边界以东中国境内“酌定新界”；又规定：所有尚未建立边界标志的中俄西段各处边界，都要派员“勘定”，安设界牌。

根据这些规定，自1882年至1884年间，沙俄以“勘定”、“勘改”为借口，又陆续同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界约》（1882年10月）、《中俄喀什噶尔界约》

①查尔斯·杰拉维奇、巴巴拉·杰拉维奇合编：《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24、125、137页。

(1882年12月)、《中俄科塔界约》(1883年8月)、《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3年10月)、《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1884年6月)等几个勘界议定书。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这些勘界议定书，沙俄共夺走我国西北领土七万多平方公里。这是继《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之后，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所犯下的又一领土掠夺罪行。

(二)条约规定："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应于交收伊犁以前询明，其愿迁居俄国者，自交收伊犁之日起，予一年限期；迁居携带财物，中国官并不拦阻。"这一规定，为沙俄胁迁我国伊犁居民提供了借口。

1882年3月，清朝政府派人接收伊犁。沙俄以"保护"愿迁俄国之民为词，在宁远城(今伊宁市)继续留兵，驻扎一年之久。在此期间，沙俄用武力手段强迫当地我国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回等族居民迁居俄国，对于不愿迁移者，则横加毒打和迫害。在沙俄的皮鞭和刺刀下，伊犁地区的我国居民十多万人(占当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被迫离开家园，迁到俄国境内。当时，负责接收伊犁的清朝伊犁将军金顺曾向朝廷报告沙俄胁迁我国居民的惨状，他写道："俄国留兵一年，名为保护愿迁入俄籍之人，其实日事逼胁。所迁之民，多非情愿。比以限期日近，俄人在固勒扎(即宁远城——作者)驱迫益急，其不愿迁徙者，鞭挞立至，哀

号之声，彻于四野。”①在武力胁迁居民的同时，沙俄还对伊犁地区的生产、生活设施大肆破坏，将粮食、牲畜、车辆等重要物资洗劫一空。所以，当伊犁从沙俄侵略者手中回到祖国怀抱时，这个一向以繁华富庶著称的我国西北重镇，不仅险要已经尽失，而且残破不堪，人烟稀少，完全是一片荒凉景象了。

（三）条约规定，中国赔偿俄国“兵费”及“补恤之款”共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多万两）。这个数目，比《里瓦几亚条约》增加四百万卢布之多。

（四）条约规定，俄国商人在嘉峪关外之天山南北可自由贸易，“暂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区贸易，照旧也不纳税；并增辟由新疆到嘉峪关的陆路贸易路线，其进口税较沿海口岸减低三分之一。条约还规定，沙俄在肃州（指嘉峪关）和吐鲁番两地增设领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则等将来“商务兴旺”之后，沙俄也可陆续要求“添设”领事。这些规定，更加便利了沙俄对我国的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从此，沙俄侵略势力迅速扩展到整个新疆、蒙古，并沿着新疆到嘉峪关的商路，从西北向我国内地深入。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在沙俄侵略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

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充分暴露了沙俄卑鄙和丑恶的侵略本质。

---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32，第15页。

四　沙俄强占帕米尔

帕米尔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帕米尔位于我国新疆西部，古代称为葱岭。它是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交汇而成的高原，平均海拔在四千公尺以上，因此一向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地势险要，土地辽阔，全境除阿赖等河谷地区外，分为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小帕米尔、大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和什库珠克帕米尔等若干个“帕”①。

帕米尔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早在西汉时期，帕米尔已经隶属于汉朝政府的管辖之下了。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汉朝西域都护府管辖下的西域部族中，就包括有葱岭的无雷、休循等部落。汉朝以后，我国历代政府（包括统一的中央王朝和一些地方割据政权）始终在帕米尔行使着主权。如三国和西晋时期，帕米尔地区的休循等部并于疏勒，归曹魏政府和西晋政府所设立的西域长史节制；南北朝时期，帕米尔的喝盘陀等部向北

①“帕”，当地柯尔克孜族语，意思是“高寒平坦之地”。

魏政府遣使朝贡，接受北魏的招抚；隋朝政府曾设西域校尉，管辖范围包括葱岭内外的三十余个部族，帕米尔也在其中。唐朝统一全国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管辖，帕米尔的识匿、俱密、护密、喝盘陀等部都在唐朝安西大都护府辖境之中。其中识匿首领布遮波资、护密首领真檀，还曾分别被唐朝政府授予金吾大将军和特进武卫大将军的官衔。唐朝政府在帕米尔设有乌飞州都督府和至拔州都督府。在喝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还设有“葱岭守捉”，驻扎军队保卫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

在我国古代的大量典籍中，对于帕米尔的自然和社会状况，有着丰富的记载。仅以旅行家的记述为例，十六国时期的法显、南北朝时期的宋云和惠生、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等都曾根据亲身经历和观察，留下了有关帕米尔情况的珍贵资料。其中，以玄奘的记载最为重要。他在《大唐西域记》一书中，叙述了帕米尔的自然状况和“葱岭”之名的由来。玄奘这样写道：“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地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①值得提出的是，玄奘还在书中使用了“波谜罗川”这一地理概念②。“波谜罗川”即

①《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3页。
②同上书，第289页。

帕米尔，这是世界上关于“帕米尔”名称的最早记载。这些记载说明，我国人民对于自己的领土帕米尔很早就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清代，帕米尔的大部分地区是我国柯尔克孜族希布察克部和塔吉克族的活动地区。这些部族都属于清朝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它们的首领“比”、“阿哈拉克齐”等要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呈报清政府批准承认，方能有效，并被分别授以二品至七品的官衔，有的还从清政府那里领取俸禄。

清朝政府曾几次派兵到帕米尔从事平叛等活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兵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①过程中，曾追击叛匪到帕米尔地区。当时，清军先后在和什库珠克岭（在今苏联境内喀拉湖以西）、阿尔楚尔（在今苏联境内北阿尔楚尔）、伊西洱库尔淖尔（今苏联境内雅什里库里湖）一带与叛匪作战，获得大胜。大、小和卓带着少数随从越过边境逃入巴达克山。清军驻守伊西洱库尔淖尔西岸，写信给巴达克山部落首领索要逃犯，结果大、小和卓被巴达克山部落俘获并杀毙，他们的首级被送交清军。为了纪念这件事，清朝政府在伊西洱库尔淖尔以北十里的苏满塔什修建了纪功碑一座，碑上用汉、满、维三种文字镌刻乾隆皇帝所撰写的碑文，其中说：“伊西洱库尔淖尔者，我副将军富德等穷

①1757—1759年大和卓博罗尼都、小和卓霍集占曾在南疆举兵叛乱，被清朝政府平定。

追二酋（指大、小和卓——作者）至拔达克山（即巴达克山—作者）之界，获其降者万人，二酋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献馘，振旅以成茂勋也。”①这块纪功碑，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沙俄侵占帕米尔时，还矗立在帕米尔高原上，是我国对这一地区拥有主权的铁证。1890年时，有一个英国人在帕米尔高原上曾见到这座碑，他记载说：“（雅什里）库里北岸，地名苏满塔什者，有石碑上镌满汉回（指维吾尔——作者）三文，拓一纸译之，知中国追二和卓至拔达克山界而立也。”②

1815年（嘉庆二十年），清朝政府曾调派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部队在帕米尔北部的阿赖谷地（今苏联境内阿赖盆地）堵截喀什噶尔的叛乱分子孜牙敦。1827年（道光七年），清军讨伐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的叛乱时，也曾在阿赖谷地和色勒库尔（今新疆塔什库尔干）、拉克沙（今苏联境内鲁赫奇）等地驻军。据清朝文献记载，清军进剿张格尔的部队统帅长龄，当时曾写信给在阿赖地区作战的将领杨芳，指出：“驻兵阿赖，距浩罕较近，应须加意抚绥”③。可见包括阿赖谷地在内的帕米尔地区始终被视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1878年清朝政府摧毁窃据我国南疆的阿古柏政权之后，加强了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和防务。清朝政府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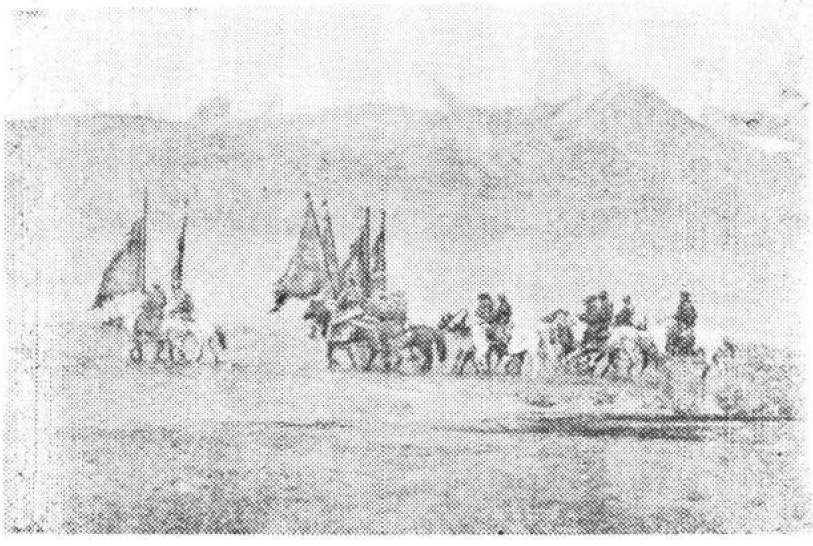
---

① 《皇舆西域图志》卷28，第7页。

② 《英人杨哈思班游记》，载许景澄：《帕米尔图说》。

③ 《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48。

续在帕米尔地区设立了许多卡伦，其中有：设于郎库里帕米尔境内的黑孜吉牙克卡；设于萨雷兹帕米尔境内的六尔阿乌卡；设于阿尔楚尔帕米尔境内的图斯库尔卡；设于小帕米尔境内的阿克素睦尔瓦卡；设于大帕米尔境内的巴什拱拜孜卡、雅尔特拱拜卡；设于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境内的塔克敦巴什卡；设于苏满塔什（在阿尔楚尔帕米尔境内）的苏满卡等。这些卡伦分布在帕米尔的广大地区，清朝政府除派兵驻守外，还定期进行巡逻，以巩固帕米尔的边防。



十九世纪末帕米尔地区的清朝巡逻士兵

清代大量典籍也对我国在帕米尔的主权和与邻国的疆界作了明确的记载。制版于1760年的《乾隆内府舆图》是清朝官方派遣专人经过实地测量绘制而成的，其

中在喀什噶尔西境部分，明确地把帕米尔地区，包括哈拉池、和什库珠克岭、阿尔楚尔、伊西洱库尔淖尔等地都画在我国疆界之内。清朝官方敕修的《皇舆西域图志》（撰成于1762年），也十分清楚地记述了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属境、山水、湖泊等。书中明确写道：帕米尔“在天山西南，与南山会合处，连冈叠嶂，数百余里，起伏迤逦，高者上薄霄汉，为西域西境之屏障，今喀什噶尔、叶尔羌正西一带诸山皆是也。喀什噶尔、叶尔羌两河，皆发源于此。其间土名，随地而殊，于古总谓之葱岭”①。书中还指出，我国的边界是在伊西洱库尔淖尔以西，“淖尔西，南北高峰对峙，北山有小径，通安集延，其西限以大岭，逾岭以南，通拔达克山界”②。对此，嘉庆年间重修的《大清一统志》和其它许多文献也都有相同的记载。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帕米尔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沙俄通过《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割占我国帕米尔的西北部

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沙皇俄国的疆界同我国帕米尔地区仍然距离遥远，并不相接。但是，帕米尔

①《皇舆西域图志》卷23，第7页。
②同上书，卷17，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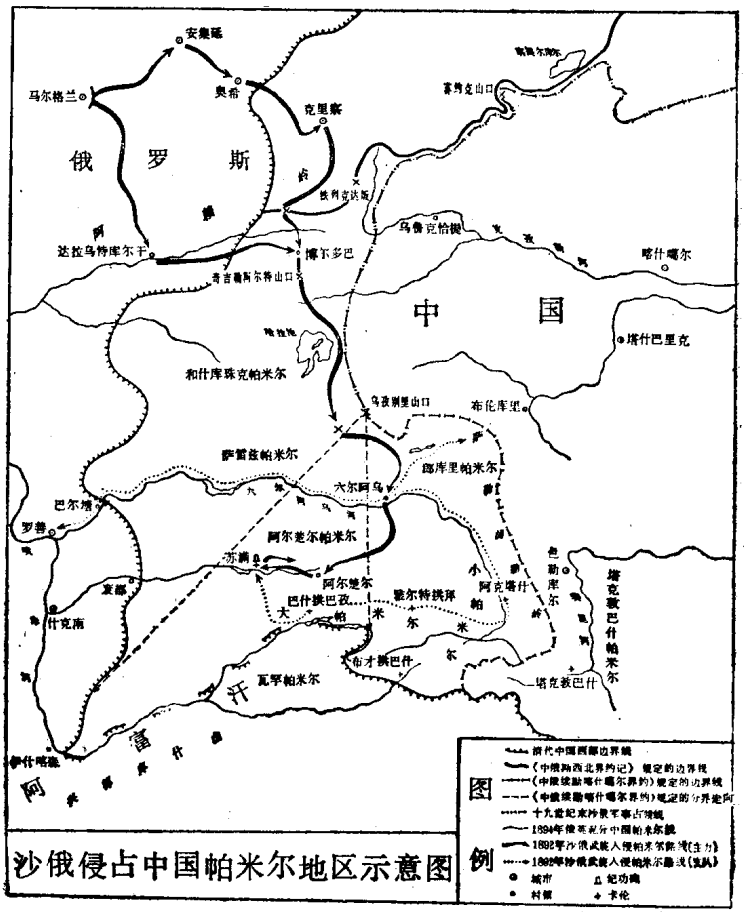
地区在军事上、政治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它作为拱卫我国西部边疆天然屏障和沟通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与印度平原捷径的战略意义，早就引起了沙俄侵略者的注意和垂涎。沙俄认为，占领帕米尔不仅可以为它扩大对我国新疆和西藏的侵略打开方便之门，而且能够增强自己在同英帝国主义争夺亚洲霸权中的地位。因此，它很早就开始了对帕米尔地区的侵略活动。

1864年，沙俄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其中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南端“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尽管这时沙俄的侵略势力实际上尚未达到这里，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还没有一个俄国人到过帕米尔北部的阿赖岭，但是通过不平等条约第一次把俄国的边界向南延伸到我国帕米尔的北部边沿，暴露了沙俄对我国这一地区的侵略野心。

1864——1873年间，沙俄先后用武力征服了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1876年，沙俄灭亡浩罕，将浩罕国土完全并入俄国，改建为费尔干纳省，属土耳其斯坦总督管辖。这样，沙俄的武力占领线扩张到了阿赖岭，和我国帕米尔才算实际接界。

也就是从这时起，沙俄开始利用与帕米尔接界的便利条件，对我国这一地区大肆展开侵略活动。1876年7月，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派遣屠杀中亚人民的刽子手、新成立的俄国费尔干纳省军事长官斯科别列夫，带领“远征军”侵入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北部。斯科别列夫

根据考夫曼的“在所到之处树立起俄国国旗”的侵略指令，用血腥手段残酷镇压了当地我国柯尔克孜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侵占了帕米尔北部的阿赖谷地，并且派兵从阿赖继续南下，侵入帕米尔的哈拉湖、乌孜别里山口、阿克拜塔尔山口等地，还偷偷绘制了包括帕米尔的三千多平方公里地域的地图。



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示意图

1877年9月，考夫曼又派遣了由西弗特洛夫率领的一个武装“考察团”，侵入我国帕米尔进行侦察活动。这个“考察团”在1877—1878两年中，先后窜到和什库珠克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和阿尔楚尔帕米尔等地，盗窃了这些地区的大量情报。

1883年5月，沙俄参谋总部大尉普佳塔率领的大规模官方“考察队”又一次侵入我国帕米尔地区。这时，清朝政府已经加强了在帕米尔的防务。清朝边防部队得知普佳塔“考察队”侵入帕米尔的消息后，曾在郎库里进行拦阻，并质问俄方：“为何不事先通知喀什噶尔当局就自行领兵进入中国境内？”①普佳塔等人在我国严正抗议下不得不离开了郎库里，但却继续在帕米尔的哈拉湖、布伦库里、小喀喇库里、塔什库尔干、尼若塔什、阿克拜塔尔、阿尔楚尔、雅什里库里、巴什拱拜孜等地活动。这个“考察队”几乎窜遍了帕米尔各地，对我国这些地区的自然、社会情况广泛地进行刺探，目的是为沙俄武装鲸吞帕米尔搜集更详细的情报。

在实行武力侵占和从事军事侦察的同时，沙俄还竭力用外交讹诈的手段，通过不平等条约和勘界议定书割占我国帕米尔地区的领土。1881年，沙俄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

①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杜尚别1962年版，第174页。

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沙俄利用这一规定，于1883年6月至10月间，强迫清朝政府派代表与俄方勘定了由别迭里山口起到乌孜别里山口止的中俄界址，逐段设置了界牌，并于次年6月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这次“勘界”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签订，不仅给沙俄在1876年非法占领我国帕米尔北部阿赖谷地领土披上了合法外衣，并且进一步把俄国边界线向南延伸，扩大了沙俄的侵占范围。本来，在1880—1881年的中俄彼得堡谈判中，曾纪泽曾断然拒绝沙俄提出的把俄国边界线向南延长到玛里他巴尔山的无理要求，指出：“崇厚约内所未有之地，断不能增。”①然而，在1883年勘界时，沙俄代表麦登斯基竟胁迫清朝代表沙克都林扎布，不但将俄国边界线一直划到玛里他巴尔山，而且继续向南延伸二百多里之远，直到乌孜别里山口为止。这样，就使包括哈拉湖在内的我国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全部被沙俄所吞并。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第三条中还规定，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以此作为以后中俄两国在帕米尔地区标定边界的走向原则。这项规定，使我国帕米尔西北部领土进一步被沙俄所割夺。因为，按照“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规

---

①《新疆图志》，交涉三，第14页。

定，被明确保留在我国境内的帕米尔领土只是郎库里帕米尔、小帕米尔和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等地，而沙俄则吞并了“转向西南”走向线以西的我国大片领土（包括萨雷兹帕米尔的大部分和阿尔楚尔帕米尔的西北角）。而且，在“一直往南”和“转向西南”两条走向线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地带包括萨雷兹帕米尔的一部分、阿尔楚尔帕米尔的大部分和大帕米尔等地。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我国领土，现在却被变成了归属不明之地。实际上，这也不过是沙俄为进一步抢夺我国帕米尔领土预先制造的一种借口而已。

沙俄武装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我国帕米尔领土

1884年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虽然使沙俄割走了我国帕米尔领土的西北部，但是远没有能够满足沙俄的侵略欲望。为了进一步侵占我国帕米尔的领土，沙俄在1884年以后，更加频繁地派遣武装人员越过《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所规定的俄国边界走向线，到帕米尔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进行各种侦察和骚扰活动。同时，沙俄在国内大肆制造侵略舆论，鼓吹俄国占领帕米尔对于同英国争夺霸权的意义，叫嚣什么“从历史上说，俄国对帕米尔的权利是自然产生的，因为帕米尔从来就是属于前浩罕汗国的版图”，“俄国占领了浩罕汗

国以后，当然有充分的权利把帕米尔接管过来”①。事实上，这种所谓“继承浩罕遗产”的论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帕米尔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而浩罕只不过是十九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一个封建汗国；浩罕虽然曾多次侵犯我国帕米尔的色勒库尔等地，但是结果都被我国军民所击退；它同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分界直到其灭亡前始终是在阿赖岭。所以，帕米尔从来也不属于浩罕所有。沙俄散布“继承浩罕遗产”谬论的目的，不过是为它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制造借口罢了。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沙俄认为侵占我国帕米尔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蠢蠢欲动。1891年7月，沙俄政府派遣一支三百多人的哥萨克骑兵队，在土耳其斯坦常备营上校营长杨诺夫率领下，侵入我国帕米尔。这支侵略军以“游猎”为幌子，实际上负有一系列肮脏的侵略使命。出发前，沙俄政府曾指示杨诺夫要全面探查帕米尔东部的主要交通点，并且授予他“确定俄国在帕米尔的边界”的权力。同时，沙俄还指示驻我国新疆喀什噶尔的领事彼得洛夫斯基，要从“外交角度”保证杨诺夫的活动。杨诺夫侵略军根据沙俄政府的指令，先后窜入我国的阿克拜塔尔、阿克塔什、阿克素睦尔瓦、布才拱巴什等处，侦察帕米尔的地理、交通形势和中国在这一带的防务情况，并且公然在所到之处竖立木杆，粘贴告示，

①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新马尔格兰1891年版，第18—19页。

宣布这些地区“今已属俄”，威逼当地我国柯尔克孜族人民“必须只听从俄国代表的管辖”①。杨诺夫侵略军在进犯伊西洱库尔淖尔地区时，还偷偷挖走了我国建立在苏满塔什的乾隆纪功碑，企图销毁帕米尔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见证。这就是所谓的“杨诺夫第一次远征”。

与杨诺夫侵入帕米尔我国领土的同时，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弗列夫斯基也带领着一支庞大的部队，在靠近帕米尔的俄国边境上进行所谓“巡视”，为杨诺夫侵略军做后盾。

对于沙俄入侵我国帕米尔的行动，清朝政府和新疆地方官员立即向俄方提出了抗议和交涉。新疆巡抚②魏光焘一面命令喀什噶尔道台③向俄国驻喀什领事“执理辩论”，一面照会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要求俄方“速将越境兵撤回”。清朝政府接到报告后，也马上电令驻俄公使许景澄照会俄国外交部，抗议俄方违反条约，“无故越境侵占”中国帕米尔领土。照会中指出，杨诺夫所到的黑孜吉牙克、苏满、阿克素睦尔瓦、阿克塔什等地“皆系中属卡伦”，俄军必须立即撤出这些地区。同时，清朝政府还针对沙俄的入侵行动采取了一定的防

①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3页。

②巡抚是清代省级的地方长官。1883年以后，清朝政府将新疆改建为行省，设巡抚一人，统辖全疆军政事务。

③道台：清代省以下、府州以上的行政官吏，多数是一“道”（清代地方行政单位）的长官。

御措施，派旗官①张鸿畴带领一支部队到苏满驻扎。张鸿畴还在被杨诺夫挖走的乾隆纪功碑旧址找到碑座和一些刻有碑文的断石，“筑立墙壁”，加以保护。1892年1月，清朝查界委员海英根据新疆巡抚魏光焘的命令，在苏满塔什旧址重建乾隆纪功碑，这是我国对帕米尔地区主权的再次体现。

在中国政府多次抗议交涉下，沙俄理屈词穷。同时，由于杨诺夫侵略军兵力有限，无法在帕米尔驻守，沙俄不得不暂时撤退了杨诺夫部队，并向中方承认自己入侵了帕米尔的中国领土。1891年10月3日，俄国外交副大臣希什金当面对清朝驻俄公使许景澄表示：“此番俄武员带兵竟到中国界内，是其错处，已经行文申饬。”“所立木杆，不过记认路径，并非作为界杆，……既属中国地方，尽可撤去。”希什金还答应由俄国政府通知土耳其斯坦总督，“严戒不准派兵入中国界，即要到该处游猎，亦须与华官商允方行”②。

沙俄政府从帕米尔暂时撤兵和向中方所作出的保证，不过是缓兵之计，目的在于争取时间部署新的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1892年1月和3月，沙俄政府两次召开特别会议，对侵吞我国帕米尔问题进行策划和部署。沙俄陆军部、外交部、参谋总部的头目们和带兵入侵我国帕米尔的杨诺夫等人，都参加了会议。沙

①清末新疆地方军队以营、旗为单位，旗官即一旗的指挥官。

②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6，第20页。

俄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等在会上疯狂叫嚣：俄国对于帕米尔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坚定行动”，因为“帕米尔掩护和保证着土耳其斯坦边区的安宁，只要俄国在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边区站住了脚，就可能在兴都库什山的山麓确定边界”，否则假如俄国“在对待帕米尔边区的事情上有所迟误，中国人可能在那里加强防御工事，并将比较顽强地进行抵抗”①。在这些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推动下，会议公然撕毁《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有关中俄在帕米尔地区边界走向的条文规定，提出这段中俄边界“应该是从乌孜别里山口起，沿萨雷阔勒岭，伸向慕士塔格”②。为了实现这个侵略目标，会议决定一面于1892年夏季派遣大股俄国部队武装抢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米尔领土，一面向清朝政府提出帕米尔划界问题，竭力在谈判桌上压迫中国接受它所提出的以萨雷阔勒岭作为中俄国界的要求。

在这两次特别会议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92年4月亲自向土耳其斯坦总督弗列夫斯基发出组织帕米尔远征军的指令。5月，杨诺夫再次被任命为这支远征军的头目。俄国参谋总部还给这支侵略军预拨了十万卢布的装备费和大批薪饷，各项入侵准备工作都在加紧进行。

与此同时，为了给自己即将开始的“帕米尔远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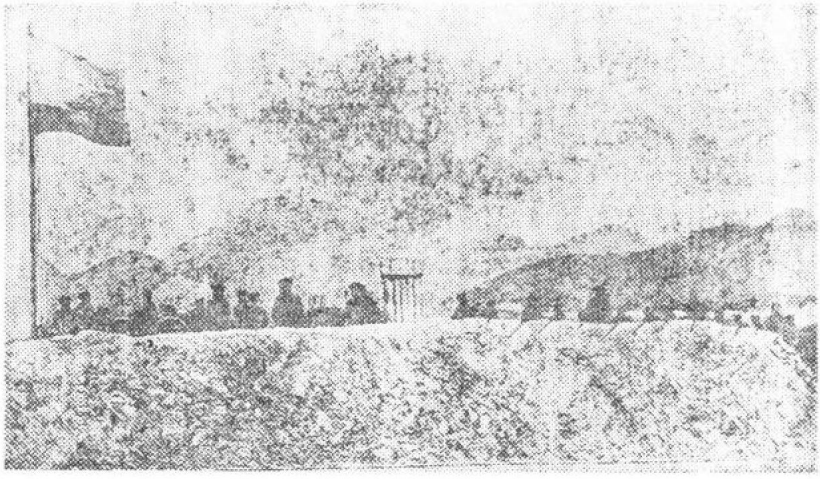
①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7—288页。

②同上。

扫清道路，沙俄外交部还以派员与中国“会勘”帕米尔地区边界为诱饵，一再要求清朝政府撤退中国在帕米尔的卡伦和守军，说什么中国“先撤卡”，俄国即可同意“勘界”。清朝政府对于这种无理要求给予了严正驳斥，指出：“卡伦原设已久，仅有巡查之兵在彼，何至于会勘有碍？”①但是，迫于沙俄的压力，清政府撤退了驻苏满等一些地区的防守部队，使得我国在帕米尔的防御力量大为削弱。

沙俄看到自己的讹诈成功，认为大举入侵的时机已经到了，便背信弃义，由杨诺夫带领着一营步兵，三连哥萨克骑兵，共计一千五百多人，配备四门大炮，于1892年6月再次侵入我国帕米尔地区。这次入侵，被称为“杨诺夫第二次远征”。杨诺夫侵略军利用清朝在帕米尔的防务已经削弱的机会，很快占领了郎库里、苏满、阿克塔什等地，并且深入到布才拱巴什，对帕米尔南部进行侦察。沙俄军队毁掉了我国在这些地区所设立的卡伦，驱逐了清朝的驻军，并在我国六尔阿乌河上游的沙展镇（今木尔加布）建立了沙俄的“帕米尔哨所”，以此作为在我国帕米尔地区盘踞的军事据点，长期留兵驻守。从此，沙俄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又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我国的帕米尔地区，除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外，均沦入沙俄强盗之手。

①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7，第11页。



沙俄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后非法建立的军事哨所

中俄关于帕米尔问题的谈判

当俄军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我国帕米尔领土的事件发生以后，清朝政府立即指令驻俄公使许景澄向沙俄政府提出了抗议，并要求沙俄撤走入侵我国帕米尔的杨诺夫部队。对此，沙俄政府一味支唔搪塞。俄国外交部先是对许景澄说，“俄兵仅巡阅帕地，不久扎，但未悉何处为华界，请开地名，再饬勿进”；后来又说，由于英属阿富汗士兵进入了帕米尔境内，俄兵“难即退”。对于俄军进犯萨雷阔勒岭西侧我国阿克塔什等地的事实，俄国外交部则假称“未知”，百般狡赖。而与此同时，杨诺夫侵略军加紧在我国帕米尔地区构筑工事，为长期驻守进行各项部署。俄军还扬言要越过萨雷阔勒岭，向

东进犯色勒库尔和布伦库里（今新疆布伦口）。面对这种情况，清朝政府为了防止沙俄军队继续入侵，被迫沿萨雷阔勒岭布防，中俄双方军队形成沿岭对峙的局面。

杨诺夫侵略军在萨雷阔勒岭以西站住脚跟之后，沙俄立即使出了惯用的外交讹诈手段，企图以谈判“划定”中俄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为名，迫使清朝政府承认沙俄武装占领帕米尔的既成事实，与沙俄签订新的不平等界约。1892年11月，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向清朝政府提出“帕界”问题，同时出示俄方拟制的分界地图，要求将边界确定为“自乌孜别里转东而南”，即以萨雷阔勒岭作为两国分界线。清朝政府当即驳斥了沙俄这种无理要求，指出它违背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关于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规定，因此“断不能行”。同时，清朝政府主动作出让步，表示对“转向西南”线和“一直往南”线之间三角地带的中国属地，可与俄国协商划分。

1892年底至1893年初，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根据清朝政府的指令，在彼得堡与沙俄外交部展开交涉，一再驳斥俄方提出的以萨雷阔勒岭作为两国分界的荒谬主张。许景澄多次面晤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卡普尼斯特，并且照会俄国外交部，阐述中国方面对于解决帕米尔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在中国不难按历来书史以验各帕地实属中国，所以欲凭喀城界约（指《中俄续

勘喀什噶尔界约》——作者）商办者，因系两国商订之条，并可见中国格外相让以敦和好之谊也。”① 这说明，尽管《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是一个不平等的界约，清朝政府还是准备以它作为基础来解决中俄在帕米尔的边界问题的。可是，沙俄却竭力寻找借口，企图否定这个签订还不到九年的界约的规定，以达到吞并萨雷阔勒岭以西我国帕米尔领土的目的。卡普尼斯特代表沙俄政府向许景澄狡辩：“此约所云乌仔别里山以下之地，语意实在过于宽混，难以作准。……如依此划分，恐于两国利益有碍。如按地势将山岭分水之处分之，不拘东西南北之说，则尽善矣。”这种毁约行径，当即遭到许景澄的指斥。许景澄质问卡普尼斯特：“两国所定之界约如果不能作据，则更有何据定断？何为中国、何为俄国之地？”②沙俄外交部无法自圆其说，最后竟采取蛮横态度，声称它所提出的以萨雷阔勒岭为中俄分界的主张“无可改移”。

为了促使帕米尔问题的尽快解决，清朝政府于1893年3月主动向俄方提出中俄在帕米尔分界的具体方案，即：从乌孜别里山口起，经过阿克拜塔尔山口、卑来乌提山口、帕沙脱山口、昔木甫喀、尼赤塔什山口，南到萨雷库里。应当指出，这个方案虽然坚持了“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规定，但是却屈服于沙俄的压力，对“转

①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4，第14页。
②同上书，卷7，第25页。

向西南”线和“一直往南”线之间的中国属地作了无原则的退让。尽管如此，沙俄仍然拒绝接受，声称：“中国所说之界，虽有地名，其实仍是喀城界约往南之意，殊无可商。”①4月，清朝政府又派驻法参赞庆常前往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同在该地养病的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会谈帕米尔问题。格尔斯搬出“继承浩罕遗产”的谬论，胡说“帕米尔向归浩罕，浩罕既已归俄，帕地自应与之俱归”，企图否认中国对帕米尔的主权，并且声称俄国占领帕米尔是出于与英国竞争的需要，“帕事重在他国，不重在中国，亦与新疆险要全不关涉”。庆常当面驳斥了格尔斯的说法，指出：“帕米尔归浩罕管属说，未之前闻。而其属华则确有证据：一则从前官兵迭入帕境平定巨寇，勒石纪功，至今犹存；一则帕地向有中国卡（伦），见于贵国公牍；一则帕地之民向受华官约束，应中国差徭；一则贵国游历将弁皆谓帕之东境归华管辖，未有定界。此皆中国实在证据。况有成约，尤为坚固。”庆常还指出：“俄国与他国相争，与中国无涉。吾华但欲固守帕米尔应归华属地界，不侵邻境，亦不容他国侵我之地，此最光明磊落。”②在中方代表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公正立场面前，格尔斯无言以对，只好推托其词，声言自己一人不能作主，必须和陆军部协商，呈请“国主定夺”。当年8月，庆常被清朝政府

①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8，第3页。
②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8，第5—6页。

调赴俄国专任议界事务后，又多次会晤格尔斯，要求俄方对中方提出的划界方案作出答复。格尔斯找不出别的理由拒绝中方的方案，居然狡辩说："帕米尔界务应以喀约为据一节，我国主本愿照办，无如喀约洋文（指《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俄文本——作者）但有华界向南，并无一直往南之语。且既经声明两国界限至乌仔别里而止，则乌仔以下并无着落。是以总署（指清朝总理衙门——作者）所拟界址，碍难照准。"①格尔斯的这种说法，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尽管《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俄文本和中文本的文字有所差异（俄文本把"中国界线一直往南"写作"中国边界向南"，没有"一直"二字），但这两种文本所规定的中俄在帕米尔地区边界的走向是一致的，沙俄想赖是赖不掉的。庆常当即反驳了沙俄的谬论，指出："约文方向有定"，必须按照界约所规定的走向来划定中俄边界。然而格尔斯置若罔闻，仍然拒不接受中方的划界方案。

1893年11月，格尔斯抛出俄方关于帕米尔划界的所谓修改方案，主张"自乌仔别里向南数俄里，顺东南山梁折东，沿郎库里湖北岸，又东南顺山坳转至派格士别山梁止，其南仍画萨山（即萨雷阔勒岭——作者）为界"。这个方案与上年11月沙俄所提出的划界方案相比较，只不过在北面稍稍作了些修改，把郎库里帕米尔

①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8，第15页。

的一小部分还给中国，而萨雷阔勒岭以西我国广大的帕米尔领土仍被划入俄境。对于这样一个修改方案，清朝政府断然拒绝，表示“万不能允”。格尔斯立即撕掉“愿与中国和商”的假面具，公开威胁清朝政府：“中国不体量俄国相让之意，强与争辩，……可见中国之意，不为新疆边防起见，而为印度边防起见。似此情形，碍难和商。”“现在英俄商议帕事，……与其同中国作无谓之周旋，不若与英国商定一切，以符兵部（指沙俄陆军部——作者）初议。”①在沙俄威胁之下，清朝政府再次退让，提出了一个“顺阿克拜塔尔河，经沙展，过阿克苏河，由库那克拜之西，至喀马乌推克，再由沙里塔什西面，南过伊什提克河，至小帕米尔山北为止，东属中、西属俄”的妥协方案。沙俄对于清政府的这一让步仍不满足。格尔斯声称，帕米尔东境“为英俄必争之路”，俄国“重在守战”，“故兵部主政，非寻常交涉可比”。清朝政府代表庆常当即提出反驳：“帕之东境本为中国所属地方，贵国重在守战，中国亦重边防，万难相让。”格尔斯竟然荒谬地说：“帕之东境实在葱岭之外，非中国险要，……即使中国得地，亦毫无用处，何必争此石田，致碍和好。”在这种又压又诈的卑劣论调面前，庆常严正表示：“中国固有之权，断难舍弃。”“中国必争此土者，一因本系旧属，一因前有喀

①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8，第25—26页。

约，固不论有无用处。试问俄国无用之地甚多，岂能因其无益而弃之乎！”①给了沙俄以有力的驳斥。

由于沙俄坚持以萨雷阔勒岭为分界线，蓄意侵占我国领土，致使中俄关于帕米尔问题的交涉历时一年多，毫无结果。沙俄看到一时无法压迫清朝政府完全屈服，为了拖延帕米尔问题的合理解决，继续霸占我国帕米尔领土，便于1894年4月照会清朝政府，提出“两国各不进兵以作调停”的建议，说什么“今因中俄两国商办帕米尔界务，彼此意见不同，目前实难议结，是以本国国家拟请彼此按照现在局面情形，各饬该管官员仍驻原处，不准前进，……现在局面暂不变动，徐候商议定局，并无妨碍。如有争论或须续商，即在北京议办”②。当时，中日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清朝政府对于沙俄在我国帕米尔的侵略行动没有力量组织反击，因此，被迫同意这个建议，暂时保持双方军队各自的位置，等候帕米尔问题的最终解决。清朝政府在给沙俄政府的复照中郑重声明：“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1884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清朝政府的这项声明，重申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指出沙俄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中国帕米尔领土是非法的，对于中国在帕米

①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8，第30—31页。
②同上书，卷4，第17—18页。

尔的领土主权作了明确保留。对此，沙俄政府也无法提出异议。4月23日，沙俄政府向清朝政府发来照会，表示：中国的声明俄国“均已阅悉”，“帝国政府在自己这方面，已根据相互原则，命令俄国机关不得超越它们目前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俄国和中国之间对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①

1894年4月中俄两国就帕米尔问题换文以后，沙俄一面背着清朝政府加紧勾结英帝国主义进行瓜分帕米尔的肮脏交易，非法划定俄英双方在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势力线；一面拒不履行它所作出的“徐候商议定局”的诺言，致使中俄两国有关帕米尔的划界谈判一直没有恢复。萨雷阔勒岭以西我国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帕米尔领土就这样被沙俄所霸占，并且延续至今，成为中苏之间的边界悬案。

①俄国《外交部公报》，第四卷附录，第509页。

五　沙俄阴谋吞并我国西北地区

野心勃勃的“巴德马耶夫计划”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沙俄帝国主义除了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军事封建”的特点。列宁曾经指出：“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这个国家的最新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①。由于大量封建残余的存在，俄国国内市场狭小，经济上仍然落后于欧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沙俄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斗争中，很难单纯依靠经济力量同英、美、法、德等国竞争，而更多地乞灵于发展军国主义，乞灵于对别国领土的直接兼并。因此，在俄国，“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②。

沙俄这种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对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674、801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93页。

外侵略方面更加疯狂和更具有冒险性。在远东，沙俄在这一时期力谋吞并我国东北、北部和西北地区，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我国大片领土，建立俄国在东亚的霸权。

为了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扩张目标，沙俄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着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西起车里雅宾斯克，与俄国欧洲本土的铁路相衔接，东至海参崴，横贯西伯利亚全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受到沙俄政府的高度重视。1891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特派皇太子（即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到远东“旅行”，在海参崴主持这条铁路的开工典礼。1892年，积极主张向远东扩张的沙俄侵略分子维特被沙皇任命为交通大臣和财政大臣后，更加狂热地推行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维特拚命鼓吹西伯利亚铁路对于俄国夺取远东和太平洋霸权的意义，称它为“广义的国家企业”、俄国“世界政策的工具”，叫嚷这条铁路“将保证供给俄国海军一切必需品，使之在我们的东方港口有坚固的支持点”，“一旦欧洲或东亚政局发生动荡，它将由于控制着太平洋水域的全部国际贸易活动而具有高度重要的意义”①。根据维特的提议，1892年12月成立了“西伯利亚铁路特别委员会”，由皇太子尼古拉担任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尼古拉继任为沙皇后，继续担任

①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60页。

这一职务）。这个特别委员会被赋予极大的权限。它有权管理铁路修建方面的全部行政和立法事宜，并负有“排除一切不必要的耽搁”，以加速铁路修建的责任。在沙皇政府的一再督促下，西伯利亚铁路以平均每年五百八十七俄里①的修建速度加快进行。

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同时，一个旨在吞并我国西北、蒙古和西藏地区的秘密计划在沙俄统治集团中酝酿产生了。这个秘密计划的具体泡制者叫巴德马耶夫。此人原名扎姆萨兰，是俄国布里亚特人②，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文系。从1875年起，他在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并改信东正教，认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教父，改名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德马耶夫。1893年2月，他通过维特向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一份名为“俄国在远东的迫切任务”的条陈，建议沙皇政府将已经铺轨到外贝加尔湖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向南延伸，通过蒙古、贺兰山直修到我国甘肃省省会兰州，“在那里，在中国的‘后院’，俄国应该秘密地促使西藏人、蒙古人和中国伊斯兰教徒普遍起来叛离满清朝廷”，“在他们的叛变成功后，那些领袖将要求俄国沙皇保护，而许多亚洲民族将不经过流血就并入俄罗斯帝国之内”③。为了完成这个吞并我国西北、蒙古和西藏的计划，巴德马耶夫提

①1俄里等于1.06公里。

②布里亚特人，是贝加尔湖沿岸地区的蒙古族居民的通称。

③转引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伯克利1958年版，第48页。

议由他雇用几千名同我国蒙、藏等族都有商业和宗教关系的俄国布里亚特人，开设一个间谍“公司”，打着从事贸易活动的招牌，潜入我国西北、北部和西藏等地，“宣传他的思想，同时以武装供给蒙古和甘肃的心怀不满的人”，以便在适当时机举行暴动。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巴德马耶夫计划”。

这个计划迎合了沙俄加紧向远东扩张的野心，得到沙俄政府的支持。维特在向亚历山大三世转呈巴德马耶夫的条陈时，特意附加了自己写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巴德马耶夫的计划“叙述了严肃认真的见解”，说明了“实际政策问题的一个新观点”，如果得以实现，“有了太平洋沿岸和喜马拉雅山的俄国，就不仅能主宰亚洲的事务，而且还能主宰欧洲的事务”。因此，他极力怂恿沙皇将巴德马耶夫计划“立刻付诸实施”①。亚历山大三世看到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后，尽管对它是否能够成功表示怀疑，仍然决定从国库拨出二百万卢布的巨款予以支持。于是，一个旨在分裂和吞并我国西北、蒙、藏地区的间谍机构，以“巴德马耶夫商务公司”的名义成立了。

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病死，尼古拉二世继承了皇位。这个末代沙皇较之他的父辈更加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实现历代沙皇所未能实现的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梦想，疯狂地在远东推行殖民扩张和霸权主义政策。他曾多次叫嚷：“在东亚确立和扩张俄国的势力，正是我们

①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第48—49页。

统治世界的课题。”他念念不忘的是：“使俄国皇帝再加上下述称号：中国皇帝、日本天皇等等。”①一个曾经担任过尼古拉二世的导师、后来一直是沙俄向远东扩张急先锋的乌赫托姆斯基亲王，说得更为露骨：“俄国之鹰的翅膀已经广阔地伸延至全亚洲，丝毫不容怀疑，将来我们誓当彻底吞并这些地区。从那之后，亚洲将成为亚洲俄罗斯的同义语。”②

在这种狂妄的扩张野心驱使下，沙俄政府支持“巴德马耶夫计划”加紧执行。继“公司”总店在赤塔附近建立之后，1895年，巴德马耶夫又为训练他所雇用的布里亚特人专门在彼得堡开办了一所中学；同时，他还在我国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设立了一所用于同样目的的“职业学校”。为了培养间谍，巴德马耶夫还向沙俄政府建议：“物色中学毕业、愿入彼得堡大学东语系学习的青年，给予每月五十卢布的优厚助学金，并以官费送到东方实习三年，计入资历，而后入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深造二年，合格者毕业后以九品官录用，送往东方执行任务。”③1895年和1897年，巴德马耶夫两次窜入我国，进行秘密活动。以“巴德马耶夫商务分公司”和“办事处”为名的沙俄间谍机关，在我国蒙古和东北地区的一些城镇相继建立。1898年1

① 《维特回忆录》柏林1923年版，第1卷，第398页。
②艾克哈特：《俄国》，纽约1930年版，第245页。
③巴德马耶夫：《俄国与中国》，彼得堡1905年版，第79页。

月，英国驻俄公使欧格讷在向英国首相索耳兹伯里报告他同维特会谈划分俄英在华势力范围的情况时，曾经写道：维特“从一张锁得严严实实的拉盖式写字台中取出一张中国地图，开始用手围着直隶、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划了一个圈，然后说，‘俄国迟早会吞没这一大片土地的’。”维特“又指着兰州说，西伯利亚铁路以后将有支线通到这个城市，并说他已草拟好了这条支线的长度和造价等等细节”①。这说明，巴德马耶夫计划这时已经成为沙俄政府跃跃欲试的一项重要决策了。

当然，“巴德马耶夫计划”的实施并不象沙俄扩张主义分子们所吹嘘的那么轻而易举。由于我国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这个计划不能不到处碰壁。沙俄在我国西北和蒙藏地区组织暴动的狂想越来越显得渺茫。同时，也由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使得俄国的政策转到更为实际得多的方向上去了”②。在这种情况下，“巴德马耶夫计划”后来逐渐被更现实的侵华活动所代替，不再能引起沙俄政府的重视了。尽管如此，这一计划所追求的狂妄目标——吞并我国西北、蒙古乃至西藏等地的野心，却始终未曾被沙俄所放弃。

---

①古奇等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伦敦1926年版，第1卷，第8页。

②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第49页。

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独占我国西北地区的各种经济权益

十九世纪末，国际帝国主义争夺东亚地区霸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列强纷纷在我国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给我国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列宁在当时就曾指出："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①

在这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俄不仅要独霸我国东北，而且竭力要把我国北部各省全部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还在1897年10月，即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前夕，沙俄就曾通过驻华代办向英国驻华公使声明："俄国政府认为，同俄国边境接壤的中国诸省必须不落入俄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之下。"②明确表示了它对我国这些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②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中译本，第212页。

地区的贪欲。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沙俄又以承认德国的占领为交换条件，多次向德国讨价还价。沙俄要求德国承认“中国北部各省，包括全部满洲、直隶及新疆在内”，都是俄国的“独占行动范围”，俄国“不能让任何外国政治势力侵入这些地区”。德帝国主义则乘机要求沙俄“诚恳地、有效地协助”它强迫清朝政府接受“租借”胶州湾的不平等条约，并承认它“在山东的、包括黄河在内的利益”①。通过这种相互交换，沙俄在划分在华势力范围问题上争得了德帝国主义对自己的支持。接着，沙俄又与英帝国主义进行肮脏交易。经过多次谈判，俄英暂时妥协，1899年4月，两国互换照会，声明：“英国不为本国或代表本国臣民及其他方面，提出在中国长城以北敷设铁路的要求，同时，不得直接或间接妨碍沙皇政府所支持的在该地方敷设铁路的要求”；“俄国不为本国或代表本国臣民及其他方面，提出在中国扬子江流域敷设铁路的要求，同时，不得直接或间接妨碍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在该地方敷设铁路的要求”②。这里谈的虽是铁路敷设问题，实际上却是俄、英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强盗协议。

---

①《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卷，第210、212页。

②麦克墨莱：《1894—1919年有关中国条约和协定汇编》纽约1921年版，第1卷，第204页。

揭露沙俄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瓜分中国的清末木刻宣传画。图中北面的熊表示沙俄。

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一面伙同英、法、美、德、日、意、奥等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一面单独出动十七万大军，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与此同时，沙俄在我国西北边疆也借口“保护俄商”，派兵从塔什干侵入伊犁地区，强行驻兵于宁远城。沙俄采取这些行

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镇压由于帝国主义瓜分激起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而且企图一举吞并我国东北等地，以实现它的“黄俄罗斯”的扩张计划。

但是，我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得沙俄这种直接吞并我国东北领土的计划暂时无法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沙俄又转而采取以交还东三省为诱饵的手段，企图乘机独占我国东北、蒙古和新疆等地的各种经济权益，以便逐步将这些地区变为它的殖民地。

1901年初，中俄双方在彼得堡举行的关于“交收”东三省的谈判一开始，沙俄即向清朝政府提出了十二项侵略要求。其中除将我国东北地区的各项权利囊括一空外，还要“中国政府不经俄国政府同意，不得将同俄国毗邻的所有省份（即满洲和蒙古）以及同俄国邻近的甘肃、新疆省内的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于田等地区的铁路修筑、矿藏开采或任何工业企业方面的特许权给予任何外国及其公民。在上述省份的所有地方，除开放港口牛庄以外，中国政府不经俄国政府同意，不得用自己的资金修建铁路，也不得将这些地方的任何一块土地让给外国人使用。”①这个独占我国东北、蒙古、新疆等地各种经济权益的要求，不仅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插手俄国在中国为自己所划定的势力范围，而且限制中国人不得在自己的神圣领土上从事筑

①转引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第158页。

路等活动，实在是狂妄已极。清朝政府谈判代表、驻俄公使杨儒当时就指出，沙俄所提此项条款，乃是欲将中国“矿路利益，一网打尽”，“其侵我兵权利权，以图自便，可谓周密深远”①。

沙俄政府在抛出这个恶毒的侵略“约稿”后，就施加种种压力，企图迫使清朝政府承认其要求，在“约稿”上签字。在谈判中，杨儒就俄方“约稿”中的无理要求提出质问：“蒙古、甘肃、新疆，……俄兵并未占踞，何得包括在内？”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居然蛮横地回答：“该数省虽未经俄兵占踞，然俄之兵力足以占踞！”杨儒又提出：俄方“所索条款内，不准中国将利益让给他国人，何得禁止中国亦不准自行造路？大无道理”。对此，拉姆斯道夫马上又换上一副亲善的面孔进行诱骗，说什么：“此层专为中国预留地步，以便异日拒绝他国人之要索利益”②。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也出面对杨儒大肆恫吓，声称：“此次拟约稿时，本大臣与拉外部屡次酌商，方得定出无可再改之款，如商议不成，延宕月日，武员必另生枝节，与我等为难，强割满洲之地。”维特还威胁说：中国“刻下只有二条路可走：或

①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北平1935年版，第29页。

②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天津1932年版，第4册，第105—106页。

赶速画押，得俄国之帮助；或与俄决裂，听俄之自便。”①同时，沙俄还直接在北京对李鸿章等人进行威逼和利诱。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思威胁李鸿章说：“俄京约款一事，中国如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②沙俄甚至不惜再次用重金收买李鸿章，告诉他只要能促成签约，俄国愿以五十万卢布相送。

沙俄的侵略阴谋遭到我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东北掀起了英勇的抗俄武装斗争，不断给沙俄占领军以沉重的打击；上海、杭州等城市举行抗俄集会，愤怒谴责沙俄“外假仁义，阴怀谲诈，以亡波兰之狡计，施于我中国”的强盗行径；香港、澳门同胞和新加波、檀香山等地的华侨，纷纷致电清朝政府，强烈要求拒绝与沙俄签约。同时，日、英、美、德等帝国主义也从各自的在华侵略利益出发，对沙俄的独占政策表示反对，出面进行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沙俄使用了各种卑劣手段，清朝政府最后还是决定拒绝签约。沙俄利用“交收”东三省的谈判独占我国东北、蒙古、新疆等地各种经济权益的阴谋遭到了失败。1901年4月5日，沙俄政府以“义和团暴乱中俄国政策的概述”为题发表声明，在哀叹自己阴谋的破产之后，声称：“帝国政府一面保持对满洲的暂时性军事占领，以便在漫长的俄国边境的附近地带维

①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册，第115—116页。
②《西巡大事记》，卷5，第16页。

持秩序，同时仍然忠实于它明确表示过的政治纲领，静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①这就是说，沙俄并不准备就此罢休，它还想等待新的时机，从事更大规模的侵略和讹诈，以实现它在远东扩张的“政治纲领”。

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企图武力吞并我国新疆

1911年，我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沙俄对我国革命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它一面勾结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和我国国内的反动派，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一面乘机扩大对我国的侵略，妄图吞并我国东北、北部和西北的领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刚一爆发，沙俄政府即蠢蠢欲动，企图利用我国国内的动荡局势来实现它的侵略欲望。11月，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写道：“从我国利益看来，目前中华帝国的瓦解在许多方面是我们所希望的。即使中国各地区并不完全独立，而彼此之间也将展开削弱它们自己力量的互相敌对行动。”尼古拉二世急忙在这个报告上作了赞同的批示，并通知其驻华公使：“把中国分为几个

①转引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第160页。

独立国家，在我们看来，是与我们广泛的利益一致的。”①要他为此而积极行动起来。1912年1月，沙俄新任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迫不及待地向沙皇上奏，建议采取更积极的步骤，以吞并中国领土。他声言：“此为俄国运用外交手腕勿须以武力并吞中国领土而能达到其宿愿之大好时机”②。与此同时，沙俄还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紧张的活动。它一面向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表示，俄国为了在中国东三省北部、蒙古和新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享有在这些地区“行动的自由”；一面开动国内的全部宣传机器，掀起一片侵华的鼓噪。沙皇政府御用的报刊狂叫：“俄国应当迅速派遣国防军，进入中国各个已经倾向于俄国的地区”，“瓜分这个世界的赘物”③。沙俄前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也在这前后抛出了《俄中问题》一书，鼓吹“必须把俄国与蒙古的边界推进到戈壁沙漠的天然界限”，“要使包括伊犁的新疆北部全境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或者成为俄国的属地”。他还设计了一个俄中边界的“理想方案”，即从天山的汉腾格里峰到东方的海参崴划一条直线，在这条直线以北的我国北满、蒙古和新疆北部都应并入俄国版图。库罗巴特金叫嚷，“当前正在中国进行的革命运动增大了今天立即着手按上述方案改变俄中边界的可

①转引戴林：《俄国在亚洲的兴起》，耶鲁大学1949年版，第110页。
②转引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416页。
③《新时代》1911年11月30日。

能性”，极力煽动向中国发动侵略的狂热①。

从这种狂妄的扩张野心出发，沙俄这时在我国北部边疆一手制造了外蒙“独立”的丑剧，肆意分裂我国的领土。同时，又直接出兵新疆，妄图武力吞并我国这一地区。

1912年5月，沙俄借口“保护”领事馆，向我国伊犁派兵二百余名，强行在宁远驻扎。接着，又于6月份派遣步兵五营，骑兵二营，共八百多人（后陆续增加到一千多人）侵入我国喀什。这些入侵俄军公然将我国领土“视若属土”，任意干涉当地我国的行政和司法，到处张贴告示，威逼我国居民“速备供给，毋须反抗”②。沙俄凭借着这些入侵武力，在伊犁、喀什作威作福，经常“纵令军士佩带枪刀，游行街市，习以为常”，而且“有意启衅”，力图挑起与中国民军③之间的武装冲突，以便为它扩大出兵、全面侵占新疆制造借口。

沙俄出兵我国伊犁、喀什后，当时的北京民国政府和新疆都督④曾多次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沙俄撤兵。但是，沙俄不仅拒不接受这一正义要求，反而继续加派军队。沙俄军队源源不断地向我国境内开来，“大有久据之意”。据当时中国驻俄代表的报告，沙俄外交部和陆军部还秘密制订了进一步增兵新疆的计划，打算“调莫斯科

①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第173、196页。

②《申报》1912年9月4日。

③指当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建立的武装。

④都督是民国初年的省级官名，为一省最高军政长官。

劲旅，分两路进兵，一由喀什噶尔进取叶尔羌及和田，一由伊犁进取那拉特山”①，以图全面占领我国新疆地区。

此后，沙俄又于1913年9月出动一千五百多名侵略军进犯我国阿尔泰地区，占领了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县）。沙俄出兵阿尔泰的借口是所谓“枪击俄领”事件，事实真相是：当年7月22日，沙俄驻阿尔泰领事在街上喝酒逞凶，当地中国驻军上前盘问，竟被沙俄领事持棍乱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名中国士兵用枪刺伤了这个家伙。这件事发生后，沙俄政府立即借端生事，向中国方面提出撤走阿尔泰驻军、惩办“凶手”和向俄方道歉三条无理要求。袁世凯政府慑于沙俄的压力，下令撤走了在阿尔泰的部分军队。不料，沙俄却乘中国撤军之机，出兵占领了承化寺，并且在我国这一地区建造营房，架设电线，大量移民居住，企图长期霸占。对此，中国政府曾多次向沙俄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从阿尔泰撤走入侵俄军和非法越境前来的移民，但却始终遭到沙俄的蛮横拒绝。1914年2月，沙俄又向中国政府提出撤兵的六项条件，要求中国承认沙俄在阿尔泰地区享有免税贸易、内河航行、扩建通商码头、建造工商各项房产以及任便居住、渔猎、耕种等各项特权，并且企图否定中国政府对该地区的主权，“欲引哈萨克外向，使逐渐脱离中国管理之权，俨然含有独立性质”②。对于这些

① 《申报》1912年8月7日。

②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第2页。

蛮横无理的侵略要求，中国政府表示不能接受，并指出，俄方“所提条件与撤兵乃系两问题，不能相提并论”①。

我国西北边疆人民坚决反对沙俄出兵伊犁、喀什、阿尔泰的侵略行径，1912年6月，南疆爆发了震动中外的“策勒事件”；伊犁、阿尔泰人民的抗俄斗争烈火也越烧越旺。由于我国人民的沉重打击和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即将爆发，沙俄才不得不于1913年10月和1914年10月分别撤离了在喀什和伊犁的侵略军队。当然，这并不表示沙俄放弃了扩张的野心，它除了赖在阿尔泰不走外（入侵阿尔泰的沙俄军队直到1917年沙皇政府倒台后才撤离回国），还继续密谋吞并我国新疆领土。1915年5月，沙俄驻喀什领事馆的官员就曾透露说：“所有俄国官员都在为并吞中国的伊犁地区、塔尔巴哈台地区和乌鲁木齐地区而工作”②。直到沙俄复灭的前一年，即1916年，那个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分子库罗巴特金还曾再次上奏尼古拉二世，阴谋策划实现他的从汗腾格里峰到海参崴之间划一直线的“改变俄中边界”方案，企图把我国新疆、蒙古和东北的大片领土“变成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③。只是由于俄国革命的爆发，沙俄的这个侵略方案才化为了泡影。

---

① 《民国政务司各国悬案·承化寺俄兵案》。

②转引斯克莱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伦敦1973年版，第241页。

③《红档》，1929年第3期，第73页。

霸占我国唐努乌梁海

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吞并我国新疆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却用武力霸占了我国西北边疆最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野蛮地吞并了这块面积约十七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

唐努乌梁海地处叶尼塞河的上游，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盛，森林茂密，不仅适宜于畜牧业和农业，而且盛产各种珍贵的皮毛，地下矿藏也很丰富。远在唐代，居住在这一地区的都波（也称都播，即现代“图瓦”的音转）部落就接受了我国唐朝政府的管辖，隶属于唐燕然都护府下的瀚海都督府之中。其后，这一地区先后为我国辽、金王朝的辖地。元代，则归元岭北行中书省节制。明朝时期，这一地区先为蒙古瓦剌部所控制，后来成为蒙古喀尔喀部扎萨克图汗的领地。清王朝兴起以后，唐努乌梁海人同喀尔喀蒙古各部一起向清朝称臣，接受了清朝政府的管辖。1727 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以唐努乌梁海北面的萨彦岭作为中俄两国的分界，从法律上再次确认了唐努乌梁海属于我国领土这一事实。在这以后，清朝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管辖，在这里分设五旗、四十六佐领，置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官吏，统属于清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统治和管理。1864 年，沙俄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

北界约记》，割占了唐努乌梁海西部十佐领的土地。但是，即使按照这个不平等的界约，唐努乌梁海的大部分地区仍在我国版图之内。事实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政府也一直在这些地区行使着有效的管辖权。

沙俄对我国唐努乌梁海早就怀有侵略的野心。十七世纪时，沙俄就曾派遣间谍到唐努乌梁海进行分裂活动，企图收买当地的封建上层投靠俄国，以达到吞并这一地区的目的。当这种阴谋遭到失败以后，沙俄又通过开展“贸易”、从事“考察”等方式，继续对唐努乌梁海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渗透活动。1864 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以后，沙俄对唐努乌梁海的侵略更加猖狂，大批俄商和打着“探险”、“考察”幌子的沙俄侵略分子纷纷涌进我国这一地区，建立商站，开设店铺，挖掘金沙，从事各方面的掠夺活动。沙俄还非法殖民，将米努辛斯克乌斯地区、叶尼塞斯克地区的俄国居民大量迁入唐努乌梁海，抢占我国居民的土地、牧场，扩大它在我国这一地区的势力。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沙俄积极策划吞并唐努乌梁海。1904 年和 1907 年，沙俄政府曾先后派遣波波夫和罗杰维奇窜入唐努乌梁海进行侦察。这两个间谍回去以后，都竭力鼓吹“迅速占领唐努乌梁海”。罗杰维奇在给沙俄政府的报告里写道：“乌梁海确实是俄中边境上抵抗力最小的一个点，但在这薄弱的后面却是一个富饶的省份，

……在这里可以花费最小的力量取得最大的成功。”①此后，沙俄加紧进行吞并唐努乌梁海的准备。1909年，沙俄从国库拨款，修筑了由俄国通往唐努乌梁海的马车道，以便于运送侵略物资和展开军事行动。1910年，沙俄公然践踏《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的规定，私自毁掉了唐努乌梁海北面萨彦岭上的察布齐雅界牌，并且拒绝会同中国官员查勘这段中俄边界和重立界牌。到1911年初，沙俄伊尔库次克省的军政头目拟订了占领我国唐努乌梁海的详细计划，准备付诸实施。与此同时，沙俄国内的资产阶级报刊叫嚣唐努乌梁海“当属俄境”等等。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认为吞并我国唐努乌梁海的时机已到，开始动手。1912年1月，沙俄驻华代办谢金从北京给沙俄政府发回一份紧急报告，建议“立即占领乌梁海区”，声称：“一方面，我国对此一地区无疑有法律上的权利；另一方面，达到目的的适当政治情况业已具备。”对于谢金报告中所说的俄国对唐努乌梁海“有法律上的权利”这一点，连沙俄政府自己都感到无法自圆其说，其外交大臣沙佐诺夫在向沙皇转呈谢金的报告时不得不承认：“证明乌梁海区属于俄国的论据已被莫斯科总档案库文牍四等文官贝洛库罗夫不久以前所完成的工作所驳倒。贝洛库罗夫根据十八世纪末（约当我

①卡鲍：《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莫斯科1934年版，第149页。

国和中国缔结布连斯奇界约时）的原文件及地图材料得出下列结论：1727年由俄国和中国全权代表依布连斯奇条约所划界规定了沿萨彦岭的疆界。划界以后在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监督下绘制的边界地图对此也作了肯定。因此，必须承认俄国在乌梁海地区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而我们要占领萨彦岭至唐努乌拉山脉之间土地的动机，可能仅由我们利益的观点才有采取此种措施的必要。”沙佐诺夫的这段话，充分表明沙俄政府对于唐努乌梁海属于中国所有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然而，为了侵略扩张的需要，沙俄是根本不管什么“法律上的权利”的有无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看到谢金和沙佐诺夫的报告后，立即批示：“我完全同意驻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地区问题以来，业已三月有余，中国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什么利益。请回忆一下我们占领阿穆尔地区的历史吧！”①根据沙皇的这一侵略旨意，沙俄伊尔库次克省当局于1913年趁外蒙在沙俄支持下宣布所谓“独立”、我国驻乌里雅苏台的官员被驱赶的机会，悍然派遣所谓“边境专员”和“移民官”进驻我国唐努乌梁海，发号施令，胁迫当地一些封建上层人物书写“申请书”，请求俄国“予以保护”，导演“自愿归并”的丑剧。接着，大批俄国军队于1914年

① 《红档》，1926年第5期，第96—97页。

6月开进了唐努乌梁海，强行占领了我国这一地区。沙俄政府随即派来所谓“乌梁海事务长官”，对当地进行殖民统治，并且发出通告：“大俄罗斯帝国宣告，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后，便使这块土地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唐努乌梁海人处于俄国单独监护之下。因此，自宣布保护之日起，除俄罗斯帝国外，任何其它国家非经俄国的允许，不得通过自己的庶民、僧侣或官员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任何活动，更不得侵犯对唐努乌梁海的管理权，即不能向居民征税、审讯和惩罚唐努乌梁海居民，不能要求唐努乌梁海官员或总管本人进行说明。否则，任何外国都必须对俄国政府负责。”①

沙俄吞并唐努乌梁海的强盗行径，遭到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唐努乌梁海广大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也同沙俄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坚决“不承认俄国的保护”，并多次派人到乌里雅苏台等地，向中国官员控诉沙俄的侵略暴行，“声陈眷恋祖国之心，呈请援救”②。只是由于当时袁世凯政府的软弱无能，我国唐努乌梁海人民反占领的斗争才在沙俄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是，沙俄对唐努乌梁海的吞并，始终未能得到我国历届政府的承认。

---

①卡鲍《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181页。

②远东外交研究会编：《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哈尔滨1924年版，第157页。

六　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政治和经济侵略

领事馆——“合法的”侵略堡垒

沙俄对于我国西北边疆除了采用武力手段进行领土侵略之外，还力图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从经济上加以残酷掠夺，以达到最终变我国西北边疆为沙俄殖民地的罪恶目的。

在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政治和经济侵略中，设在西北边疆各地的沙俄领事馆起了特殊重要作用。它实际上是以“合法”外衣为掩护的侵略堡垒。

沙俄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设置领事馆的最早根据，是1851年的《中俄伊塔通商章程》。这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它单方面向我国伊犁和塔城派出了领事，建立了领事馆。其后，又通过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和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分别取得了在喀什和肃州（嘉峪关）、吐鲁番设置领事馆的权利。1883年我国新疆改设行省以后，乌鲁木齐成为新疆省省会，地位日益重要，沙俄便不断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乌鲁木齐设领事馆。1896年，它用把原定在吐鲁

番设立的领事馆移置于乌鲁木齐的手段，终于在乌鲁木齐建立了总领事馆。1911年，沙俄又乘《中俄伊犁条约》商改的机会（《中俄伊犁条约》第十五款中规定："此约所载通商各条及所附陆路通商章程，自换约之日起，于十年后可以商议酌改。如十年限满前六个月未请商改，应仍照行十年。"），采用军事威胁的手段，"沿边增兵运械"，逼迫清朝政府接受它所提出的六条侵略要求，从而又取得了在我国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奇台四处增设领事馆的权利。同年，沙俄还通过诱迫清朝的阿尔泰办事大臣，得到在我国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县）设领的许可。这样，到二十世纪初，沙俄的领事馆已经遍布于我国新疆的各个重要城镇。

出于侵略需要，这些沙俄领事馆一般都拥有十分庞大的机构。领事馆中除设有领事之外，还有副领事（也称帮办领事或领事秘书）、翻译官、帮办翻译官、卫队武官、医官等，下设全副武装的护卫队和教堂、学校、邮局、办事处等等组织。护卫队是由沙俄领事直接指挥、对当地中国官吏和人民进行威胁和讹诈的一种侵略武装。这种侵略武装的建立，是1858年沙俄借与清朝政府代表谈判处理"火烧塔城贸易圈事件"①的时机，压迫清朝政府接受的。当时规定：沙俄可在伊犁、塔城两处领事馆内各"设夷兵五十名，借资保护"，并限定

①"火烧塔城贸易圈事件"经过见本书第七部分。

“额设之外，不准稍逾其数”①。其后，沙俄即据此为例，在每个新设领事馆均配备了这种以“保护”为名的侵略武装，而且还不顾原规定的五十名数额的限制，根据自己侵略的需要，任意扩充士兵数额。曾有人统计，1910年沙俄喀什噶尔领事馆卫队约六十人左右，伊犁总领事馆卫队多达二百人，并且配有大炮两门②。这还不算，每当中俄间遇有重大交涉时，沙俄还经常以“增派卫队”为名，调遣更多军队进驻我国西北的设领城市，有时一处竟达上千人之多，借以进行恫吓和要挟。对于这种武装卫队的侵略作用，一个沙俄侵略分子曾十分露骨地供认：“以优秀的将校担任武官的领事护卫队（每馆至少五十人）的出现，不仅对当地居民心理影响极大，而且十分有助于我国势力范围的扩张”③。

沙俄领事馆对于在我国西北地区居住和活动的俄国侨民拥有领事裁判的权利。根据这项侵略特权，“在行政和诉讼两方面，俄国国民都归驻中国的领事管理。因此，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不可能受中国政府当局的审讯惩处。有权审讯、惩处俄国国民的只有以领事为代表的俄国政权或是俄罗斯帝国国内的其它机关”④。沙俄领事馆利用它所攫取的领事裁判特权，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

---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47页。

②《新疆之现状》，载《东方杂志》第7卷第3期。

③边宁格：《现代蒙古》，东京1914年版日译本，第61页。

④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彼得堡1906年版，第333页。

指挥、操纵俄国侨民为非作歹，进行各种侵略活动，而毫不顾忌中国法律的制裁。清末新疆交涉公署所编的《新疆外交报告表》中曾写道："通商各处，如俄民私种土地，抗不纳粮，欺压乡民，恃强争水，甚或抢劫财产，伤害民命，诈索华商，盘剥重利，包揽华税，贩运私茶，潜销烟土，种种弊端，难以枚举。该领事故为纵庇，侵我主权。"领事裁判权实际成了沙俄领事馆包庇各种在华犯罪俄侨的护符。

沙俄领事馆还通过非法委派俄国"乡约"，在我国西北边疆的各个城镇、乡村培植和扩大其侵略势力。"乡约"，也叫商约、商董，在当地称作阿克萨噶尔。这种"乡约"本来只是在我国西北边疆各地经商俄侨的商务董事，可是沙俄领事馆却非法赋予各地"乡约"以种种职权，包括"帮助领事向中国政府当局保护俄国方面的利益，并且帮助领事本人了解边境地区的情况"①等等。因此，这种"乡约"俨然以"领事和当地俄国侨民利益的代表"自居，任意干预中俄商民间的交涉事务，侵犯我国主权，欺压我国人民，"与中国地方官抗职争衡，擅作威福"，实际上是沙俄领事馆的爪牙和耳目。

沙俄领事馆在我国西北边疆各地通过施加外交压力和各种非法手段进行政治收买和讹诈，干预当地中国官吏的任免，扶植媚外势力，培养汉奸走狗。它肆意干涉

①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368—369页。

中国地方政府的政令和经济设施，为沙俄的政治和经济掠夺开辟道路；它指挥各地俄国“乡约”和形形色色的侵略分子，刺探情报，策动叛乱。作为领事馆头目的沙俄领事，更是以“主子”的身份自居，在我国西北边疆各地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据当时人记述说：沙俄驻伊犁的领事“无时不形桀骜，无事不占便宜。将军以下皆弁髦视之。每遇交涉，不容（中国）局员开口，稍拂其意，立即詈骂。甚至率其俄兵，闯入宁远县署，抢一回妇而去。当事者犹令地方官为之认咎。局面如此，已成不可终日之势”①。伊犁领事如此，其它地方的沙俄领事也是一样。乌鲁木齐的沙俄领事每逢外出，前后必有十多名哥萨克卫兵相陪伴，跃武扬威，不可一世。中国百姓如果躲避不及，便会遭到沙俄士兵的毒打。关于喀什噶尔的沙俄领事，一个曾于二十世纪初在我国南疆旅行的法国人这样写道：“在喀什噶尔的所有显要人物中，莫斯科强国的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无可争议地居于首位。他手下辅以一批军官和文职人员的参谋部，再加有六十名哥萨克保护，况且该城又无中国驻军，所以事实上他是该城真正的统治者。（中国）道台在他面前会浑身发抖。俄国商人在这里享受着他们在本国所有的自由和特权。”② 可见，沙俄领事飞扬跋扈到了何种程

①叶锡祺：《习坎斋文稿》，卷3，第15页。

②爱勃拉江斯：《穿过兴都库什》，巴黎1906年版，第343—344页。

度。无怪乎当时国内有的报刊揭露说："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科布多等地方，……所有中国官吏不过为俄人之傀儡。"①

贸易圈——"国中之国"

沙俄在我国西北一些重要的设领事馆的城市，如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还建有面积宽广的"不与中国人混居的单独居民区"，即所谓"贸易圈"（也称"货圈"或"买卖圈子"）。这种"贸易圈"，实际是沙俄在我国领土上所开辟的侵略基地，具有"国中之国"的性质。

早在1853年，沙俄即根据《中俄伊塔通商章程》中"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存货、住人必需房屋，即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贸易亭，就近由中国指定一区，令俄罗斯商人自行盖造，以便住人、存货"的规定，在伊犁和塔城两城市分别建立了"贸易圈"。伊犁"贸易圈"初建时，只有房屋四十八间，塔城也只有五十一间，其中还都包括沙俄领事馆用房在内。可是，随着沙俄侵略的不断扩大，伊犁、塔城"贸易圈"也逐年向外扩展。特别是在沙俄占领伊犁期间，俄国侨民大量涌进我国境内，利用侵略武力，任意盖房设店，抢占了大量土地。1882年伊犁交

① 《时报》1904年4月8日。

还中国以后，沙俄利用既成事实，一面在城内霸占土地，一面又在城外领事馆附近建立新的“侨民区”，“贸易圈”范围急剧扩大。在塔城，沙俄同样采用非法抢占土地的办法来扩大“贸易圈”。本来，塔城的沙俄“贸易圈”被指定在汉城西北隅，可是后来俄商却擅自在城东北占地盖房。1882年，沙俄驻塔城领事馆恢复后，即向清朝政府提出在城东北建立“贸易圈”的要求，并于次年强迫中国签订了《塔城俄属商人贸易地址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不仅将原先在城东北抢占的土地划入了“贸易圈”的范围，而且把已占地区之外往西直到河边的空地全部预定为日后“贸易圈”扩充的地址。1897年，沙俄又以“商旅辐辏，圈地不敷”为理由，再次扩大“贸易圈”的范围，圈占了塔城楚呼楚河东岸一带。到辛亥革命前夕，塔城“贸易圈”通过“逐年侵越”，范围已经“渐至西门外龙王庙后”，而且“均已建筑墙屋，栽植树株，得步进步，莫可究诘”①。

1896年乌鲁木齐设置总领事馆后，沙俄援引伊犁、塔城两地的成例，也要求在该地建立“贸易圈”。本来，根据条约规定，俄方建立“贸易圈”的地点和范围都应由中国官方予以指定，可是沙俄从自己的侵略需要出发，却强索乌鲁木齐南关外三道桥一带作为建“圈”地址。

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9，第19页。

这个地点正好处在全城“商务会萃之区”，又是“南北往来必经之道”，清朝政府起初不肯答应，后来迫于沙俄压力，才同意了俄方的要求。结果，致使当地民房、水磨均被拆毁，居民流离失所。1907年，沙俄又违反规定，擅自在乌鲁木齐南门等地划地扩充“贸易圈”，虽经清新疆巡抚出面交涉阻止，终因俄方“坚不肯让”，结果仍被沙俄所圈占。

《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等条约规定，“贸易圈”仅仅是来华俄商居住和存放货物之地，并不具有其它性质，对于“贸易圈地”的主权和“圈”内的行政、司法权等问题，虽然条约中未作明文规定，显然应当是属于中国。然而事实上沙俄所建的这些“贸易圈”，都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和司法系统之外，排斥了中国的主权。这些“贸易圈”内的一切事务除了直接听命于沙俄领事之外，还单独设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人员，其中包括俄国乡约、警官等。同时，沙俄的领事馆护卫队，也就是“贸易圈”的武装力量。因此，这些沙俄“贸易圈”虽然建立在我国领土之上，却“仿佛是俄国本土的一角”，“在那儿居住着的是俄国国民，有效的是俄国的法律，通用的是俄国的习惯”①。对于在沙俄侵略下我国西北领土上所出现的这种奇怪现象，当时就曾有人痛切地指出：“名曰贸易圈，既不完纳租税，中国官方亦不能过

①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334页。

问。夫租借地犹有租借之名，此则并租界之名而无之，是与割让何异！主权丧失，莫此为甚”①。

非法移民和发展俄侨

沙俄为了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扩大侵略势力，进行蚕食、控制和分裂活动，还采取打进来、拉出去双管齐下的手法，非法进行移民占地和发展俄侨活动。

移民强占土地是沙俄蚕食我国西北边疆领土、进行侵略的惯用手法。在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边界议定书割走我国西北大片领土之后，沙俄继续驱使大批俄国边民越过中俄边界，窜入我国境内从事非法的农、牧业活动。这些非法而来的俄国移民倚仗沙俄领事馆的支持，大肆抢占我国农、牧民的耕地和牧场，“自立村堡，举长约治”，简直把中国土地当作了俄国本土。据有人统计，伊犁地区截止1914年，“俄人侵入游牧与营农业，均多至五、六万人”。这些俄国移民“皆统辖于俄国总领事馆，其下复设立村长组长，从殖民中选出，以治理内外事务”，“其侵占之地，或建工场，或营家室，无不为永久之计画”②。在塔城地区，俄人随意越境，放牧牲畜，“禁之不去，麾之旋来”③。在阿尔

①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卷5，第10页。

②《新疆之现状》，载《东方杂志》第7卷第3期。

③《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9，第21—22页。

泰地区，沙俄通过强迫中国官吏以签约“借地”的方式侵占当地农牧场的现象更十分严重。辛亥革命前后，沙俄直接派遣军队侵入阿尔泰地区，进行武装移民，“侵种我土地，砍伐我树木，设渡敛资，刈草捕鱼，侵占军营板厂，擅入金厂采金”①，种种不法行动，日益猖狂。

与强行向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移民的同时，沙俄又非法地在这一地区大肆发展俄侨，任意改变当地我国商民的国籍，以壮大其侵略势力。

出售所谓“通商票”，是沙俄非法发展俄侨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和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所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的规定，俄商到中国西北从事贸易活动，须由俄国边界官或领事发给执照，其中写明俄商姓名、所带货色、包件、牲畜数目以及前往贸易的地点等项目，以便中国境内沿途查验，并限定每张执照有效期为六个月，过期后如果仍需在中国境内经商，必须重新申请新执照。这种临时性质的贸易执照，就是所谓的“通商票”。可见，它既不是国籍证明书，更不能作为中国人加入俄籍的依据。但是，沙俄为了侵略需要，却利用俄商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所享有的免税特权纵容各地俄国乡约和俄商非法向中国商人出售此种通商票；凡购得通商票者，沙俄领事馆即硬指为俄人，包庇他们偷税漏税，作奸犯科，逍遥于

①谢彬：《新疆游记》，上海1923年版，第349页。

中国法律之外。由于购得一纸通商票即可自认俄人，取得从事种种不法行为的护身符，所以，一些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也在沙俄鼓动下起而效尤。他们通过购买通商票，充当沙俄的走狗，到处为虎作伥，鱼肉乡里，抗纳粮税，为非作歹。除了那些卖身投靠的民族败类之外，沙俄还以购票之后即可不纳中国官府的粮税、不服差徭，诱骗一些普通老百姓购买通商票。惑于沙俄的诱骗和淫威，购买俄国通商票以自保的普通中国百姓的人数也日渐增多。对于这种凭一张俄国通商票即被宣布为俄籍的离奇的入籍办法，中国政府以及新疆地方当局曾一再提出交涉，表示不能予以承认。然而沙俄却无视中国方面的严正态度，非法出售通商票的卑劣活动始终未予停止，而且出售范围日益扩大，使用期不断延长。例如，每张通商票原来只有六个月的期限，后来却展限至一年，再后则无限期使用，逾期旧票也照常有效。再如通商票原由沙俄边界官或领事颁发，并须经中方签字方才有效，后来则由俄国乡约随意出售和发放，甚至写上一张纸条也要中国官府承认其法律效力。沙俄这种以通商票诱骗中国商民入籍的活动，在南疆最为猖獗。如拜城县过去向来没有俄侨，1912年3月，乌什的俄国乡约窜到该处，以每张收银五两的价钱兜售通商票，声称购票者即为“入俄国籍”，“可以不纳中国粮税”，结果一次就将当地一百多户中国居民非法发展成了俄国侨民。同年5月，莎车的俄国乡约也“以通商路

票欺哄乡愚，惑给片纸小条，伪为准入俄籍凭据”①。此类现象，在我国南疆其它地区也十分严重。因此，当时就有人痛心地指出：“更有最大之隐患足以亡南疆者，则通商票是也。……若长此不止，恐人民去而土地随之，天山南路，不难立沦异域。”②

除了采用出售通商票的方法诱骗中国商民入籍外，沙俄还在伊犁、塔城边境地区，经常派兵侵入我国境内，用武力强迫当地汉、蒙、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人民登记加入俄籍，以便为其占地制造借口。在我国南疆，沙俄领事馆居然强令所有“有安集延③血统”的人统统登记为俄侨。实际上，这些人的祖先早在沙俄吞并安集延以前就迁居南疆，成了中国人。沙俄领事馆不顾这种事实，却强迫他们以二十到二十五两银子的价钱购买俄国国籍证明书，脱离中国国籍，充当俄侨。甚至一些祖先很早从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境内迁来、与沙俄毫无关系的我国南疆居民，沙俄领事馆也施加种种压力，要他们声明自己是俄国人。尤其卑劣的是，沙俄领事馆和俄国乡约还公然伪造家谱，硬指当地一些中国维吾尔族居民为安集延人的后裔，逼令他们登记为俄侨，如若不从，乡约即私自进行拷打和监禁。当中国官府出面交涉时，

---

①《喀什各属俄乡约诱引华民入俄籍案》，载《民国外交部交涉节要》。

②《西北杂志》，1913年第3期附录。

③安集延，原是中亚浩罕汗国属下的一个城市，靠近中国南疆，1876年时被沙俄所吞并。

沙俄领事馆又借口乡约有权管理侨民的一切事务，拒绝交付中国方面审理。

沙俄通过各种手段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非法地大肆发展俄侨，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我国主权在这一地区的行使，而且造成当地国籍问题上的极大混乱，产生的危害和流弊极大。

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使沙俄在我国蒙古地区和天山南北享有免税进行贸易的特权，给沙俄向我国西北边疆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大开了方便之门。同时，沙俄政府为了扩张的需要，还在国内采取各种刺激措施，包括对出口来华的商品给予奖励金等办法，鼓励俄商到我国西北从事贸易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又一批怀着贪婪欲望的俄国商人相继涌进我国西北，“奔走偕来，如水赴壑”。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俄国商行已经遍布于我国西北边疆的各个重要城镇。据《新疆图志》不完全记载，当时在新疆境内的俄国商人总数计二千四百九十三户，一万零六百多人。除了官方登记的执有护照的之外，新疆还有大量没有护照的俄国商人，所以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在这些俄商之中，既有经营大宗进出口贸易和在城镇设铺面的巨商，又有赊取商行货物、运销城乡各地的零商小贩，另外还有专门替俄国国

内工厂收揽原料的收买商。这些大大小小的俄国商人，足迹遍于我国西北边疆城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

伴随着俄国商人的到来，俄国商品如洪水一般涌进了我国西北市场。据俄方自己统计，俄国在1893年向我国新疆地区输出的商品额为三百零三万六千卢布，这个数字比1850年增加了13.3倍；同年，俄国从新疆输入的商品额为二百七十九万二千卢布，比1850年增加了4.3倍。此后，俄国对我国新疆贸易的数量继续增长，1914年的出口额已达一千一百零五万六千卢布，进口额达一千四百二十万零二千卢布，贸易总值比1893年又增加了3.3倍。①

沙俄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所进行的贸易，具有明显的经济掠夺性质。首先，从进出口商品的内容来看，倾销到我国西北的，几乎全部都是工业品或半工业品。其中以棉纺织品占首位，其次是呢绒、绸缎、铁器、白糖、火柴、瓷器、石油制品、玻璃器等。而从我国西北所掠夺走的商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原料，如羊毛、毛皮、肉类、油脂、肠衣、牲畜、棉花、干果、生丝等等。据记载，廿世纪初，沙俄每年从新疆套购而去的羊毛达数千吨，羊百万头，牛数万头，其它如棉花、生丝等出口数量也相当惊人。这些农畜产品被沙俄商人大批收揽回

①以上数字据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莫斯科1957年版，第121、163、166页。

国后，往往经过工厂加工制作，又重新输入到我国西北，赚取高额利润。例如，吐鲁番所产的棉花，俄商套购回国，织成布匹，“仍售中国，获利无算”；新疆的羊毛输出到俄国后，经过加工，“制成用品与服料，仍输入与土民交易”①。

沙俄贸易的掠夺性质，还表现在这种贸易的不等价交换上。沙俄商人在贸易中，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并利用我国西北边疆经济落后状况，一贯贱买贵卖，巧取豪夺。他们垄断市场，经常哄抬俄货价格，压低中国农畜产品价格。如从俄国输入到新疆的煤油，原来每斤价一钱六分至七分，后来竟抬高至每斤六钱，价格上涨了3倍多。而新疆出口的羊毛等产品，价格却始终被压得很低，远远赶不上俄国进口货价格上涨的速度。在我国西北边疆广大牧区，沙俄商人利用现物交易，蒙骗我国牧民，进行重利盘剥。当时，俄商竟可以用两盒火柴换走一张多羊皮；一只手电筒就要牧民拿出十五只羊去换。

沙俄商人还用赊贷的方式，牟取暴利。所谓赊贷，就是放债定货。俄商乘我国农牧民遇到青黄不接或急需钱款与日用品的时机，进行放债，或者将货物作价赊给农牧民，同时预定条件：秋后要以最低廉的价钱向俄商交售他们的农畜产品抵偿。俄商既赚取了高利，又勒低了货

① 《新疆之现状》，载《东方杂志》第7卷，第3期。

价。我国农牧民的羊皮、羊毛往往是尚未离羊之身，已经成了俄商之皮、俄商之毛；棉花、葡萄还没有成熟，就已经不属自己所有。当时有人慨叹："病民之举，莫此为甚。"①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沦为沙俄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一些新兴民族工业和原有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遭受沙俄经济势力的排挤和打击，纷纷倒闭，广大手工业者陷入失业和破产的境地。例如，从清朝乾隆年间就已开始开采冶炼、用来铸造农具的新疆孚远水西沟铁矿和迪化东南的巴尔噶逊铁矿，到二十世纪初，由于俄国铁器的大量输入，"价廉于我几及三分之二"，以至当地铁器"销路壅滞"，"矿利尽为所夺"②，不得不相继停办。在商业方面，由于俄商享有进出口货物概行免税的特权，而华商却要"重重完税"，以至于"华商几无营业余地"③，整个西北边疆地区的市场差不多全被俄商所垄断，使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化日益加深。

垄断财政和金融

沙俄在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

①杨缵绪：《新疆刍议》，第8页。
②钟广生：《新疆志稿》，卷2，第47、55页。
③杨缵绪：《新疆刍议》，第3页。

夺的同时，还通过华俄道胜银行设在新疆的各个分行垄断我国这一地区的财政和金融，控制当地的经济命脉。

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向我国输出资本的金融垄断机构。它成立于1895年，总行设在俄国京城彼得堡。1896年2月，该行在我国上海和天津设立了分行。以后，又陆续在我国一些重要城市开设分行或代理处，并且诱使清朝政府入股参加，以中俄合办的名义进行活动。实际上，这个银行的大权完全操在沙俄手里。沙俄政府擅自规定了这个银行在华的营业范围，其中包括：在中国境内“办理租税、赋课之缴纳”、“支付中国政府公债之利息”、“承受公债、公司债、股票之发行”、“得中国政府之许可，铸造货币”、“发行两、元、镑及其它货币之兑换券”、“经理铁路电线之设置”①等等。因此，华俄道胜银行实际是沙俄对我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掠夺的工具。正象沙俄驻日公使罗森所承认的那样：“这个银行是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实质上只不过是稍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分支机构而已。”②

华俄道胜银行成立后不久，就在我国新疆的喀什、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先后设立了分行，并在西北其它一些城镇建立了代办处。这些分行立即把大量俄国卢布抛入我国西北边疆金融市场，竭力排斥和代替当地的我国货币。在我国西北边疆的许多地区，“市面流通尽为

①徐寄廎：《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1932年版，下册，第63页。
②罗森：《外交生涯四十年》，纽约1922年版，第1卷，第198页。

俄币，即公家收入每以俄币为标准”①。卢布到处泛滥，不仅大大增加了我国西北边疆经济上的对外依赖性，而且给沙俄操纵居奇、从中牟利提供了方便。当卢布最初流入新疆时，每元约值华银五钱，到二十世纪初叶，每元竟可兑换华银八、九钱有余。由于俄国卢布和当地中国货币比价的不断上涨，形成“卢布羌帖（指俄国纸币——作者），盈溢阛阓，市民交易非俄票不行，中国钱币寻废不用，彼贵如珠玉，而我贱如粪土，易中国主权，渐转移于外人之手”②的局面。在推行卢布的同

俄华道胜银行在我国新疆发行的纸币

①林竟：《新疆纪略》，1918年版，第29页。
②《新疆图志》，卷57，第7页。

时，华俄道胜银行还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和阻止，非法在新疆发行纸币。这种纸币以金为本位，分为一分、二分、一钱、五钱、一两五种票面，上面印有俄、汉、满、维四种文字，由伊犁、塔城、喀什三处分别印发。沙俄领事在通知中国方面关于发行这种纸币的用途时居然声称：该纸币“将来流通广远，即可在中国完纳粮税，或带往内地各省，均能随时兑换”。就是说，要把它变成我国新疆等地计价行使、完纳政府粮税的通货，可见沙俄的侵略胃口之大。这种纸币，两三年之中竟在我国新疆发行八、九百万两之多，对当地金融和财政皆产生了莫大的危害。据新疆地方官员报告说，到1915年前后，新疆已是“商人非俄币不能周转，行旅非俄币不能出境，民间非俄币不能购置茶布”①。1917年时，新疆都督杨增新也曾慨叹：“南北两路城乡市镇以及蒙、哈、布（指布鲁特，即柯尔克孜族——作者）游牧地方，所在皆有此种俄钞，无非吸收我国金银，交易我国货物而去。”②我国新疆的金融市场，这时几乎完全被沙俄货币所控制了。

通过垄断汇兑、金融投机以牟取暴利，也是华俄道胜银行新疆各分行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和内地的汇兑业务，原来主要是由中国票号和一些商号经手的。道胜银行新疆各分行建立后，逐渐垄断了该

① 《1915年6月3日新疆财政司长黄立中呈政事堂文》。

②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第15页。

地区和中国内地之间以及同国外的汇兑，中国票号则相继歇业。于是，道胜银行得以从中“大肆其操纵之技”。如中国商人从新疆向京津汇兑现金，首先须向新疆的道胜银行分行兑换卢布，该行即借此机会任意抬高卢布与新疆货币的比价，从中渔利；汇款到达京津之后，当地道胜银行分行又可借口电报未至，拖延付款时间。这样几经敲榨，给中国商民造成的损失十分巨大。辛亥革命以后，新疆财政困难，纸币滥发，华俄道胜银行乘机进行金融投机，贱价收揽当地货币，然后向中国官府索兑现银，从中敲诈勒索。如1912—1913年，道胜银行和一些俄商曾以一卢布换三、四两伊犁官票的比价收揽伊犁官钱局发行的纸币达五十余万两之多，要求伊犁官钱局立即兑现。伊犁官钱局当时库中仅有存银万余两，无法应付，道胜银行竟提出以伊犁矿山作为抵押，企图迫使伊犁地方当局认可。后来经过多次交涉，才改为以每一两三钱伊犁纸币换一两新疆省官票的比价，由新疆省司库向道胜银行和俄商拨还新疆省官票，作为了结。而当时市面上，要拿二两六、七钱的伊犁纸币才能换到一两新疆官票。这样，道胜银行就从每一两伊犁纸币上勒索到了一两多的赢利。这还不算，当新疆省当局被迫向道胜银行和俄商兑换新疆官票以后，沙俄又硬说新疆官票与卢布的比价已经跌落，要求中国再付加水银十二万六千两，或将已付的新疆官票收回，改用新疆和田黄金偿还。这种进一步的敲诈，虽然没有能够得逞，但也足可

以表明道胜银行上下其手、投机取利的卑鄙面目。

华俄道胜银行新疆各分行还直接插手进出口贸易，进行商业侵略活动。新疆都督杨增新曾报告说：道胜银行各分行“向违银行通例，于银行业务之外，兼营贩卖土货及各项商行为副业，垄断中商利权，中民蓄忿已深”①。道胜银行通过投资入股、提供贷款、代订货物等方式，逐步控制新疆各地的俄国商行或零散商人，把它们变为自己的商业分支机构或代理商，以操纵当地的贸易市场。此外，它还向中国商民发放高利贷，当时国内报纸曾揭露：“该行放债，物产坐抵，而常年且五分行息，如届期不偿或见尾息，即将物产扣抵。华商之困，实俄银行之贪狡致之也。”②

①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卷6，第34页。

②《民立报》1911年5月27日。

七　我国西北边疆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英勇斗争

保卫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祖国神圣领土

我国西北边疆人民同全国其它地区人民一样，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从沙俄侵略者踏上我国西北领土之日起，他们就对这个凶恶的侵略强盗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随着沙俄侵略的不断扩大，我国西北边疆人民的抗俄斗争烈火也越烧越旺。这些英勇斗争，给了沙俄帝国主义侵略强盗以沉重的打击，表现了我国西北边疆人民不甘凌辱、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伟大斗争精神，在我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沙俄凭借武力，开始对我国西北边疆展开大规模的入侵活动，其中心目标是侵吞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当沙俄侵略者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领土上开始建立第一批侵略堡垒时，我国哈萨克族人民就勇敢地拿起武器，展开了斗争。他们怀着对敌人的强烈仇恨，袭击入侵者，歼灭小股敌军，拒绝向侵略者提供任何供应，驱散、赶走敌人的马群。沙俄侵略分子巴布科夫后来描述当时俄国

入侵部队所遇到的激烈反抗时写道："从额尔齐斯河越过边界向南方前进，必须一步一步地逐渐占有据点、移入武装居民和建立防卫线，在防线上逐步准备继续前进活动的工具和物质资料。从比斯克防线迁到科帕尔的哥萨克人，在草原落户的初期，同当地的吉尔吉斯人游牧居民（指我国哈萨克族牧民——作者）是格格不入的，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因此某些畜牧业产品从来都可以从吉尔吉斯人手中即在当地获得的，却要从几百俄里以外的额尔齐斯河运来。在建筑私人和公家房屋时，最初时期也曾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急剧前进的活动和迅速占据地区，都是极端困难的，而且在实质上甚至是无益的。"①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当地我国哈萨克族人民的反抗，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才延缓了沙俄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我国领土上推进的步伐。

1850年，驻扎在科帕尔的沙俄军队向伊犁河南岸侵犯时，居住在当地的数千名我国哈萨克族牧民奋起抵抗。他们不受侵略者花言巧语的诱骗，也不怕侵略者的威胁，到处设置障碍，挖掘壕沟，打得沙俄军队狼狈不堪，不得不逃回了科帕尔。

1851年《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签订以后，沙俄更加肆无忌惮地抢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我国领土。我国西

①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8页。

北边疆人民反抗沙俄占地的斗争更加激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塔城人民保卫雅尔噶图金矿主权、火烧沙俄贸易圈的斗争。

雅尔噶图金矿位于塔城西南的阿拉湖（清代称为图古勒池）边，在清朝政府所设立的莫多巴尔鲁克卡伦外数十里之处。这里向来是我国的领土，很早就有中国劳动人民从事挖金等生产活动。1853 年，塔城清朝官府还出面正式在这里设立金厂，招募百姓前往做工。可是，就在这年 9 月，沙俄擅自派人闯入雅尔噶图，阻止中国百姓的生产活动，宣布该地为俄国领土。接着，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又写信给清朝伊犁将军，要求中国撤回雅尔噶图的挖金工人。伊犁将军接到俄方信件后，责成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对该地主权进行调查，结果完全证明雅尔噶图金矿所在地属于中国领土，与沙俄毫不相干。但是清朝当局迫于俄方的压力，决定撤销该地金厂，并禁止百姓继续前往挖金。塔城人民看穿了沙俄侵略者“霸占疆土”的阴谋，没有屈服沙俄的威胁和清政府的禁令，坚持留在雅尔噶图同敌人展开斗争。沙俄侵略者几次采用威逼和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中国矿工从雅尔噶图退走，都没有成功，最后竟在 1855 年2月派遣军队到雅尔噶图，毒打、绳捆当地无辜的中国百姓，甚至灭绝人性地将矿工们赶入河中活活淹死，或者堵入矿洞，放火熏烧，进行集体屠杀。此后，沙俄又不断派兵在雅尔噶图一带搜捕中国百姓。短短几个月里，在雅尔噶图惨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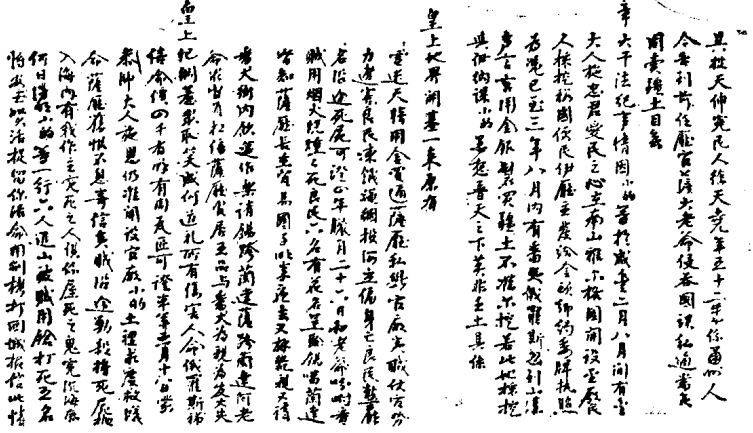
沙俄军队杀害的中国矿工和居民达二百人以上①。这个惨案发生之后，塔城人民怀着无比悲愤，向当地管理中俄通商事务的清朝章京②萨碧屯控告沙俄的罪行，要求清朝当局出面向沙俄提出交涉，保卫雅尔噶图领土主权，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谁知萨碧屯这个民族败类早已经被沙俄驻塔城领事“用金买通”，不但不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反而以“聚众闹事”的罪名，将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徐天尧、安玉贤等人加以毒打。塔城人民又到参赞大臣英秀的衙门进行控告。英秀迫于群众的压力，就雅尔噶图惨案一事向沙俄驻塔领事塔塔林诺夫提出了质问，得到的回答却是：“卡伦以外，是我们哈萨克的地方。你们将民人逐回，不然亦难保事之有无。”③塔城人民眼见自己的亲人惨遭杀害，沙俄领事的态度又如此蛮横，更加忍无可忍。1855年8月26日夜，数百名塔城群众在安玉贤、马隆兴等人率领下冲进沙俄在塔城的贸易圈，放火烧毁了圈内的住房和货物，把沙俄领事和全体俄商赶出了塔城。这个行动，是对沙俄侵占我国领土、屠杀我国人民的愤怒回答，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事件发生后，塔城人民抗俄斗争情绪更加高昂。徐天尧、安玉贤、马隆兴等人继续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并且联名向伊犁将军派来调查事件

---

① 《民人徐天尧上告萨碧屯里通外国呈》。

②章京：清代官名。满语管事的意思。

③ 《英秀奏塔尔巴哈台民人焚烧俄罗斯贸易房屋原由折》。



揭露沙俄制造雅尔噶图惨案的历史文献
——《民人徐天尧上告萨碧屯里通外国呈》

经过的委员呈禀控告状，揭露沙俄的暴行和萨碧屯等媚俄官吏通敌卖国的罪恶。塔城人民这场轰轰烈烈的抗俄斗争最后由于沙俄勾结清朝政府进行残酷镇压而失败，二百余名中国矿工和居民惨死的血债不但没有能够讨还，徐天尧、安玉贤等十多名爱国群众又被逮捕下狱，判以重刑。沙俄还乘机向清朝政府勒索赔款银十三万五千多两，用武夷茶叶五千五百箱作为抵偿。尽管如此，这场斗争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充分显示了我国西北边疆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大无畏精神，对近代西北人民的抗俄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860年以后，沙俄利用《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的荒谬规定，千方百计压迫清朝政府签订割让我国西北领土的不平等条约。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沙俄一面在

谈判桌上进行讹诈，一面派兵抢占我国西北边疆常驻卡伦外的土地，驱赶我国牧民，拦截清朝巡边部队，甚至袭击我国卡伦，制造流血事件。我国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展开了更加英勇的斗争。居住在斋桑湖附近的我国哈萨克族牧民，不准窜入的沙俄侵略者在他们的牧区内测量地形、盗窃情报，并奋不顾身和沙俄士兵进行搏斗，还计划袭击沙俄侵略军。巴布科夫曾记述当时的情况说：俄军“在吉尔吉斯人这种敌对情绪之下，……处境是极端困难的。这一切情况迫使斯特列利尼科夫（入侵该地的俄军头目——作者）终止继续进行地形测量工作，而返回科克佩克特”①。驻守伊犁西部卡伦附近的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营广大清军士兵，对沙俄的侵略暴行早已恨之入骨，在沙俄的军事挑衅面前，他们毫无惧色，“人情汹汹，勇气十倍”，坚决给来犯的侵略者以迎头痛击，多次击退俄军对我国卡伦的进攻。伊犁西部地区的我国哈萨克、柯尔克孜族广大牧民和爱国首领，也积极参加了抗击俄军进犯的战斗，他们不仅“送羊助马”，给边防部队提供物质支援，而且协助作战，“出力拿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伊塞克湖南面纳伦河一带，我国柯尔克孜族人民在鄂斯满、察尔根等人领导下，阻击入侵俄军，与俄军在森格尔池附近激战三个昼夜，给敌人以杀伤。当时的新疆首府伊

①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36—237页。

犁城内，人民群众也以各种方式展开斗争，支援前线的抗俄战斗，他们拒绝向伊犁沙俄领事馆和贸易圈供应生活用品，向派出来采购食品的沙俄领事馆卫队士兵愤怒地投掷石块。在伊犁人民的抗俄斗争面前，一向耀武扬威的沙俄领事馆官员如坐针毡，时刻担心受到中国人民的惩罚。伊犁沙俄领事馆的代理领事科洛托夫金竟于1863年7月的一个夜晚弃任逃回俄国，事后还惊恐万状地向沙俄政府报告说，他在伊犁城内，到处都听到当地群众将要扑进贸易圈、“将俄人枪杀”的消息，“圈内护兵数人，昼夜防守多日，身力俱竭，无奈于晚间只带关防①、官银、紧要文件，与护兵等骑马逃走，……只因风雷大作，天气昏黑，仓猝之间，失去护兵一名。次早骑马渡伊犁河，万难之际，所带关防、官银、文件、吃食全行沉落河中，至第五日之后始到克克苏。逃走之时所受饥苦有不可胜言者也”②。足见其狼狈逃窜时的丑态。

我国西北边疆人民的这些英勇斗争充分表明，尽管沙俄可以通过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迫使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屈服，从清政府手中夺去我国西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是它永远也无法使我国西北边疆人民屈服，永远也夺不走我国人民的抗俄决心和意志。

---

①关防：即官印。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0，第31—32页。

抗击沙俄对我国伊犁等地的武装入侵

1871年5月至7月，沙俄悍然发动了入侵伊犁的战争。我国伊犁地区各族人民面对拥有优势装备的敌人，英勇抵抗，以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国土和家园。在5月的马扎尔保卫战中，当地人民群众纷纷拿起武器，配合地方部队进行战斗。他们还截断渠水，坚壁清野，用各种办法打击来犯的敌军。当沙俄军队闯进马扎尔时，“居民已将城市搬迁收拾得一干二净”，“所有大小水渠都被截断”①。沙俄入侵部队在马扎尔陷入断水、缺粮的境地，同时又受到当地军民的不断袭击，不得不向后撤退。一路上，伊犁军民又利用森林、高地、草场等天然掩护物打击敌人。沙俄军队“整天和从四面八方包围部队的人进行互相射击”，最后狼狈地逃回了他们的出发地——博罗呼吉尔。在5月底、6月初的克特缅山地争夺战中，伊犁军民也打得英勇顽强，多次挫败沙俄侵略军占领这一战略高地以便控制伊犁河南岸并北上与博罗呼吉尔俄军会合的企图。在敌人利用炮火占领了扼守山谷北口的克特缅村以后，伊犁军民还利用敌人宿营分散的弱点，乘夜袭击敌人营地，一度夺回了克特缅村。曾经参加过入侵伊犁战争的沙俄将军捷连季耶夫后来写

①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9页。

道，在争夺克特缅村的这场战斗中，俄国部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塔兰奇部队（指维吾尔族军民——作者）表现出罕有的顽强。战斗持续时间之长，以及不仅与骑兵而且与步兵的多次白刃战，都证明了塔兰奇人有进攻的能力”①。6月30日的清水河子保卫战中，当地居民中所有的男子都加入了战斗行列，其中还有许多年迈的老人和少年儿童。他们面对着由沙俄“伊犁远征军”司令科尔帕科夫斯基亲自指挥的两千多名装备精良的敌军进攻，毫不退缩，用土枪、土炮轰击敌人，手持刀矛、弓箭等原始武器勇敢地向敌人冲杀。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们用石头、砖块进行顽强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城堡被攻陷后，一些居民点燃了自己的住房，宁可自焚而死，也不愿做敌人的俘虏。伊犁人民的英勇斗争，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伊犁地方割据政权上层一小撮叛徒的出卖而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激励着我国人民同沙俄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沙俄占领伊犁之后，以伊犁为跳板，继续东侵。我国北疆各地的广大群众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其中以徐学功领导的玛纳斯保卫战最为有名。据《查办蒙古、伊犁事宜》（抄本）一书记载，玛纳斯之战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872年11月，一支沙俄侵略军带着大量火药和子弹，押运辎重车三百辆，士兵和车夫共计四百八十多

①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4、36页。

人，伪装成商人向东进犯，企图乘机占领玛纳斯，窥视乌鲁木齐。以徐学功为首的玛纳斯一带地方民团发觉敌人的行动后，立即在奎屯以东设下埋伏，并且派人向敌人传递假情报说："东路防卡兵林立，尔商人须假护符，分班前进始保。"这伙伪装商人的侵略者果然中计，将队伍和辎重分为十余起，分别向前进发。徐学功等人见敌人的兵力已经分散，立即带领民团分别包围，加以歼灭。这一仗打得机智、勇猛，一举杀伤沙俄侵略者五十余人，缴获了全部辎重。后来沙俄又从伊犁派六百名侵略军闯到徐学功民团驻地，企图进行报复，但徐学功民团据堡固守，严阵以待，无隙可乘，俄军不得不退走。玛纳斯保卫战是当地人民自发进行的抗击俄军入侵的战斗，对于阻止沙俄继续东犯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阿尔泰地区的厄鲁特蒙古、哈萨克等族人民，也在爱国喇嘛①棍噶扎勒参领导下，坚持抗俄斗争。棍噶扎勒参原是塔城所属厄鲁特蒙古部落的喇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率领部众内迁，被清朝政府安置在阿尔泰地区。他们在喀喇额尔齐斯河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广阔草原上披荆斩棘，开荒引渠，招集各族流亡百姓，营建房屋、庙宇，在克兰河畔建立起一个新兴的城镇——承化寺（后来发展成现在的阿勒泰城）。这个新兴城镇不仅是流亡百姓的栖息之所，而且成为抵

①喇嘛：喇嘛教对僧侣的尊称。

抗沙俄的有力屏障。当时，沙俄侵略者曾多次窜入阿尔泰地区，“骄横生衅”，肆行抢掠。当地人民在棍噶扎勒参领导下，展开英勇斗争。1876年夏，以“游历”为名的沙俄军官波塔宁等人不经中国方面同意，私自窜入阿尔泰，在当地寺院中骑马横冲直撞。寺院喇嘛出来制止，波塔宁等人竟然执枪进行威胁。棍噶扎勒参闻讯后，当即派人把这伙匪徒拉下马来，收缴了他们的枪械，驱逐出境。此后，沙俄为了报复，一面向清朝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一面派军官乌拉索夫带领一百多骑兵气势汹汹地闯进阿尔泰，寻衅闹事。乌拉索夫还带有一封沙俄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省长给棍噶扎勒参的恐吓信，要求棍噶扎勒参向沙俄低头屈服。棍噶扎勒参面对沙俄的挑衅，一面布置当地僧俗民众严阵以待，一面亲自向乌拉索夫展开说理斗争。他历数沙俄侵略者在阿尔泰地区所犯下的侵略罪行，当场将沙俄的恐吓信“手撕足践”，嗤之以鼻。棍噶扎勒参正告乌拉索夫：阿尔泰人民“不怕俄国”，“此案由京①如何定断，即以如何为是。如欲与我打仗，即请俄国人来吧，吾将动（员）所有阿尔泰山人民对敌！”②棍噶扎噶参的行动，挫败了沙俄的嚣张气焰，迫使乌拉索夫一行空手而归，未能达到侵略目的。此后，沙俄政府虽然通过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将棍噶扎勒参调离了阿尔泰，但是当地人民的抗俄斗争

①指北京清朝政府。

②《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2，第22页。

始终没有停止。

在沙俄占领伊犁十年期间，沦入敌手的我国伊犁各族人民继续同沙俄展开斗争。他们不向侵略者屈服，坚决抵制沙俄的“劝降”阴谋。据当时清朝政府派往伊犁附近与沙俄进行交涉的伊犁将军荣全报告说：“俄人到伊后，该国小官等先劝归附，阿尔玛图廓巡抚（即“伊犁远征军”司令科尔帕科夫斯基——作者）又约各营①官员，逼令投降。各营众官员商议，……总望中原迅来大员救拔，岂可苟顺外夷。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河土尔扈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②后来，沙俄又假仁假意地“散发口粮”，企图借此“劝令归顺”。伊犁人民再一次坚决抵制，“兵民不从，亦不领粮”，他们多次派人与清朝官员和军队取得联系，表示“惟盼大兵早到，共图收复”③，驱逐沙俄侵略者。在左宗棠指挥的清朝军队入疆作战期间，伊犁各族人民更是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打击沙俄占领军，有的还毅然逃出沙俄占领区，投向祖国一边，准备协助清军收复伊犁。

正是我国西北边疆人民在沙俄入侵和占领伊犁期间所进行的这些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阻

①指伊犁地区我国满、蒙、索伦、锡伯等族驻防兵丁。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第10—11页。

③同上书，卷89，第22页。

止了它继续扩大占领范围的企图，动摇了它在伊犁的军事殖民统治，为清朝政府向沙俄索还伊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以后，沙俄利用“勘改”、“勘定”中俄西段边界，肆意侵吞我国领土。对此，我国西北边疆人民同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883年中俄双方谈判“勘改”斋桑湖以东地区边界时，沙俄事先即出动大批军队侵入我国哈巴河地区，企图迫使清朝政府接受以哈巴河为中俄边界的要求。当地蒙古、哈萨克族人民愤怒斥责沙俄掠夺我国领土的罪行，指出：“当年分界之时（指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时——作者），已将沃壤之区任听俄人挑割，……现又闻俄人将从前既定之界又来勘分，何其贪心不足，一至于此？彼意莫非欲绝我蒙民生路，必使将来求一托足之地而不可得，情何以堪？”① 他们坚决表示：“至死不肯分让”，倘若随地划归俄国，“虽死不从”②！由于当地蒙、哈人民奋起反抗，“人情汹汹，大有济河焚舟之势”，迫使沙俄不得不降低其侵略要求，退至哈巴河西面的阿拉克别克河划界，我方“始得挽回牧地二百余里”③，还迫使沙俄谈判代表放弃了划界中“人随地归”的原则，改为自愿选择去留。在建立界牌时，阿拉克别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30，第18—19页。
②同上书，卷29，第1页。
③《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84，第13页。

克河以西的我国蒙、哈人民大都毅然决然地迁到了河东，给了沙俄侵略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我国帕米尔北部阿赖地区的柯尔克孜族人民也拿起武器，展开了抗击侵略者的斗争。1876年7月，沙俄将军斯科别列夫亲自指挥军队侵入阿赖地区。当地柯尔克孜族希布察克部人民在阿卜杜拉伯克的领导下，烧毁了沿途河上的桥梁，埋伏在丛山狭谷之中打击敌人，使斯科别列夫的部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①。后来，沙俄虽然利用兵力上的优势包围了阿卜杜拉伯克的队伍，并且用尽办法企图骗诱阿赖人民放下武器向沙俄投降，但是阿卜杜拉伯克率领部众巧妙地突破了包围圈，把追击他们的沙俄军队诱引到和什库珠克帕米尔的哈拉湖畔，不但机智地甩掉了敌人，还使这支沙俄追击部队在暴风雪的袭击下几乎全部丧生。我国阿赖人民的这场抗俄自卫斗争，最后虽然由于当地封建上层中一些民族败类的可耻叛卖，以及南疆的阿古柏匪帮阻隔了阿赖与祖国的联系等原因而失败了，阿卜杜拉伯克本人也不得不离开了帕米尔，退入阿富汗境内，但是他离开祖国时，留下坚定的誓言：决不向俄国投降！这个誓言，始终激励着我国帕米尔人民向占领他们家园的沙俄强盗继续展开顽强的斗争。

---

①鲍里斯·塔格耶夫：《在耸入云霄的地方》，莫斯科1904年版，第42页。

遍及全疆的反沙俄吞并的斗争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沙俄利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一切手段，野心勃勃地企图一口吃掉我国西北边疆，把“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一直扩展到长城脚下。面对沙俄这种穷凶极恶的侵略行径，我国西北边疆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吞并斗争。

1901年，在内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南疆喀什人民就曾举行过大规模的抗俄示威行动。这年年初，两千多名维吾尔族群众愤怒地包围了沙俄领事馆，抗议沙俄欺侮中国人民、破坏当地民族风俗。示威群众还奋不顾身地与沙俄领事馆卫队士兵“交手格斗”。沙俄出动全部哥萨克卫队，才驱散了在喀什的示威群众。喀什人民的这次行动，后来曾被一个英国作者称之为当地“反俄情绪的第一次真正示威”①。

1905年，科布多边境的我国蒙古族人民对沙俄越界开矿、强租土地等侵略活动展开英勇斗争。他们“屡次聚众抗阻”②，终于挫败了沙俄的占地阴谋。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沙俄直接出兵伊犁、喀什、阿尔泰等地，加快了吞并我国西北边疆的步伐。我国西北边疆人民同沙俄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反对沙俄吞并

①斯克莱因等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24页。

②《时报》1905年3月13日。

的烈火燃遍了整个西北边疆。在这些英勇斗争中，1912年在南疆爆发的“策勒事件”是影响最大的一个。

策勒是南疆于田县的一个村镇（后来发展为县城）。十九世纪末，沙俄就把自己的侵略魔爪伸到了这里。后来，为了扩大自己的侵略势力，沙俄驻喀什领事馆又派了一个名叫赛义德的俄国人，到这里专门从事阴谋活动。这个家伙到策勒后，一面交结当地的民族败类、土豪阿布列孜，娶了阿布列孜的女儿做妻子，共同从事侵略活动；一面根据沙俄驻喀什领事索柯夫、副领事贝伦斯的指示，在策勒非法地发展俄侨，扩充侵略力量。赛义德用威逼、诱骗等手段，强迫当地一些我国商民非法改入俄籍，甚至“擅将殷实户民拘去，逼令买票投俄，许以免纳粮税，不从者关锁累日”①。结果，经赛义德一人之手，就在策勒这个不大的村镇里非法发展了一百余名“俄侨”，纠集起一支由他直接指挥的侵略武装力量，“办有快炮”，与当地中国官府分庭抗礼。赛义德和他手下的爪牙凭借着沙俄领事馆的支持，在策勒称王称霸，肆意践踏中国主权。他们抗交粮税，霸占田产，抢占渠水，敲诈勒索，欺压中国百姓，无恶不作。策勒人民对赛义德的侵略罪行早已恨之入骨，曾多次向当地官府提出控告，但始终得不到解决。1912年2月，赛义德又在村子里作恶，抢占中国农户的渠水。策勒人民在

① 《喀什噶尔和田州属俄人被戕案》，载《民国外交部交涉节要》。

阿訇①苏扑尔格的带领下，到于田县衙告状。赛义德听到消息后，公然带上一伙人骑马闯入县衙内院，向中国官民示威。当地群众忍无可忍，当场将赛义德等人从马上拉下，扣押了起来。沙俄驻喀什领事索柯夫出面干涉，逼令中国官府将赛义德交由沙俄领事馆处置。中国官府将赛义德交出后，沙俄非但不对这个作恶多端的侵略分子作任何惩处，反而立即释放，并且指示他回策勒后要对中国官民摆出“交战的姿态”，继续作恶。赛义德得到主子的支持，气焰更加嚣张。他回到策勒时，爪牙们在村口和家门前列队欢迎，鸣枪示威。接着，就开始对当地中国群众展开疯狂的报复，打伤中国百姓多人。策勒人民群情激愤，纷纷向和田州和喀什道官府提出控告，要求予以解决。这时，南疆哥老会组织②发动起义，喀什地方政权被民军所掌握。民军首领边永福、魏得喜闻知赛义德的侵略罪行，决定派遣参将熊高升带领一些民军士兵到策勒支持策勒人民的正义斗争，帮助处理这一案件。6月23日，熊高升等人到达策勒后，立即根据群众的要求，传讯赛义德。赛义德公然纠集一百多名党羽荷枪实弹地据守在阿布列孜的宅院里，房顶上挂起沙俄国旗，进行抗拒。这种挑衅行动，更加激起了策勒人民的愤怒，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包围了赛义德所

①阿訇：伊斯兰教的宗教职业者。

②哥老会：民间反清秘密会党，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的重要力量。

盘踞的宅院，要求赛义德滚出来接受审讯。赛义德竟下令党羽开枪射击，当场打死院外民军士兵和群众多人。面对沙俄侵略分子暴行，策勒人民怒不可遏，“呼声如雷，奋勇争先”，冒着敌人发来的枪弹，勇敢地冲上前去，展开搏斗。一些沙俄匪徒被愤怒的群众当场击毙，熊熊燃烧的烈火吞没了那些敢于负隅顽抗的沙俄匪徒，只有赛义德和他的几个亲信挖开后墙狼狈逃窜。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策勒事件”。

策勒事件发生后，沙俄气急败坏，一面歪曲事件真相，掀起反华恶浪；一面向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无理要求中国赔礼、惩凶、赔偿损失。沙俄还以此为借口向喀什增派侵略军。但是，我南疆人民在策勒事件鼓舞下，情绪更加高昂，他们不怕威吓和挑衅，继续为保护国家主权、反对沙俄的吞并阴谋而斗争。在策勒事件中起了积极作用的熊高升，事后在于田庄严发表声明，披露策勒事件的经过，痛斥赛义德等人的罪行和沙俄的谎言，表现了与沙俄斗争到底的决心。南疆各地人民把熊高升作为抗俄斗争的英雄，到处给予盛大欢迎。皮山、叶城、莎车等处还派兵迎接，施放礼炮，以示对他的敬意。

1913年10月，袁世凯政府屈服于沙俄的压力，竟然将熊高升和参加策勒事件的四十名群众无理地判以徒刑。然而，沙俄勾结袁世凯政府对策勒人民所进行的镇压，并没有能够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目的。相反，抗俄斗争烈火在我国西北边疆各地越烧越旺，各族群众纷纷起

来惩罚那些为非作歹的沙俄侵略分子。一些过去被胁迫、诱骗而加入俄籍的中国群众，也从策勒事件中擦亮了眼睛，识破了沙俄的阴谋，起来揭发沙俄迫令入籍的罪行，要求恢复中国国籍。伊犁地区的各族群众英勇反抗沙俄蚕食霍尔果斯河东岸我国河滩地的侵略活动，痛打入侵俄军，拔去沙俄为占地所插的标志，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

阿尔泰地区各族群众的抗俄斗争同样十分激烈。1913年7月，沙俄领事在承化寺逞凶打人，当地中国驻军奋起反抗，刺伤沙俄领事。沙俄以此为借口，出兵一千五百余人侵入阿尔泰，并向承化寺、哈巴河、布尔津等地武装移民，蓄意长期霸占。阿尔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打击入侵之敌。1913年10月，他们在距承化寺六里远的地方围攻盗伐林木的沙俄侵略者，迫使这伙强盗"逃往领署"①。1915年5月，阿尔泰人民又在布尔津河冲库勒一带与抢占耕地、闸断渠水的沙俄武装移民展开搏斗，严惩了沙俄强盗。与此同时，阿尔泰人民还配合当地驻军，多次击退沙俄支持下的外蒙傀儡军的进攻②，使沙俄假手外蒙傀儡当局吞并我国阿尔泰的阴谋未能得逞。

总之，辛亥革命以后我国西北边疆人民的英勇斗

---

①《承化寺俄兵案》，载《民国政务司各国悬案》。
②当时在外蒙古沙俄正策动演出"独立"丑剧。

争，给了沙俄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正是西北边疆人民的这些英勇斗争和全国人民的支援，挫败了沙俄吞并我国西北边疆的企图，迫使沙俄入侵我国伊犁等地的侵略军不得不陆续滚回了俄国。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① 我国西北边疆人民反抗沙俄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些英明论断。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47、595页。

后　记

1975——1978年间，笔者参加了西北地区五个单位集体编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工作（该书已于197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初稿征求意见过程中，听到许多热心的读者建议：希望能就这一题目再写一些比较通俗的读物，以满足社会上更多读者的需要，普及这方面的历史知识。有鉴于此，笔者在完成《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中自己分担的任务后，又撰写了这本《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简史》。

应当说明的是，笔者在撰写这本《简史》时，虽然对所涉及的史实和资料在前人基础上重新作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在许多方面则是利用了《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研究成果。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本书也是参加那部著作编写的同志们集体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自然，本书中出现的错误不当之处，理当由笔者个人负责。

本书在撰写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存宽同志和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同志们的热情帮助，西北历史研究室还曾集体讨论过初稿，并承李之勤同志为本书编制了地理插图（夏备德同志清绘），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赵　春　晨

一九八〇年夏于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